

炎黄春秋



罗荣桓元帅与夫人林月琴 1947 年在哈尔滨

历史巨变：
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帅府家事

——记罗荣桓元帅
夫人和子女们

日本有些人为什么
总想为侵略战争翻案



夏衍

6
95

本期导读

历史巨变：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

在1895年到1995年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历了由屈辱到自立、由自立到自强，由自强到走向辉煌的历史巨变。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这一历史巨变的重要标志……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日军进攻山西，大军压境，情况紧急。为扼制敌人进攻，保卫太原，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组织策划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此文，不仅介绍了抗日军队血战的英勇，而且写出了国共两党此时此地合作之真诚。

“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面临着百乱待治的局面，“两个凡是”成为拨乱反正开创新时期的严重障碍。经过两年的斗争，中国这艘巨轮终于破冰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吹响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进军号角。

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 “张浩事件”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此信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巨大震荡。一时间，大批来信涌向编辑部，质问的，责备的，愤怒的，要求立即答复的……也有少数是拥护的。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坚持极左路线和反“左”斗争的一个小小的回合。

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

建国初期，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方方同志，由于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的分歧，被指责有“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并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42年后的今天，党中央作出平反决定，为方方同志恢复政治名誉。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杰出的人物都已先后离开人世而长眠于地下，但是他们俩人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珍贵友情，却值得人们深深怀念并发扬光大。

我与蒋纬国先生的同窗交

作者与蒋纬国是三十年代的同学，人事沧桑，天各一方，分别58年了，海峡两岸老同学的情义始终未曾忘怀。改革开放后，他俩书信来往，表达共同盼望祖国统一之心声。

帅府家事

——记罗帅夫人林月琴和子女们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地位显赫的府第亦然。有的将帅能指挥千军万马，却理不清家长里短。罗帅夫人林月琴，既是历经艰险的老红军、老干部，又是善理家事的贤妻良母，本文介绍她处理家事和教育子女的故事。

下期要目

- △红色首都的第一任书记邓小平
- △西府战役失利时彭德怀的大将风度
- △落日——我参加了日本在米苏里舰向盟国的受降仪式
- △戴安澜将军魂系缅甸
- △叱咤风云的黄埔女兵
- △从美国间谍到友好使者
- △贤明君主唐太宗的另一面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王 恂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

春秋笔

④ 历史巨变: 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前后
①⑥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徐庆全 马仲廉

求实篇

②③ 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
②⑧ 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
②③ 「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张江明 刘子健
李克林 南东风

殒星篇

③⑨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④⑥ 南洋侨胞女雁北「花木兰」

尹 骐 荣维木

目 录

同心结	赤子心	文荟园	人海浪	古今谈	轶闻录
④⑨ 我与蒋纬国先生的同窗交……………吕儒琦 ⑤② 一九三七：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鲁 諝	⑤⑤ 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女华裔成之凡……………孙引南	⑤⑧ 气骨非凡的大书法家吴玉如……………王湜华	⑥② 帅府家事……………李俊亭 ⑥⑦ 女音乐指挥家郑小璘……………程迺欣 ⑦⑦ 从日本战俘到为中国服务的专家……………白 描 ——记罗帅夫人林月琴和子女们……………	⑦④ 日本有些人为什么……………曾北文 肖又新 ⑧① 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商 传 总想为侵略战争翻案……………	⑧⑤ 慧眼识拔梁启超的礼部尚书李端棻……………万登学

历史巨变：

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一位爱国志士画了一幅中国疆域的《时局图》。图上那虎踞朔方的北极熊，横扑在长江流域的猛虎，蹲坐在西南边陲的毒蛙，曲盘在山东半岛的一圈肥肠似的怪物，以及升自东瀛列岛的太阳和来自太平洋的秃鹰，分别代表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把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描绘得赤裸裸活脱脱，令人猛醒！

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过去了，历史进入了1945年。50年前参与瓜分中国的日本、德国已成为可耻的战败国，另一些参与者如英、美等国，则不得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中国，平等地坐在了一张圆桌前，共同议事，呼唤世界风云。

这一天，不仅是中国人民喜庆的日子，也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是1945年10月24日，人们通常称之为“联合国日”。

一、中国抗战：一幅血肉描绘的悲壮雄伟的画卷

1840年，英国人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虽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但是并没有完全惊醒这头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惊梦的国人发出反

抗的呐喊，但在死气沉沉的旧框框旧套路中弱于游丝；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葬身鱼腹；酝酿已久的富国强兵的戊戌维新，被紫禁城的那个奸诈狠毒的慈禧扼杀在襁褓之中。此后，虽然革命家孙文在南方联络仁人志士，拯救祖国于危难之秋，并激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风云，但是，这些文弱书生的满腔热血，敌不过袁世凯的新军和权谋。袁世凯上演了一幕逼宫戏、圆了83天皇帝梦后，中国依然国势不振，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东方一海之隔的东瀛岛国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却羽毛丰满，军国主义狂兴，拉开了“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序幕。积弱积贫的满清王朝，军阀割据的中华民国，成了大和武士的俎上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投下了一颗炸弹，并作起了“速战速决”拿下中国的美梦。但是，日本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10年前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已自觉地担负起拯救中国的神圣职责；打破军阀割据后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也拥有了较强大的军队。况且，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虽然是短暂的，却给人民留下了外御强侮、内思统一的共识。自1840年以来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屈辱的历史，已成为萦绕心头久久不散的血泪悲歌，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史重演。“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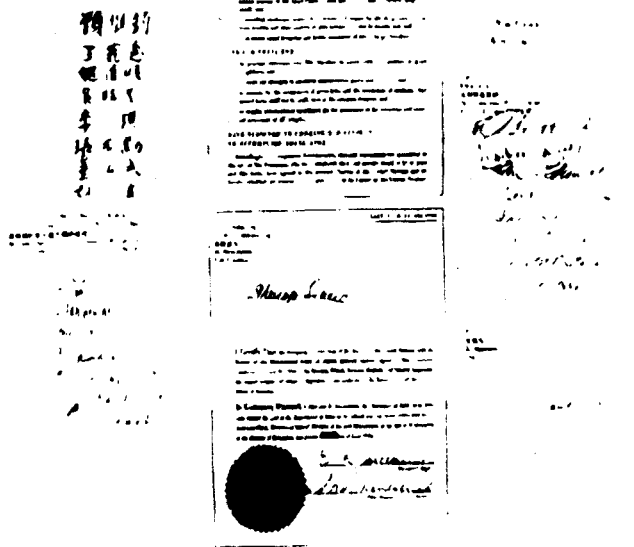
国前后

● 徐庆全

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虽然国民政府在早期奉行着“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继而发生了“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终于搭成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共识，此后，中华大地上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烽火。

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军调动大量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华中与日寇展开血战。这些战役虽大都以节节撤退而告终，但是，对抗日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辟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使日寇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屈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描绘了一幅悲壮雄伟的画卷，演奏了一支激荡心扉催人奋发的劲歌！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不但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鲸吞中国的狂妄计划，而且引起了世界的侧目。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美英苏等国所必须依援的对象。



五大国在联合国宪章的签字

二、“黑色的星期日”：美国是在光着屁股解手时挨打的，而且手头连一张手纸都没有

如果把二战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进行排列的话，1941年12月7日决不是可以忽略的。

在这个被美国人称之为“黑色星期日”的日子里，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连续两个小时的空袭，使珍珠港的海防势力损失殆尽。一位英国陆军部的官员在事后颇有风趣的描绘美国当时的窘况：“美国是在光着屁股解手时挨打的，而

且手头连一张手纸都没有。”

日本的偷袭，粉碎了罗斯福对日本的种种幻想，放弃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所玩弄的平衡木的游戏。12月8日下午6时30分，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宣读文告，决定统帅美国对日宣战。

同一天，英国也对日宣战。

与美国的愤怒相反，12月8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兴高采烈、弹冠相庆。

他们仿佛从珍珠港的硝烟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有了美国这个强大的盟国，中国一定能很快打败日本。中央社立即刊印号外，到处散发。重庆市民也纷纷涌向街头，相互传递消息。人们甚至盛传美国已经出动500架飞机轰炸了东京。

国民党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同一天，蒋介石召见英美驻重庆代表，建议美、英、中、苏等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并在重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协调各国的军事行动。12月9日，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向日本及德意宣战。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文中说道：

“吾全国同胞自今伊始，更须紧张严肃，各竭其能，各尽其责，共作最大最后之奋斗。吾海外侨胞，应尽其赤诚，奋其伟力，各就所在地区，贡献所有力量；协助友邦，消灭共同之公敌，造成祖国之荣誉。吾全国之将士，更应切认今日为吾军人奋勉图报惟一重要之时机，亦为国家民族存亡荣誉之关头，宜更沉着坚忍，英勇奋发，以获‘九一八’以来血肉所造成的战果。”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宣言》提出了“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等八项重要任务。

“黑色的星期日”后，国共两党所发表的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其中进一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罗斯福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

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而言，罗斯福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黑色的星期日”以后，日军的作战方向是：第一阶段南进，占领关岛，登陆菲律宾，征服马来西亚，侵占香港，巩固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占领；再西向进攻缅甸、新加坡，向南侧击澳大利亚，进攻印尼，占领南太平洋各群岛。第二阶段完成上述作战目标后，集中力量巩固大陆的占领，完成从上海到新加坡的大陆控制。被日本计划所归于“大东亚秩序圈”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几乎都是英美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岛屿和殖民地。很显然，日本的作战目标除中国外，已对准了英美。从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日本的海军力量相当于美英荷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力量的总和；日陆军有51个师团，其中在中国东北有13个师团，长城以南有21个师团，能用于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地区作战的师团有11个。中国共牵制了日本陆军的34个师团，相当于美英等国牵制日军的3倍，占其全部陆军的66.6%。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美英帝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如果失去了中国战场的配合，其对日作战的进程是难以想象的。无怪乎罗斯福要发出如此的感叹了。

尽管傲慢的英帝国对亚洲的了解很有限，并且一直对中国怀有深深的偏见，但是这时候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曾回忆说：“丘吉尔访美后在下院说，中国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进行了四年半的抗日战争。邱吉尔内阁的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赞不绝口。他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人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根本没有武器，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一定是比日本人更为骁勇善战。”此后印缅战役中英军的溃逃和中国远征军的奋进的巨大反差证明，英国人的这种看法是不无根据的。

英美的打算很清楚：在亚洲拉住中国，顶住日本；在欧洲拉住苏联，集中主力打击德国。而中国和苏联面对法西斯轴心国在全球的挑战，则希望反法西斯的各国盟国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决定定期在重庆召开盟国的联合军事会议，以实现军事联盟。23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英国印度军总司令、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魏菲尔，

美国陆军航空队长勃勒特等，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军事联席会议，这是重庆政府与西方盟国远东最高司令官的首次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对法西斯作战的先亚后欧的战略方针。但是，在26日英美两国三军参谋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他们则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确定“欧洲第一”的战略。

根据英美的这一战略，将全球划分为四大战区：欧洲大陆战区；北大西洋战区；北非中东战区；太平洋战区。这一战略的背后，也暗示出了美、英、苏、中四大强国的座次。

1942年元旦，丘吉尔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宣称将团结30个以上的国家共同作战。同时，对中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同一天，美、英、苏、中等26国向世界法西斯发出了反击的宣言：

“签字国政府，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即众所周知的《大西洋宪章》所体现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业已表示赞同；

“深信完全战胜他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以及对于维护本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权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兹宣布：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资源或经济资源来抵御同各该政府交战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属国。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同本宣言签字国合作，保证不同敌人单独停战或和谈。

“现在正在或可能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提供物质援助和贡献的其它国家，均可在上述宣言中签字。”

《二十六国宣言》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国一词，并成为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美、英、苏、中在宣言上签字的顺序上，有一段不太为人注意的小插曲：罗斯福开始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其它国家以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时，罗斯福却接受丘吉尔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林。但是，这段小小的插曲，则既表露了美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政策的端倪，也揭示了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齟齬。这是后话。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精神，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划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泰国、越南及将来盟军可能控

制的亚洲大陆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美国推荐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中国战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

四、中英中美新约：百年来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晶

曾几何时，国民政府为“黑色的星期日”后所提供的美国这个坚强的后盾而吹呼，以为太平洋的爆炸声会给它送来源源不断的美国租借物资。岂料，英美所确定的欧战第一的原则，使得英国虎在美国鹰眼中成为一只得宠的花猫，把本来属于中国的物资大半掠走。蒋介石虽然当上了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区最高长官，但有一个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在身边，给他找来不少麻烦。更不能让蒋介石忍受的是，英美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盟友，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力量为其战略服务。英美制定了大西洋宪章，但并不制定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而且，在盟国头头召开的战略会议上，中国往往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甚至连盟国在华盛顿召开的、由租借物资分配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属于成员国的中国拒之门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蒋介石一方面将自己的不满通过史迪威向罗斯福发泄，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同美国摊牌。

1942年6月，美国为了紧急援助被德军紧逼的英国，将停在喀土穆机场的准备飞往中国的一队B-24轰炸机，改调由英军支配。这使蒋介石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强硬地说道，既然英国每遭受一次失败都要拿走一份支援中国的物资，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如果英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战区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与英国的地位平等，有权自主地支配给中国的租借物资，而不能总是受制于美国。为此，蒋介石向罗斯福明确提出了三个条件：“1. 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3个师到印度，以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2. 自8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的作战飞机要达到500架，而且以后保持这个数目。3. 空运到中国的作战物资每月保持5000吨的运输量。”否则，蒋介石威胁道，将取消中国战区。

罗斯福早已明白“假如没有中国”的道理，当然不想丢掉中国战区和蒋介石，但是他也不想改变为“欧洲第一”的战略而优先援助英国的既定之策。因此，他在给蒋介石的回函中，既满口答应这些要求，又婉转地解释目前尚有困难，请再坚持等待。尽管这些要求被美国大大地打了折扣，作为既不想也不敢与美国闹翻、更不

想取消中国战区的蒋介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自中国以自己的力量被承认为反法西斯四强之后，国民政府即向英美提出要求，希望能废除对中国的平等条约，给中国以真正的平等。虽然英美一开始对此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英美感到只有中国支撑住亚洲，它们才能完成“欧洲第一”的战略。于是，它们被迫同意废除对中国的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特权，重订与中国关系的新约。经过国民政府的力争，1943年1月11日，“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即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英美历次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享有的特权。

中美、中英新约的公布，无论是在陪都重庆，还是在革命圣地延安，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月12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称从此中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与英美苏平等的世界强国了，并要求全国军民“奋发图强”，服从国民党的一党领导；《中央日报》以“平等、自由的光明灯塔”为题发表社论，强调了国民党的“英明”、蒋介石的“伟大”；三青团发

表《告全国青年书》。称：“感戴领袖，永矢忠贞。”国民政府一些人也都按“感戴领袖”的这一基调，把庆祝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无限吹捧。

无庸置疑，新约的签定，特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英美宣布废除的特权，都还在日本人手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还不是实际得到的东西，更何况香港九龙的主权问题，在条约中根本没有提及。所以，国民政府利用这一件事为它的政治服务还为时过早；更何况，废约的成功，恰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那样：“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惟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作者。”

五、罗斯福对艾登说：“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

二战时期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在写回忆录时，回顾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



顾维钧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后立右二为董必武

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虽然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即已看出了“执世界五百年政治之牛耳”的关键是中国，但是，由于有英、俄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美国的势力一直难以渗透进中国。现时进行的战争，打破了旧时的世界格局，使美国政府在硝烟弥漫的火光中，似乎看到了它的前贤们所预言的“执世界五百年政治之牛耳”的前景。因此，它在致力于粉碎“大东亚新秩序”的同时，也致力于进行控制中国、并通过中国控制远东的计划。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则既要警惕苏联在战后“从亚洲东部向外扩张”，又要控制英国等列强的殖民地遗产。发生在26国宣言签名时的那一段小小的插曲，即已说明英国已然看到了美国这种政策的端倪。这种端倪在1943年初即已形成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亦即赫尔所言的第二个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1943年3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其实的四强之一，那真是笑话。”并尖酸地抱怨说，美国是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罗斯福我行我素。这年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罗斯福强调指出，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30日，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决定对共同敌人采取共同行动。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迫使苏方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当莫洛托夫置之不理时，赫尔竟以中断会议相要挟，直到斯大林做出让步才罢手。这样，中国代表傅秉常才在宣言上签了字。

这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组织最初蓝图的《普遍安全宣言》称：“美英苏中政府根据1942年元旦之联合国宣言及其后各项宣言所共同决定，各向其现与作战之轴心国家进行战争，直至此种国家在无条件投降屈服为止之决心。且鉴于其为与本身与为其国对于侵略之威胁谋得解放所负之责任，并鉴于战争至和平其演变必须迅速而有秩序，且为建立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全世界人类及资源用于武装者可达最低限之起见，用特联合宣言。”其中规定：“在重新恢复法律秩序与成立普

遍安全制度之前，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彼等得随时会商，并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商议，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就确定了四国共同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共同结束战争，共同组织世界和平组织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促使英苏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下一部就是把蒋介石拉进四国首脑会议了。

筹备四国首脑会议时，因苏联尚未加入对日作战，不便与中国同席讨论对日问题。这样一来，四国首脑会议只好分两段进行：首先在开罗举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会议，称开罗会议；然后在德黑兰举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议，称德黑兰会议。

11月22至26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会后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肯定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宣布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此外，罗斯福、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及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蒋介石为他们取得的外交成就弹冠相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称开罗会议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但是此后不久，罗斯福便对他的这位伙伴感到不满了。在罗斯福着手实行他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通”们——驻华的戴维斯、谢伟思之类的外交官，便开始研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否担当得起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导者。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罗斯福所依赖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不愿积极同日本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是民主的“极端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来与生机勃勃的中共政权打内战时很可能是一个失败者。毫无疑问，“中国通”们的研究报告肯定在美国的决策者中间产生了影响，美国政府开始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个个特使轮番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恶性循环中转圈，这些特使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最后，美国政府只好下赌注了，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道路。

美国想依靠蒋介石实现其“伟大的梦想”的愿望，

真的只是梦想了。

六、董必武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中、美、英、苏四国所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所提出的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设想，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44年5月，罗斯福向英苏中三国发出邀请，近期在华盛顿共商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有关事宜。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赞同。这个被称为“敦巴顿榆树园会议”的召开，也是分两段进行的。8月21日，美英苏三国先开会；9月29日，美英中三国代表再开会。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对国际组织宪章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月9日，四国共同搭成了建立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7个部分：（一）全体大会；（二）安全理事会；（三）国际法院；（四）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五）秘书处；（六）军事参谋委员会；（七）其他必要机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了“世界安全组织”的问题，将“敦巴顿榆树园会议”的内容具体化，并制定了联合国会议的章程及具体办法；会议决定：以美英苏中法为邀请国及常任理事国。

这样，自1942年元旦的《二十六国宣言》提出“联合国”一词始，直到现在，联合国会议才进入了筹备召开的阶段。

国民党政府自对日宣战时，即大力提倡战后成立国际组织，并把这一组织看成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2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任联合国的邀请国。3月5日，美英苏中四国向44国发出邀请。

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国民政府很费了一番周折。根据雅尔塔会议确定的组成原则，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而国民党政府中除了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共代表参加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

中共方面积极争取代表资格。2月18日周恩来致电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要求中共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罗斯福认为没有理由拒绝中共的正当要求。3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用很委婉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这样，国民政府才决

定在代表团中容纳中共代表。

3月26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1人，暨无党派者3人，《大公报》社长（胡霖）亦在其内。”中共代表的选定，经顾维钧提议，由董必武参加。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代表团名单：

首席代表（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

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

王宠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魏道明（驻美大使）

胡适（前驻美大使）

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李璜（青年党）

张君勱（民社党）

董必武（共产党）

胡霖（大公报总经理）

此外，还有顾问、专门委员会成员、秘书、随员等。中共党员陈家康、章汉夫，也以秘书身份参加代表团。

46国代表团于4月25日到达旧金山。当天，中国代表团的6位成员发表讲话，董必武的讲话尤引人注目。他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诚是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4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布满46国国旗的歌剧场，有史以来的空前的国际盛会——联合国大会隆重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庄严地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各国代表经过两个月的充分讨论，制定出《联合国宪章》，50国（开会间又增加4国）代表团正式通过了这一国际法典。6月26日，各国代表在宪章上签字，中国是第一个签名的国家。

会议结束后，为筹备正式的大会，推举14个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联合国正式机构成立前的过渡性组织，中国为其中之一。

10月24日，美国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宪章业经中苏法英美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批准，定于是日起发生效力。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举行成立大会于伦敦。”筹备工作由此全面展开。

50年前倍受欺凌的中国，以世界强国的身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七、苏联代表团愤然退出联合国议事厅，不啻在世界扔下一颗炸弹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为罗斯福致力于使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杜鲁门政府明智的话，本应从罗斯福梦想中清醒，冷静地对待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生的中国，但是它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军事上威胁、经济上扼杀的同时，主要是在政治上更大限度地孤立中国。在它的操纵下，新生的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了艰难地重返联合国的历程。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会议筹备召开之际，而代表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5年6月26日，当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一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此，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的根据。因此，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电文并请他们答复以下两个问题：(1)何时开除国民政府的非法代表团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2)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8月，当第五届联大筹备召开之际，周恩来外长再一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中国首席代表，请他立即办理中国代表的入会的一切手续。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

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此时已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为圭的两大世界阵营。作为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它所奉行的“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总幻想有一天可以本利再收,依然把国民党政府推到前台。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来设置重重障碍了。

截然不同是,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8日的声明后,立即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国民政府的决议,并郑重声明,在这项决议未做出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虽然苏联的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会议主席的地位,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月13日,这项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在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认为是非法的。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当时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3月8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两个敌对政府并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谈,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3月10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什么政府应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问题”的声明,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关于什么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决定”。为此,从4月22日到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赖伊的此次出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联对赖伊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赖伊访苏期间,中国驻苏大

使王稼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出访结束后,赖伊向各会员国发出公函,强调国际形势的严重性,而这一严重性“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改进是不可能的”,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这一问题。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为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当赖伊的备忘录提出的第二天,格罗斯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虽然美国政府反对北京政府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的立场不变,但它将接受安理会多数票的决议。这就是说,美国不会把它的否决票算作是行使否决权,仍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属于程序性事项。美国此举是在玩弄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阴谋: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国民党政府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对此,当时驻美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顾维钧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苏联退出安理会的举动,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处于极度的恐慌和尴尬的局面。当赖伊的备忘录发表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发表了与美国有歧异的声明,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非像格罗斯所言的是个程序问题,而是属于实质性问题,并扬言要行使否决权,蒋介石也为此发来电文表示对时态的关注。顾维钧专门与蒋廷黻商讨对策,虽然他们都已看到“苏联、英国和赖伊都想以国民党政府不复存在为理由,把我们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向蒋介石献策:“我们与其为了害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进行抗议。”也就是说,为了“不给中共进入联合国打开方便之门”,国民政府要困兽犹斗了。

苏联的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的有力支持,并使各国更加关注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它的退场,也失去了在安理会内就此进行协商和斗争的机会,因为随后安理会再也未形成提案和再辩论这一问题。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关系的复杂化,赖伊也因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而中断了斡旋活动,美国则趁机在联合国施展手段,使本有可能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陷于旷日持久的拖延状态。

八、爱德礼劝杜鲁门：“两张否决票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1950年6月25日，处于当时“冷战”的世界局势的夹缝中的朝鲜，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宣布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使得新生的中国硬被拖入了朝鲜问题的争端。这时，联合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联合国难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为此，作为中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印度进行了斡旋活动。

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事先征得中国的同意后，分别致信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由苏、美、英、中等国通过在安理会内外的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斯大林对此表示极大的支持，而美国则断然拒绝，导致斡旋活动搁浅。

这年9月，5届联大召开，印度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向大会提出接受中国参加大会的提案。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并向大会提出两项决议草案：(1)大会议决国民党集团之代表并非代表中国，不得参与大会及大会各机关之工作；(2)大会议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大会及其机构之工作。虽然大会成立了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七国特别委员会”，但它所作出的决议却规定，在未作出结论之前，仍允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并与其它国家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这项决议，不但使印度和苏联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意味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将再一次被拖下去。

但是，这种拖延的局面已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一直是美国行动的得力支持者的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倒是持有冷静审慎的态度。这年的12月，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艾德礼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向杜鲁门提出了忠告：

艾德礼：英国人不同情蒋介石，对所谓的福摩萨（即台湾）问题不感兴趣。美国应考虑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以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并同时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艾奇逊：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务是相当重要的，如把它交给敌人，美国的岛屿链条防线将会断掉一节。

艾德礼：台湾终究要还给中国人的，这是美国应该正视的现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的话，最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一员，反而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因为在联合国内谈比在联合国外谈要好得多。这样，西方也可能少丢点面子。

杜鲁门：现在联合国有一个苏联已经让西方感到棘手，中共若进入麻烦将更多。况且，即使中共进入联合国，美中关系能否比现在更好？

艾德礼：即使美中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好，两张否决票（指苏、中）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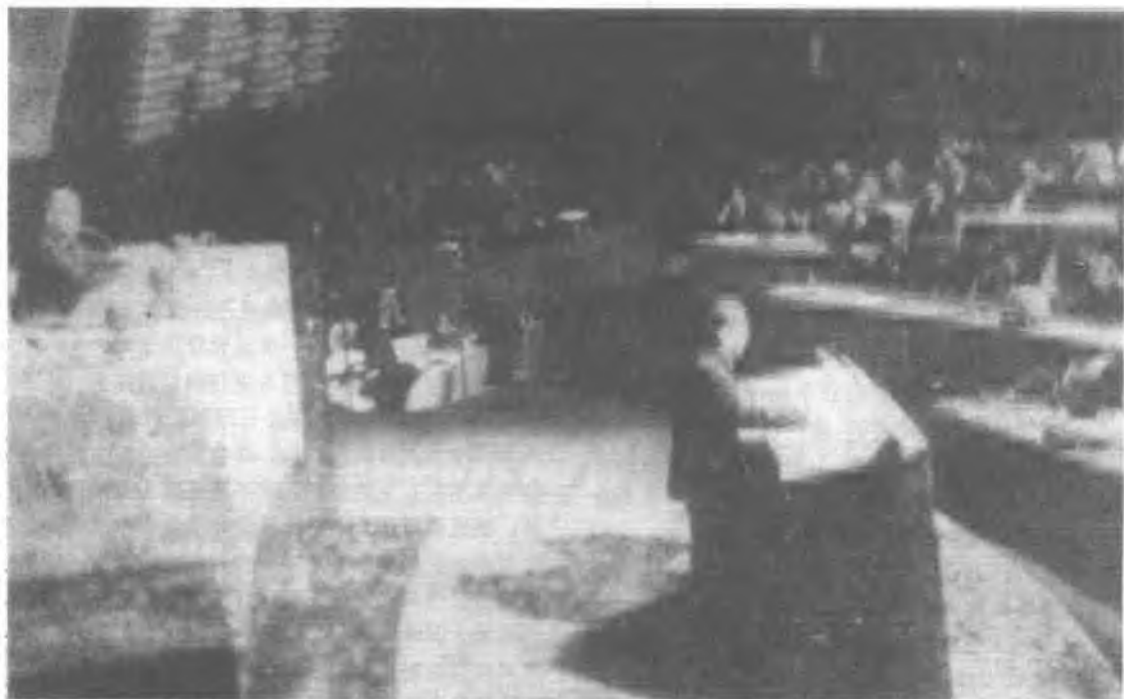
应该说，英国对美国的忠告是正视现实的，但是美国却对此置若罔闻。在会谈后的公报中表明，“美国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51年11月举行的6届联大上，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将这一决议延续达十年之久。

中国对美国的行径进行强烈地谴责。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外长即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侵略的工具。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但是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中国对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充满信心。因为到了六十年代末，新中国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打破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同时逼来的威胁，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稳定了南北边陲的局势。中国还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这样，新中国不仅在惊涛骇浪的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形势下，虽然美国依然老调重弹，但是，在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这一结果，意味着美国强行阻止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虽然如此，美国依然不肯放弃它所扮演的“世界宪兵”的角色，一计不成又施二计，在中国通往联合国的道路上，美国又设置了新的障碍。

九、尼克松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1961年，第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



1971年11月乔冠华团长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但是，美国仍在程序上玩弄花样，它又串连日本、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意大利向大会提出所谓“重要问题”的五国提案，并为大会所通过。美国的这一花招，目的在于使它一旦处于少数地位时也可以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对于美国挟持联合国采取的这一行动，中国政府表示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196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这一新手法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因为宪章规定的“重要问题”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入、会员国权利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等，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根本不属于上述范围之内；同时，宪章还明确规定不得干涉会员国的内政，而美国硬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企图使早已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实际上就是明显地干涉中国的内政。

此后，虽然美国仍操纵大会年复一年的通过所谓的“重要问题”的提案，但是，联大表决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却逐年增多。到了1970年的25届联大，支持驱逐国民党的代表的已达到51票，反对的已降到47票。这是自1950年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席位

问题以来第一次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它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顽固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尽管如此，美国仍困兽犹斗。此后不久，尼克松政府又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向第26届联大抛出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针对美国这一要在联合国内明目张胆地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召开。提交大会讨论并要付诸表决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有3个：（1）由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2）由美国、日本提出的所谓“逆重要问题案”；（3）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大会从10月18日开始辩论和审议中国

代表权问题,到25日结束。大约有80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纷纷批评和谴责美国对华的错误政策,反对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美、日等国虽然极尽拉拢之能事,但依然陷入孤立状态。

10月25日晚9时47分,大会进行表决。首先表决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大会的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了,热烈的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地“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接着就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会议大厅里再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双重代表权”案还没有来的及表决就自动夭折了。20多年来美国所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国民党外交部长周书楷率领的代表团眼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退出了联合国。

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

十、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利克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走进会场,在中国席位上就座时,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终于决定纠正了它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捷克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动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荷兰代表西欧国家说,现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无疑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有更大的权威。”布隆迪代表非洲国家说:中国代表回到联合国,“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大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 and 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

合会员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随后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国支持一切被压迫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支持亚非拉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国要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与此同时,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也根据联大决议精神相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这些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陆续恢复了在这些机构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所阐述的主张,也是中国后来在联合国各项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日月如梭,从1945年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又过去了。如果说前半个世纪(1895—1945)是中国人民摆脱屈辱走向自立的时期,那么,后半个世纪尤其是1949年10月以后,则是中国人民由自立到自强创造辉煌的时期。中国走进联合国和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则成为历史巨变的标志。

度过了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燕子低飞”的艰难时期后,中国的外交迎来了“凯歌行进”的大好形势,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被誉为国际关系重要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联合国指导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邓小平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解决了半个世界前所无法解决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如今,中国改革后所带来的经济的腾飞,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人在100年前所发出的“谁了解中国谁就可以执世界五百年政治之牛耳”的感叹,已越来越成为世人所有目共睹的现实。

在纪念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50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了50多年前为联合国的缔造付出过辛勤努力的罗斯福。如果他在世,目睹了当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也一定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假如没有中国,假如……”

(责任编辑 洛松)

忻口战役国共协同作战纪实

● 马仲廉

1937年10月25日，在延安凤凰山麓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说：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意义的。”

此刻，在山西前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与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协同，在雁门关以南，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同进攻的日军血战。

一、内长城部队全线撤退， 阎锡山乘驴进入五台

1937年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了山西省内长城中国守军防线，继而向华北战略要地太原展开进攻。

本来，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9月25日取得平型关大捷后，阎锡山改变了原在砂河与繁峙之间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决定在平型关外消灭进攻的日军，而且他本人也于9月29日由岭口行营到达平型关前线的大营镇督战。不料日本关东军一部突破茹越口守军防线后于29日进占繁峙城，进入内长城线以南，切断了平型关方面守军的后路。阎锡山不得不在当日夜间接令内长城防线守军全线撤退。

当夜，阎锡山由平型关南的东山底村向五台山转移。但由于繁峙被敌人占领，经繁峙转峨口入五台山的公路已经不通，阎锡山只好骑了一头毛驴在随从人员的护卫下，乘着月色沿深沟大道直奔五台。拂晓接近台怀镇的时候，他下了毛驴打算步行，但道路泥泞，行走

困难，抬头向前望去，突然看到光明寺的灯火，他竟然顺口吟道：

“雪天彻夜走清凉，飞灯光辉遍山梁；
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泥污衣带霜。”

其实那天没有雪，他看到的是地上的霜。这首即景生情的急就章，确实流露了当时阎锡山的几分心灰意冷。

阎锡山于10月1日离台怀镇返太原途中，特在五台县豆村短暂停留，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会晤，商讨了下一步对日军作战问题。

阎锡山回太原后即着手保卫太原的作战部署。在他痛感兵力不足和时间紧迫的时候，他接到了蒋介石10月2日“即派第十四集团军所部增援山西”的电报。阎锡山心情为之一振。他决定在忻口及其两侧地区组织防御。鉴于集中从内长城线上撤退下来的部队到忻口地区和从石家庄运送入晋的第十四集团军都需要时间，而入关的日军则将乘胜发动进攻，所以，阎锡山一面命令由雁门关撤退下来的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指挥所部坚守崞县，第一九六旅坚守原平；一面要求八路军在日军的侧后展开袭击，以迟滞日军进攻，掩护战区主力在忻口地区布防。阎锡山还于10月2日将守天镇不力的原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枪决，以示坚决与日作战之决心。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0月3日命令第一二〇师主力协同晋军独立第七旅，利用神池、宁武西南山地迟滞日军进攻，并派出干部到第七旅帮助工作；宋（时轮）支队尽力破坏雁门关、岱岳镇、怀仁一带桥梁、道路、电线，袭击日军的小部队；李（井泉）支队在利民堡、神池、八角堡三角地区之间尾袭南进之敌。

二、阎锡山以十个团交朱、彭指挥，毛泽东指示前方各将领对国民党交给指挥的部队必须爱护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于10月1日晚命令第五师团并指挥进入内长城以南的关东军向太原进攻；又命令其第一军突破石家庄一带中国守军防线向南追击，以一部进入井陉以西地区策应第五师团作战。

阎锡山计划的忻口防御战役的军队部署，分中央、右翼、左翼和预备军四个部分，分别以卫立煌、朱德、杨爱源和傅作义为总指挥。阎锡山以晋绥军十个团归右翼军朱德指挥；同时，位于神池、宁武地区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归左翼军杨爱源指挥。在此之前9月中旬，阎曾向共产党方面提出建议，在战争形势不利时，以八路军和晋绥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他认为五台山纵横200里，周围600里，共26个口子，民众20余万，配合八路军和晋绥军其他部分，定可与敌周旋。他真诚地提出，如毛泽东、朱德同意，请及早告诉他，以便早作准备。对此，毛泽东回复表示完全同意，同时提出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其它方面的意见。这时，阎锡山将晋绥军十个团的兵力交朱德指挥，也表现了他同八路军合作的诚意。

在朱德将阎以十个团交八路军指挥的情况报告中，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于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前方各将领，指出：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采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10月8日，八路军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正确对待友军，其中说：“最近我军在与友军接触中，发现有个别下级干部和战士在态度上表现骄傲，甚至有耻笑友军退兵为运输队者，这不独很易引起友军反感，且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我们对友军的态度应表示谦和诚恳与和气，绝不应高傲，要以我们的作战英勇，对民众亲爱关系的模范去影响他们，各部队应进行教育。”

在此之前的10月5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还曾应阎锡山之邀到第六十一军帮助指挥。徐后来回忆此事曾说：“朱总司令让我与黄永胜和另一位同志（第二方面军的，名字记不清了）组成一个小组，去做友军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提高士气，稳住阵脚。我们在豆村、台怀镇、东冶镇等地展开活动，陆续会见了杨爱源、李俊功、田世俊、金宪章等阎军长官，讲了些抗日道理和带兵经验。针对他们部队纪律败坏的现象，着重讲如何加强政治工作，如何爱护民众、团结民众、依靠民众的问题。因我一五师平型关一仗杀出了威风，八路军名声大震，因而国民党官兵见到我们，显得格外尊重，也表示愿意向八路军学习。”

毛泽东对抗战初期山西国共精诚团结、一致抗战的大好局面，曾予以充分肯定。他说：“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三、日军开始进攻崞县、原平，周恩来、阎锡山、卫立煌协商战役计划



在雁门关南伏击战中击毁的日军用汽车正在燃烧



在袭击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第七六九团三营长赵崇德烈士

大军压境，情况紧急；

日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独立第二、第十五旅团，10月3日在代县及其附近集结后，4日开始围攻崞县、原平，与守军展开激战。日军另一部占领朔县后，向阳方口、宁武方向展开进攻。

援晋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4日到达太原后，阎立即与其会晤，并请周恩来参加，一同商讨忻口战役作战计划。

会商开始，阎锡山首先讲了他的设想。他决心以忻口为必守阵地，分左、中、右三个地区，主力集中在中地区，待部队调整后，中地区部队向代县、忻口之间的敌人出击；右地区部队向代县、平型关间侧击；左地区部队钳制进攻宁武之敌。

周恩来提议，立即令王靖国第十九军一部守崞县钳制当面之敌，以大部星夜回击围攻原平之敌而歼灭之，以掩护中地区部队集中。即调八路军王震部第三五九旅归还第一二〇师建制，加强左地区力量。即电程潜增加两个师兵力来加强中地区的防御兵力。电请南京另派三四个师实施战略上的出击。立即组织并武装正太、同蒲铁路上的员工和井陉、阳泉的矿工，准备破坏铁路、矿井。

对于周恩来所提建议，阎、卫都表示同意并照办。

关于忻口战役的具体作战方案，约定翌日同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一同商谈决定。

当日，周恩来将同阎、卫会商情况电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请他们将意见立即见告。

毛泽东当即于5日下午3时复电周恩来并致朱德、彭德怀。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周与阎等共商决定的作战计划，并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第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砂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砂河、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向北突击，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王震部第三五九旅速归还第一二〇师建制。第一二〇师除游击支队外，主力此刻应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时，第一一五师又已实行向大营、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长城袭击朔县、应县一带，与一一五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第一二九师以一个团位于孝义，主力位于包括娘子关在内的正太铁路侧后，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及两侧农民战略上策应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巩固后路。

6日凌晨1时，毛泽东又致电周、朱、彭并告林彪、聂荣臻，提出关于作战问题的补充意见。他对敌情作了细致的分析与判断，并对在山西境内的中、日军队实力作了对比，然后指出，此战役之关键在于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敌后方之破坏。为达上述目的，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要求卫立煌军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2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2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毛泽东特别指出：“在一一五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枝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这里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利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惜大量减员的无私与无畏。

四、周恩来提出具体作战方案，忻口战役计划最后决定

10月4日晚间，傅作义由前线回到太原。5日上午，周恩来、卫立煌、傅作义等一同商讨忻口战役作战方案。周恩来提出，我军应以忻口山地为固守阵地，诱

敌到代县、忻口之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其部署，应以第五十四师固守忻口阵地；以现在崞县、原平线之晋军十二个团节节抵抗敌人；以刘茂恩第十五军及晋军一部在忻口东北山地集中，一部固守滹沱河东岸山险，以第十四集团军3个师1个旅，高桂滋第十七军及晋军主力集中忻口及其西南山地；以一部在忻口西北山地迟阻宁武南下之敌。左、右两地区除王震部第三五九旅西移外，其余照朱德、彭德怀原定部署。

周恩来接着提出部队的行动计划：即以右地区部队和左地区部队对日军游击，以破坏和阻击敌人的前进计划，使我主力得以在中地区集中，还提出电程潜增加曾万钟的第三军或冯钦哉的第七军来晋作战。

卫立煌和傅作义完全同意周恩来所提作战方案，并表示力争在忻口以北地区取得胜利。新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5日夜由南京抵达太原后，6日上午，阎锡山又召集周、黄、卫、傅根据前一天所定作战方案，作出了正式的作战计划，并下达各部队。

第二战区忻口战役作战计划决定的方针是：“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家庄、1482高地迄阳方口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以一部占领五台山、罗圈沟、峨口至峪口之线，另以主力之一部占领中解村、阳明堡、虎头山、黑峪村之线，竭力阻止敌之前进，不得已时，撤据崞县、原平、轩岗一带，逐次消耗敌之实力，以掩护大军之集中。”

指挥官：右翼军为朱德总司令、中央军为卫立煌总司令、左翼军为杨爱源总司令、总预备军为傅作义总司令。

这一作战计划的酝酿，商讨到最后决定，都是经过国民党第二战区方面同共产党八路军方面反复研究制定的。其中，周恩来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

五、八路军部署配合正面友军作战，周恩来向阎提出作战方面新建议

根据国共双方共同制定的忻口战役作战计划，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协同友军展开战局，保卫山西之任务”于10月6日电令：第一一五师以待机姿态，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略取浑源、应县。第三四三旅进至五台，台怀以东之麻子沟、白堂子附近地区，封锁消息，侦察平型关、大营镇敌情、地形。第三四四旅进至石咀、台怀镇间之白头庵、

前后石佛镇地域，侦察沙河、龙泉关之线敌情、地形。独立团暂在上寨、下关、冉庄，迅速补充棉衣、弹药后，进至浑源、大营镇、灵丘之间，向繁峙、应县、浑源积极活动，尽可能切断广武、山阴段公路，与宋支队东西呼应。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主力，应即配合晋军独立第七旅夹击宁武以南之敌，得手后，集结义井镇附近待机。宋支队背靠岱岳镇以西山地后，立即向岱岳镇、怀仁、山阴活动，破坏公路交通。王震率所部三五九旅进至忻县以西后，即归还贺龙、萧克指挥。第一二九师和第六十一军，另行规定。

电令发出后，朱、彭随即于当日12时又电令第一二九师由同蒲铁路运至河边村转五台，准备协同一一五师从台怀间向平型关、繁峙、浑源出击。

这时，日军正在加紧攻击崞县、原平，并有一部由朔县向阳方口攻击。

10月3日，日军一部攻击阳方口晋军独立第七旅阵地。该旅退守段家岭、瓦窑、焦家寨、轩岗一带，日军随即占领宁武城。6日下午2时，日军独立第二旅团猛攻崞县城，独立第十五旅团同时猛攻原平。我崞县和原平守军分别将日军击退。7日，日军突破崞县城垣，守军第十九军退出崞县城转移。攻击原平的日军与守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克服浑源城

军形成对峙。10日，日军再次猛攻原平，并以一部侵入原平以南地区。守军伤亡惨重。11日，日军继续猛攻。姜玉贞旅长在指挥残部同日军搏斗中殉国，部队伤亡殆尽。原平遂陷。

截至10月11日，战区部队主力各部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占领阵地。

由于崞县、原平失守，日军即将全线攻击忻口守军阵地，周恩来于1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准备向阎锡山、黄绍竑建议，说明保卫太原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提出八路军应以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主力及第一二九师入晋的先头部队第七六九团截击日军近后方，配合忻口防御的中路地区部队作战。如中路战况激烈，第一一五师应实行原定计划，求得繁峙以东的胜利，振奋全国。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到达后暂箝制宁武之敌，以发挥我左、右翼军的积极作用。

当日，周恩来同阎锡山会晤，提出上述建议。阎表示赞同，并希望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和总部特务团及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继续在崞县、代县间截击袭扰敌军；第一一五师等候忻口正面交战激烈的时候再动；第三五八旅东向神山、大牛店之日军扰击，并切断轩岗至大牛店的铁路，以配合中路作战。阎并提出可以派炮兵协助一一五师、一二〇师攻击敌人。对此，周恩来认为，第三五八旅仍在轩岗以南山地，而以第三五九旅王震部改向神山、大牛店扰击敌人。这样，北可与第三五八旅呼应，南可响应正面卫立煌所部出击。

13日，朱德、彭德怀电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并告贺龙、关向应，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最好从崞县、轩岗间由北向南袭击大牛店之敌侧背，与轩岗独立第七旅联络，如需要炮兵协助，即向第七旅交涉。

六、日军对忻口正面守军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八路军从东西两翼侧击日军配合正面作战

忻口是一较大村落，位于忻县城北50华里处，同蒲铁路贯通南北。村西北部为红土高梁，梁北的云中河流经忻口北约2里的界河铺汇入滹沱河。滹沱河在此由南经灵山脚下折向东北。这样，忻口村被夹在红土高梁与灵山之间，成为南北之间的险要孔道。而左、右两侧山地向东、西延伸，成为对北方的天然屏障，易守难

攻。卫立煌指挥的战区部队主力，就部署在忻口及其两侧山地。

阎锡山判断日军将于13日对忻口阵地发动全线攻击，即令傅作义率预备军大部开赴忻口一带，加强忻口阵地中央兵团作战。

10月13日拂晓，日军以独立第十五旅团、堤支队为右翼队，第五师团主力为左翼队，在飞机30余架，战车五六辆及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忻口地区守军左翼兵团和中央兵团阵地猛烈攻击。攻击的重点置于左翼兵团和中央兵团的结合部的阎庄、南怀化阵地。日军步兵伴随坦克、装甲车迅速越过云中河，冲入守军第一线阵地。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当日，日军突破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并继续扩大突破口。卫立煌急调第二十一师李仙洲部归第九军军长郝梦麟指挥，竭力恢复已失阵地；并令第六十一军独立第四旅增援。

八路军为配合正面守军作战，在敌人进攻的翼侧和后方广泛出击。属右翼军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进袭灵丘、广灵两城；第三四四旅一部袭击团城口，该旅第六八七团占领平型关，并将团城口与东河南之间的公路破坏10余里。属左翼军的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于12日袭击崞县北十里铺之敌，接着于13日袭击大牛店；宋支队在岱岳、怀仁间袭击敌人；师直属部队在独立第七旅协同下于13日夜收复宁武城。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到达代县、崞县间袭扰敌人。总部特务团一部于12日袭击代县城后，即在代县、繁峙间展开活动。

14日，卫立煌命令守军对日军反击，希望八路军予以协助。对此，朱德、彭德怀命令第一一五师派三四四旅一个团占领平型关，相机袭占团城口和大营镇，袭击敌人运输汽车和破坏道路；独立团除一个营在涞源地区外，主力向灵丘、广灵之间活动。

当日拂晓，忻口守军中央兵团第二十一师向南怀化、新炼庄之敌展开反击，但在日军强大火力压制下，伤亡惨重。日军随即实施反扑。中、日两军展开激烈战斗。李仙洲师长负伤，反击部队受挫。第二十一师被迫退出战斗。中央阵地线上的制高点1300高地被日军攻占。卫立煌急令左翼兵团派一个团封闭1300高地突破口，协助中央兵团稳定了局势。

15日拂晓，日军继续攻击南怀化东南，忻口村西北高地。卫立煌、傅作义严令守军坚守阵地。但在日军强大火力轰击和步兵的激烈冲击下，守军虽与敌人顽强拼搏，第二线阵地依然被日军冲入。这时第六十一军陈长捷率部驰援到达，并立即加入战斗，夺回部分已失阵地，而后与敌人对峙在已被日军占领的南怀化东北高地。

配合正面守军作战的右翼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在平型关至小寨村之间截击日军运输汽车数十辆，平型关至代县的公路已完全切断。左翼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于14日攻占原平西南的北大常和永兴村，毙伤日军一百余人。

七、卫立煌半日折三将，忻口正面守军全线反击失利

为了巩固阵地并收复南怀化，卫立煌、傅作义决心对日军举行全线反击。为此，阎锡山将预备军一部和右翼军指挥的晋绥军一部驰援忻口。要求右翼军打击增援的日军和可能退却的日军。朱德、彭德怀接到卫、傅的电报后，于15日上午8时致中央地区左翼兵团总指挥李默庵，要求该部派出兵力一部，协助右翼军八路军所部出击。

15日夜10时，卫、傅接到了阎锡山批准反击作战的电报，并对夺回1300高地和南怀化者赏洋50万元。

1300高地在南怀化南面偏东处，是整个高地的制高点。日军占领南怀化和1300高地，就是在守军中央兵团阵地打入一个楔子。中、日两军阵线在这里形成一个漏斗状。日军在漏斗的内沿，守军在漏斗的外沿相对峙。当时决定反击这一地区的部队共计4个多旅；另以第三十五军越过云中河袭击日军近后方；左、右翼兵团同时出击配合作战。

16日凌晨，忻口地区守军各部对日军展开反击。由于部署欠妥，又是夜间作战，战斗一开始即与敌形成混战状态。

反击战斗开始后，第九军军长郝梦麟偕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和少数随从人员到忻口西北高地督战。郝发现独立第五旅方向上毫无动静，便向该旅方向的前沿阵地走去。在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线时，郝身中十余弹倒在血泊中。刘家麒急忙前往抢救，也身中数弹倒地。独立第五旅方向所以沉静，是因为该旅冲击1300高地时损失惨重，郝廷珍旅长阵亡，该旅退了下来仍回到原出发地。这样，不到半日时间，卫立煌指挥下的三位将军，在同一个高地争夺战中阵亡。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中是极为少见的。

郝梦麟军长在率部由贵州省北上抗日途中，曾于9月15日给子女留下遗书说：“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应听母亲的教训，孝顺汝祖母老人。”在忻口战役全线展开之前，他又于10月10日写



忻口前线中央兵团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烈士

信给其家属，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郝、刘、郑三位将军的殉国是壮烈的，是值得后人悼念和学习的。

忻口前线中央兵团反击南怀化和1300高地日军的战斗，不仅没有达到收复已失阵地的目的，而且伤亡达数千人之多。16日，参加反击日军的部队依然退到原来攻击出发阵地固守，同日军形成对峙；配合中央兵团作战的左、右翼兵团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至此，全线对日军的反击作战以失利而告终。

从17日起，中、日两军在忻口一线形成胶着状态。战斗仍然每日在进行，但日军已无力举行大规模的进攻，守军也无力实施大规模的反击。

八、八路军活动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击毁阳明堡日军机场

为了巩固忻口正面阵地,消灭忻口地区的日军,阎锡山将预备军继续投入忻口正面中央兵团地区作战,并将左翼军和右翼军的大部兵力抽调到忻口正面作战。右翼军只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左翼军只剩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和晋军独立第七旅作战。

在此期间,周恩来、彭德怀曾到忻县卫立煌指挥部与卫会晤,了解前线战况并进一步商谈了两军协同作战问题。处于日军侧后的八路军各部则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协同正面友军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

第一一五师独立团,10月15日在冯家沟伏击敌人后,乘胜于16日收复广灵和紫荆关;18日一度克服易县城;23日克服灵丘;26日收复蔚县。一二〇师命令三五八旅由北向南,三五九旅由西南向东北,夹击大牛店之敌。随后,两个旅进到雁门关、崞县地区。18日,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的黑石头沟伏击敌人汽车队,消灭日军500余人,并占领雁门关和太和岭;23日,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在王董堡伏击敌人运输队,截断敌人通往忻口的主要交通线。24日,七一五团在原平以西的北岗村消灭日军一个骑兵中队。

这样,平型关和雁门关要隘被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收复。截断日军由张家口、大同至忻口前线的通道。使日军所需弹药物资主要靠空运维持。

进攻太原的日军第五师团受阻于忻口地区,后方联络线又被八路军不断袭扰。但是忻口防御阵地上的部队仍然不断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并不断遭到在飞机支援下的日军的局部攻击。这已成为忻口守军急需解决的问题。活动在崞县、代县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便决定攻击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堡机场。19日凌晨1时,第七六九团第三营隐蔽地接近日军机场,对守卫机场的日军和飞机突然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消灭日军百余人,毁伤敌机24架。营长赵崇德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一战斗的胜利,削弱了日军的空中力量,直接支援了忻口正面友军的防御作战。

战后,朱德总司令总结作战经验时说:“我军以配合由卫总司令指挥扼守忻口正面英勇抗战之军队作战,分派许多游击支队在敌主要后方联络线上到处袭击,断绝敌人交通。”

九、正太路方面娘子关失守,忻口地区守军撤退

忻口前线正面,中、日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后,每日都有局部的规模不大的攻防战斗。日军运用了对壕作

业战术。守军也实施反对壕作业措施。10月24日,日军萱岛支队由大同调到忻口前线投入战斗。板垣师团长再次组织兵力攻击守军忻口地区阵地,但仍毫无进展,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但是由于正太路方面中国军队失利,影响了忻口地区守军的防御。

虽然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一五师主力于10月下旬由五台地区南下正太路和一二九师一起协同友军作战,阻止日军西进不断取得胜利,可是不能挽救娘子关正面友军的失利。

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接着平定、阳泉相继被日军占领。部队向太原方向溃退。忻口守军侧后受到严重威胁。为组织太原守城作战,阎锡山于10月31日夜决定忻口地区守军全线后撤。

忻口前线守军各兵团在卫立煌指挥下,于11月2日黄昏后脱离阵地,忻口战役至此完全结束。八路军与国民党第二战区部队在晋北前线的战役配合作战也随之结束。

忻口战役从日军10月4日攻击崞县、原平开始到11月2日守军撤退为止,时间1个月,这一战役中、日双方军队均损失严重。中国军队伤亡达55,000余人。日军伤亡人数没有准确资料,说法不一,有2万余、3万余、4万余的不同估计。笔者根据日军直接参战兵力估计,以1万余人较接近实际。战役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结束。但它不仅给予日军严重打击,而且阻敌于云中河盆地无法前进。日军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是国共两党两军精诚团结,协同作战所取得的成果。当然,从地形条件,兵力对比等方面,中国军队占有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卫立煌于11月4日到达太原,见到周恩来后,情不自禁地向周诉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要不是娘子关方面的情况变化,我们真能够把板垣师团歼灭个差不多。这件事情没有完成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又说:“没有把一二九师调去打阵地战是做对了。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于八路军表示感谢,感谢!”

由于晋北、晋东两个方向上日军的进攻,太原于11月8日失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为主要地位。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时期。

(责任编辑 洛松)

“文革”后同“两个凡是”的那场斗争

● 南东风

1976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地迈进第27个年头的时候，饱受十年“文化大革命”之苦和在林彪、“四人帮”长期高压磨难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民，几乎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就又经历了几上几下大悲大痛的感情上的巨烈撞击。可是无情的历史似乎又作了有情的安排，竟以一个让人心大快、举国若狂的大喜结局，结束了这不幸而又大幸的一年。

1976年，这一年发生的几件震撼人心、并将永载史册的大事，就是：

——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

——清明节前后，北京爆发了百万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吊唁周恩来总理的活动。随后被“四人帮”镇压，宣布“四·五”天安门的群众行动为“反革命事件”。同时，在1975年重新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宣布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7月6日，共和国受人崇敬的朱德委员长逝世；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死亡群众超过24万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唐山顿时被毁灭；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6日，为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被中共中央一举粉碎。

虽然在这一年的头10个月中，就这么集中的发生了一连串从极悲到极喜的大事，全国人民承受的心灵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历史终究还是要按自然规律继续延伸，共和国的命运不会因三位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先后去世而停滞。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扫万里乌云，全国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局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忧国忧民的普通百姓都在思索着、企盼着、等待着。

10月6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行动以后，政治局旋即召开会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在这之前，也就是在“四·五”天安门群众行动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的同时，由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应该说，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华国锋是立了功的。但是，当时若没有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师和老一辈领导人对他的大力支持，向他献计献策，华国锋要下这么大的决心，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也是难的。但他毕竟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是感激他的。因此，当中共中央宣布这个决定后，全国人民都顺理成章地拥护他、接受他并寄期望于他。

可惜的是，华国锋在集党、政、军大任于一身之后，并未像全国人民对他期望的那样，成为新时期的开拓者。相反，他把自己深深地圈在毛泽东巨人的影子里，借助于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来树立对自己的威信。他牢牢抓住毛泽东生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哪怕是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也不更改，并据此作为他指挥、处理国家大事的最高准则，直至提出“两个凡是”的思想方针，他就只能扮演这个历史转型时期中的过渡人物了。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思想方针，决不是思想上或理论上的一时误识，它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鲜明的针对性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开始，到后来调到中央工作，他都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路线。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毛泽东提为接班人以后，更是按照毛泽东的威望和指示领导全国的工作。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也只能仍然依靠毛泽东的权威，执行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来巩固和树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因此，华国锋抛出“两个凡是”的思想方针，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

“两个凡是”成了阻碍中国社会继续进步和开创新时期新局面的严重障碍。那么,谁来驾驭中国这只巨轮破冰前进?谁来担负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未来新境界的重任?邓小平,由于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建树的巨大功勋,特别是在1975年重新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后,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为恢复国民经济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使他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时代呼唤他、人民呼唤他。

艰难的复出

随着“十月的胜利”,全党和全国人民渴望着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能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可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过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清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10月9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不同意。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李先念马上表态支持叶帅的建议,说:“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华国锋仍然不表态。

华国锋有他自己的主意。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掌握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的,当务之急,是要借重毛泽东的旗帜和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先要在政治上稳住脚,就必须大搞对毛泽东和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也就必然要以维护“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理论观点为已任,表明自己是毛泽东的可靠接班人。他把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左”倾错误的呼声,很自然地看作是对他的严重挑战和威胁。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可是华国锋在会上的发言和下发的讲稿中,还是坚持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说什么“四人帮”的罪行只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还说坚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不能改变。

华国锋在会上还把邓小平的问题同“四人帮”余党

的反革命翻案联系在一起,向与会者印发了一个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材料。华国锋利用这个假案材料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他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言下之意是要邓小平作检查,承认错误。

就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老同志针对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陈云发言中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他们的发言,虽然受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不让登会议简报,却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特别是在老同志的压力下,华国锋在会上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当然,华国锋所谓的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有条件的。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明确提出邓小平出来之前要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广大干部群众长达九个月(1976年10月至1977年6月)的斗争,终于在这次全会上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对于历经风雨的邓小平来说,算是一次艰难的复出。尽管如此,十届三中全会这一迟到的组织决定,深深地体现了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

意愿，这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观点，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对于时代的转换，具有重大的意义。

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较量

事实上，华国锋早在打倒“四人帮”不久，就提出了他的“两个凡是”的思想。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的汇报后，提出：1.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3.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4.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这里，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基本思想。紧接着，11月30日，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也讲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稿中。接着，又提出要把“两个凡是”的观点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同全国人民要求纠正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议论相背离，其目的和用意就是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

华国锋提出他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后，立即受到邓小平、中央的许多老同志及全国人民的反对。1977年4月，邓小平在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在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等的谈话时又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汪东兴、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他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邓小平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把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和如何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思想理论界开始出现了一些突破“两个凡是”的文章，增强了抵制错误方针的斗争信心与力量。

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虽然华国锋在会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全会闭幕时，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认识。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复出，给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鼓舞，他们继续为平反天安门事件呼吁、同坚持“两个凡是”的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等内容外，仍错误地认为中共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并高度赞扬“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重大作用，认为我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核心——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里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时，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并且坚持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报告根本不提“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犯的严重“左”倾错误，并认定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而我们党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报告甚至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求全党继续贯彻毛泽东晚年的“左”倾理论观点。

虽然十一大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对华国锋政治报告中的错误理论观点和他工作中的错误给予尖锐的批评，但华国锋并没有接受这些意见，相反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理论和观点。

针对上述情况，8月18日，邓小平在大会致闭幕

词中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良好的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这次大会，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虽然没有得到纠正，但是，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彻底纠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呼声是愈来愈高了。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接着逐步在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带来了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华国锋等极力阻挠扼杀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等报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汪东兴说，他同华国锋商量过，《红旗》不要表态。汪东兴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斥责登这篇文章的负责人“没有党性”。随着讨论的深入，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先后写文章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后表态的是湖南省。原因在于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特别打了招呼，要他们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要表态。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指出，《光明日报》的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扳不倒嘛。30日，他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又有针对性地说：只要你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样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他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中，坚持实事求是，同违背这一原则的错误倾向反复斗争的历史事实，深刻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所讲的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他批评了有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违反中央精神的。他明确指出，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才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他号召全党全军，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广大与会代表强烈呼吁：所谓“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中央应肯定这次运动。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其后，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分别作出决定，郑重宣布平反，作了类似处理。

与此同时，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也分别发表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和《四五运动永放光芒》等评论员文章。最终在“两个凡是”压制下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得到了彻底平反，全国人心又一次大快。

迫于当时的形势，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不得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他说，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在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

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汪东兴也作几句不像样的检讨和说明。但是,他们只是讲了一些情况,没有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实事求是思想和“两个凡是”长期较量后获得的决定性的胜利。

吹响新纪元的号角

1978年底,中国经过两年徘徊,终于拉开了新时期的大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是结束这两年的过渡、开始吹响的历史性伟大转折的进军号角。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由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努力,中央工作会议冲破了华国锋设定的框子,变成了以讨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为中心,纠正“左”倾错误,统一思想的会议。

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就提出,应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全党上下的响应。由于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华国锋不得不宣布,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前,先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但华国锋仍然坚持“左”倾指导思想,既没有明确否定“两个凡是”方针,也没有明确肯定真理标准讨论。

11月13日,陈云在小组发言时,率先解放思想,冲破华国锋的限制,提出了当时党内外十分关注的六个重大问题。主要是关于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人的历史积案问题,以及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与会同志的意见,于11月25日宣布对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在平反决定的鼓舞下,大家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个战略决策,认真讨论了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比如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揭露和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等。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讲话还提出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问题。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作用,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号召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原则,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指导方针。

全会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决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方针:即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益、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开始确立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是实行改革、开放基本方针的开端。

全会还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并且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如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彻底平反,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

恢复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确定了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并选举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九人为中央委员。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检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执行党纪。这些组织措施,对于保证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体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虽然这次全会,仍然选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全会确立了邓小平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开始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严重挫折、徘徊到走向成功的伟大转变,这是共和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责任编辑 方 隽)

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

张浩事件

● 李克林

“张浩事件”是我从事党的农村宣传工作数十年间所经历的一件大事。这不仅因为这件事对当时的农村震动强烈，影响巨大，还因为透过这件事来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矛盾和斗争，进而体会到今天的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六年了，岁月流逝，许多事实都已淡忘，唯独这个“张浩事件”至今记忆犹新。

1978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众所周知，这个转折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的转折又是从农民起来突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当时的农村是多么艰难，农民们长期被“捆在一起穷”，谁也不能动一动。经过了多少次艰难的斗争，“张浩事件”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斗争的一个小小的回合。这不是经营方法上的“到组”“到户”之争，其实质就是坚持极左路线和反“左”的斗争。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会后在各地贯彻实行。决定中的第三条明确规定，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政策措施，虽然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窗口！它使长期渴望取得自主权，打破“大锅饭”的农民，受到极大的鼓舞。这个政策还同时规定：除边远山区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当时虽然还不允许“到户”，但允许“到组”也是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啊！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三中全会的决定，犹如阵阵春风，使长期冰封的农村开始解冻。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春，农村呈现一片勃勃生机，农民们纷纷行动起来，按照政策精神，划分作业小组，调整土地、农具，准备投入春耕。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来信，给热气腾腾的农村泼下一瓢冷水。

（一）来信和按语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河南洛阳地区一读者张浩的来信，黑体大字标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见照片），还配发了编者按语，肯定了来信的内容。开头写着“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和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议一议……”。显然是中央文件口气，来头颇不寻常。

张浩来信的主要内容是这样：“最近在洛阳地区听到看到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不少地方正在采取自找对象、自由结合的办法，把生产队划为若干组，约六至八户为一组，然后将生产资料土地、农具、大牲畜分到各组，包种包产。有的把库存粮食也分了。……听说下一步还要包产到户，说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来信又说：“有两个队干部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二十来年了，群众也习惯了，包产到

有封洛阳来信，质问之后还附了一首打油诗：

人民日报太荒唐，
张浩不写好文章，
一瓢冷水泼洛阳，
弄的群众无主张。

新华社河南分社为此事发了两篇“内参”，一篇是《洛阳地委对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反映强烈》，另一篇是《一封不真实的来信》。“内参”写着，洛阳地委负责同志说，当前发表这封来信是不慎重的。一是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许多干部打电话来，问地委前段工作是不是搞错了？许多下乡落实政策的干部纷纷返回机关说在下边没法干，怕呆下去犯错误。一些干部埋怨，说上边说话不算数，说不变，这不又变了？二是严重影响政策落实，正搞责任制的工作停下了。洛阳、卢氏等县已作出决定，通知各大队一律停止搞责任制。洛阳已分作业组的315个生产队，多半已停了。三是有不少干部躺倒不干了。陕县一支部书记说，从1957年到现在，责任制反复了多少次？真把人弄怕了！叫人解放思想，刚解放一点点，报上又批评了。有的队正在送粪，一听小喇叭广播这封信，粪也不送了。四是有些游手好闲不肯干活的人兴高采烈拿着报纸去质问队干部：谁叫你们搞责任制？这些人在划分作业组时开始没人愿意要。

“内参”还写着，洛阳地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制止混乱。会议有各市县负责人出席，省委书记刘杰赶去参加指导。会上议论纷纷，对人民日报提了不少意见。当时洛阳各县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已有一万二千多个生产队划分了作业组，占总县数50%以上，落实较好的，群情高涨。全区在两不许（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三不变（所有制、核算单位、统一分配都不

变）的前提下，实行四统一、五定一奖办法，有组织地投入生产。会上特别提出这些作法完全符合政策精神，报纸指责毫无根据。划组作业、联产计酬，必然要定地块，分农具、定产量，报纸轻率发表张浩来信，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据了解，张浩是洛阳伊川县人，在甘肃档案局工作，二月间他回家探亲，他所在的黑羊大队正在分组，他家缺少劳力，结合作业组时不顺利，就写了那封信。我以为，作为一个读者，向党反映情况，即使有些观点不正确，也无可厚非。报纸处理不当，并非张浩之过，张是无辜的。据我所知，报社收到的类似张浩来信还有，部队的较多。因为他们的家属在划分作业组时，都遇到类似张浩的情况。

另一个混乱较大的是安徽省，这里推行联产承包制最早，农民已开始尝到一些甜头。3月15日报纸一到，农村一下乱了套。有人气愤地把报纸撕碎扔进泥塘，有人把报纸当众烧了，有的县一些干部群众成群结队到上级机关质问“上边”是怎么搞的？好像就怕农民高兴，稍高兴一点就又变了脸。有些干部回答不了农民的质问只好躲了起来。

据报社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张浩信刊出的第二天，就接到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长途电话，给他好发了一顿脾气，据说当时的安徽农村正在春耕，混乱的情况令各级干部很耽心，万里就给大家说，报纸是公共汽车，他坐你也能坐，他写文章你也能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们实行的责任制，不论是包到组、包到户的，哪种形式都不能随便动，乱了，地荒了，就没饭吃，一切秋后看。不是有句话叫秋后算帐吗！这样一说，才稳定了局面。

事隔几年之后，1983~84年，我曾到河南、云南、贵州等地见到一些干部、农民，一听说我是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一个负责人，就不断问及1979年3月的张浩来信，有些人说起那年春耕时的乱劲还很激动。有个村干部说，“你们不了解前几年农民有多难，动不动就是资本主义，三中全会的政策刚开个小口，你们报纸就出来堵口子，啥也不能动。《人民日报》不给人民说话，反而来添乱！……”可见当年的张浩来信其影响之深之广，即使边远的云贵山区，也受到震动和波及。

（三）糊涂的补救

当时报社编辑部没料到张浩来信会引起如此强烈的震动；其影响同样也为发表来信的中央农口的决策者始料所不及。3月15日下午，我从崇文门饭店回报社汇报了会上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希望报纸赶快作些补救；希望中央广播电台不要广播这个来信。编辑部当即商定了补救办法：再发一封读者来信，再加上编者按语，重申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把问题说清楚，以澄清混乱思想。这本来是落实政策、纠正错误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当向农口负责人（当时还不是杜润生——作者注）汇报时，他们要求可选两封观点不同的信，免得“显出倾向性”。按语也由他们修改审定。实际上他们倒是很有“倾向性”，那就是坚持旧体制，抵制责任制，坚持“左”的一套不放松。就连三中全会明文规定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政策措施，也另加解释，不愿纠“左”，不肯放开农民的手脚。

这两封信，第一封是安徽农委署名辛生、卢家丰二同志写的，标

题是：《正确对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信上说：“张浩的信在我们这里造成混乱，已经划分作业组的干部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而有些人看到报纸，认为找到根据了。”来信说：“从安徽的实践来看，定产到组、联产计酬，评定奖惩，这种责任制效果很好。……”来信还提出：政策规定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同包产到组并不完全是两回事；分作业组后，要联产，必然要分一定地块。不这样，怎么联系产量呢？包产到组与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既不改变所有制，也不改变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为什么要“坚决纠正”呢？为什么一提“包”字就担心害怕呢？”农口的审稿同志，在这封信中又加了几句按语：“包产到组，全奖全赔，实际上变成了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编者”。本是澄清问题，这么一来，反而越说越糊涂了！

第二封信是河南兰考县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鲁献君写的，标题是《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信中说，“张浩来信和编者按语，对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有一定意义。前一段有些生产队在划分作业组时，把土地、牲畜、农具、资金等全部分掉，还搞什么自由结合，造成干群之间对立、吵闹，……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公社党委统一思想行动，召开会议，刹住了分队风，一些分田分队的生产队，已经自动合起来了。……”

报社在这两封信前，加了八百多字的“编者按”，标题是《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文内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意见，如说：“按政策所说，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并不一定要包产或定产到组，有的只把田间管理包工到组，收获前田头估产，决定奖惩”。

这个按语的倾向性倒很明显，把中央政策允许的“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措施，解释为只是田间管理，田头估产，很怕“包”与“组”相联，更怕“包”与“产”联系。特别怕从“队为基础”退回去。这个按语和来信发表在半月之后的3月30日《人民日报》一版。名为补救，实为限制，连“到组”也不允许了。越补越说越糊涂了！

（四）发表的经过

不久前，我和当时值班的副总编辑通电话，共同回忆张浩来信发表的经过和那个按语的来头，有些情况更清楚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天，国家农委于1979年3月在崇文门饭店开九省一市农口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研究如何贯彻三中全会有关农业的决定和25项政策措施，报社派我参加这个会议，并要求经常回来汇报情况，研究宣传方针计划。记得是3月14日的“编前会”上（这是报社每天的例会）主持会议的副总编提出，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给报社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并附一河南的读者来信，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农具的混乱局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分队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要报社赶快发表这件读者来信，显著些，并把他的指示信改作评论一起发表。

按照惯例，总编室收到此类信稿一般都分到有关的部门处理。这个信本应交给我们农村部，可是当时值班的副总编说，不用交部了，时间紧迫，就留总编室直接处理吧。当时我心里很感激这位副总编，觉得这人总是这样任劳任怨的，真好！免去农村部许多麻烦。当夜他们就把指示信改作“编者按”

发了，可没想到处理竟那么突出，版面这样吓人。

这次回忆当时情况时，我问这位副总编，当时为什么没交下来由我们处理。他说，当时他看了那个指示信，很恼火，很反感。他说，我了解农村部的思想情况，（指农村部反“左”积极）交下来肯定大家不同意，会发生许多周折，不如总编室直接处理快些。我问他，是否你们那位总编室主任他不大了解农村情况，处理成这样？他说“不是，他不了解我了解，但遇到这种情况没办法，不同意也得登。我这人性格就是太软弱了！”说完一阵苦笑！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有敢于为人民利益说真话、说实话的品质。但遇到具体问题，如何解决“唯实”与“唯上”的矛盾，我至今还有些迷惑难解。

以上就是张浩来信出笼的全部经过。

我还记起，在这个来信发表之前，可能是三月上旬，在我们农村部送审的一篇春耕社论的清样上有个批语，原话记不清了，大意为，当前农村出现了农民起来抢牲口、分农具的现象，值得注意。口气和问题同那封指示信几乎一模一样，据说这是党的最高领导的批示。当时我部还议论，农民过去积极性不高，有的队牲口跑了也没人管，现在起来抢牲口、农具，说明农民积极性起来了，这是好现象而不是坏现象。不知领导上是怎么判断的？

这段小插曲使人联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和会后，关于农业的那个《决定》的形成，以及会后的贯彻执行，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据说，决定在讨论中，有人主张写上学大寨那一套，胡耀邦同志

不同意，坚持别写，几经修改才形成这个《决定》（草案）。今天回头看，尽管这个文件还很不完善，但确实是农村改革和转折的起点。在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五）并非题外话

从1979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春的“张浩事件”后，每年春天，党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群众的实践和创造，制定政策措施，引导农民稳步前进。如1980年的75号文件，比《决定》又放开了一点，说“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每年所发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村改革的。1982年1月1日的一号文件，郑重地写着“目前实行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当时我参加过华东组的讨论会，大家一致说：“这个一号文，这句话最好，可算报上户口了！”这话反映了农民长期的期待和喜悦之情。长期顶着“资本主义”帽子的温州永嘉、苍南等地，因为包的早，农民生产生活发展较快，“上边”总说“表现不坏，成份不好”。农民们都懂得“成份不好”的含义是什么，一直抬不起头。直到一号文件承认“都是社会主义”才算抬起头来。他们高兴地说，这算“报上户口”了！到1983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则庄严地写着“联产承包制是在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直到1986年的一号文件的产生，反映着农村改革的步伐，党总结农民的创造，实践的经验，体现着农民的意愿和要求……党和农民的心思如此息息相通。我干了这些年农村宣传，这是最舒心的时



建了新房喜迎亲

期。当时主持农村工作的已不是国家农委而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就是富有农村工作经验又有理论修养颇具学者风度的杜润生（当然重要的决策都是中央定的）。当时因工作需要，我不断出入西皇城根九号那个小院，至今走到那里仍有一种亲切之感。

现在回顾这些，好像与“张浩事件”没大关联。但我觉得，从党领导农民走过的几十年的崎岖道路来看，却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斗争从未间断。1982年的一号文件，才第一次承认联产承包是“社会主义的”。1983年的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其实，农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就有这种创造，可硬是一次次把人家给“打退”了！折腾了几十年直至七十年代末的“张浩事件”，某些领导人又想以同样的指导思想来对待农民，不过这次不像过去那样兴师动众，“打退”其“猖狂进攻”，而是以他们手中还掌握着的舆论工具，加以突出的编排，来“纠正”农民的“越轨”行为。但时代不同了，农民也今非昔比了，从大批来信的质

问、抗议中，可以感到农民的情绪和胆识。我就听到一个队干部说：“批评到组是从‘队为基础’退回去？需要退就退，有啥不对？非得‘三级所有’？四级有何不可？”

几十年来，党领导农民，从一大二公，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包产到户，到连续五个一号文件，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有人说，这叫“步步为营，节节后退”，实际是党的领导步步前进了，越来越符合实际符合民心了！经过曲折，有过失误，党终于领导农民顺着历史的规律前进了。

前些年，当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祖国大地的时候，有位同志慨叹：我们运动了这些年群众，今天终于看到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实际上这个运动，六十年代即已开始了！如1962年的“单干风”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一封普通的张浩来信，竟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就预示着更大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即将到来了！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作者李克林，原《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杜晋）

广东省 方方 “地方主义” 冤案 始末

张江明
刘子健



方方同志

幅。参加大会的 400 多位老同志、党史专家、学者和干部，个个喜气洋洋，整个会场显得庄重而热烈。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帼英代表省委出席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为方方同志“地方主义”案件平反的决定，并作了题为《广东人民怀念方方同志》的讲话，表达了广东人民缅怀方方的深厚感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方方夫人苏惠同志的申诉要求，广东省委组织了由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派干部组成的联合复查组，复查“方方案”。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查清了这是一起重大的错案。

1992 年 12 月，中央纪委迅速派出工作组到广东进行复核工作。1994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意中央纪委、广东省委的复查结论，批准为方方历史问题平反，恢复名誉。

沉冤 42 载，一朝平反昭雪。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原中顾委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在会上代表老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同志称赞党中央、广东省委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广东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沉冤 42 载 一朝平反昭雪

绿树婆娑，碧水环绕，美丽的广州珠海宾馆。这里不是一座普通的宾馆，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许多痕迹。

1952 年 7 月，华南分局曾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同志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42 年后，又是在这座宾馆，举行了否定当年批判、为方方同志平反的大会！

1994 年 7 月 13 日，人们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来到珠海宾馆会议厅隆重集会。主席台上方醒目地悬挂着“纪念方方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红布横

毛泽东三次赞扬方方的功绩

方方，广东普宁人，1904年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华南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投身革命斗争，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前，历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他在领导华南党组织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重大成绩，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赞扬。

1932年，方方在闽西苏区任中共上杭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群众支援和参加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在扩大红军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全县出现了党团员带头争先上前线，区、乡赤卫队整连整排加入红军队伍的动人情景。其中才溪乡100个青壮年中，就有88人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方方领导的才溪乡的工作，说：“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并提出学习才溪乡的号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在与中央失去联系，斗争极端残酷、艰苦的环境中，方方参与了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同志领导的闽西南的斗争，使革命红旗始终不倒。1937年4~5月间，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派，到延安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得悉闽西南保存了党组织，保存了红军游击队，高兴地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解放战争时期，方方在孤悬敌后，远离中央的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发展和壮大华南的党组织，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爱国民主力量。特别在武装斗争方面，他运用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把游击战争的烈火燃遍了广东、广西和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7省广大地区，建立了粤赣湘边等7支游击纵队，武装力量共达10多万之众，仅广东的武装部队就有8万余人，党员3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8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叶剑英同志，

充分肯定方方等同志领导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南北干部会师召开赣州会议

1949年9月初，叶剑英和跟随他南下工作的200多名干部到达江西赣州，与先后到达的原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以及担负解放广东任务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同志汇合，在赣州召开了会议。会上，叶剑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他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赓、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的新的华南分局。

叶剑英在会议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是四方八面的干部汇合在一起，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等等，所以要特别注意团结。他号召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搞好团结。会议委托方方拟订华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干部组成方案，决定组成以方方为首的军事小组，专门研究全省军区的划分、干部配备与警卫部队的配置等问题。

在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华南各地游击纵队密切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追歼残敌，取得了解放广东全境的伟大胜利。

来自中南海的批评

方方挨了两记闷棍

广东解放初期，方方协助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主政广东，并具体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他们根据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政策法规和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的特点，制订了一整套符合广东实际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积极而稳妥地进行。但却遭到上级领导机关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认为是“右倾”。说广东土改慢了。1951年12月，中央调陶铸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接替方方负责土改运动。

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

毛泽东宣布开会，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着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

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上去了，广东还在爬。

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味。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中心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会议很快结束了。方方带着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回到广东。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方方常常自问：“我到底错在哪里？”他说好象挨了两记闷棍。

发表社论不寻常 原则分歧与争论

叶剑英、方方等华南分局的同志，对中南局的领导是尊重和拥护的。他们认真贯彻中南局的许多正确指示，使广东工作取得许多成绩。但是，无庸讳言，在土改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叶剑英、方方与当时中南局的某些同志，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甚至争论。主要是：

（一）关于如何认识广东特点问题

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是广东的特点，要作为解决广东基本问题的参考。但他们对广东特点的正确分析，却受到了严重的批评和指责。

中南土委会某领导同志在1951年4月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批评说：“在有些同志的思想上，似乎存在着一种遇事缺乏阶级分析，往往只从现象上看问题的弱点。例如有些同志常从习以为常的现象中，朦胧地认为广东特殊，情况复杂，靠近沿海，工商业发达，生活富足，华侨多，……等等”。后来，分局某同志干脆把这种认识指责为“特殊论”的错误，是把一些次要的、小量的特点（华侨、工商业等）扩大化。这位同志认为，如果说广东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区；二是队伍严重不纯。这就为反“土改右倾”、“地方主义”，提供了依据。

（二）关于政策问题

由于对广东的特点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差距，因而产生了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叶剑英、方方正是从广东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方针政策，强调执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对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做好城镇工作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在土改试点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但是，却被指责为“右倾”、“照顾其他阶级”。政策上分歧最大的

是华侨问题。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最大特点是华侨众多，华侨大多数都是靠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侨眷中的地主成份是极少数，因此，要保护华侨利益，团结争取华侨支援祖国建设，明确规定对华侨地主的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会却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说对华侨地主的“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执行这样政策的结果，广东土改运动就出现了“左”的偏差。偏差的主要表现是追余粮侵犯了侨汇、追到国外，划阶级时把打击面超出了应有范围，将资本主义剥削当封建剥削来搞。在华侨房屋方面，动的面达80%至90%”。直到现在华侨房屋遗留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据广东省侨办统计，至1991年底止，广东省应清退的农村侨房共1698万平方米。自198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拨款解决侨房已达5亿多元。此外，土改复查中还伤害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

（三）关于如何纠正运动的缺点和偏差问题

对运动的偏差问题，敢不敢纠正，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党的政策的大问题。

1951年5~6月间，全省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后，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捕、无限度清算的混乱现象。对此，叶剑英、方方坚决予以制止。6月30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决纠正当前运动中出现的缺点。他告诫各级领导，对待群众的要求应有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求怎样办就怎样办，是尾巴主义。要反对对群众自发势力的无条件歌颂。

方方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努力确保运动的领导权，要明确划清政策界限，广泛地向群众交待政策，使政策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要坚决消灭封建制度，又要保存资本主义；要坚决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农，又要在贫雇农核心形成后紧紧地团结中农和联合一切反封建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封建斗争；要坚决反对任何与封建阶级妥协的右倾思想，又要防止不讲斗争策略，不分主次轻重甚至打了自己的混战状态。

叶、方讲话于7月1日在《南方日报》全文发表，运动的缺点在很短时间（十多天）即被纠正了。

但是，中南局机关报在华南分局的同志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于1951年7月10日和7月17日，连续发表了两篇不同寻常的社论，两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叶剑英、方方的名，却是针锋相对地批评叶、方的讲话。社论运用毛泽东当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笔调，认为当前出现偏差的运动“好得很”，影射叶、方攻击为“糟得很”。还说：“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慌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群众起



1950年，方方（左二）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与粟裕（左一）、聂荣臻（左三）、邓小平（左四）、杨尚昆（左五）、林伯渠（左六）、陈云（左七）在中南海合影

来带来的一点偏向，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呢？”社论公开推崇群众的自发势力，为运动出现的偏差辩护。华南分局某负责人在后来的批判会上，公开点叶剑英的名，说叶剑英这篇讲话对农民运动基本上是动摇的。中南土委会某领导人也指责方方“强调掌握政策，实际是掌握条文”。

（四）关于对土改试点工作评价问题

对广东3个县和后来扩大到11个县的土改试点，叶剑英、方方主持华南分局开会肯定的。

例如3个县的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贯彻了中央和华南分局关于保护工商业、保护华侨利益等政策，土改中没有出现乱打乱杀的偏差，保存了富农经济，照顾了华侨，照顾了其他劳动人民，打破了房界与地界的矛盾，取得了较大成绩。对此，方方代表华南分局作了总结，肯定了成绩，认为三县土改试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全省土改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其经验值得向全省推广。方方也指出了三县土改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但是，中南土委会的领导同志对广东土改试点工作是否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广东土改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杀人太少等等。后来三县土改试点被指责为“和平土改”，11县土改被认为“极不彻底”。

（五）关于对广东党组织和干部队伍评价问题

对广东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评价，赣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已经统一了思想认识，作出了正确决议。

但是，一些同志背离了甚至否定赣州会议决议，对广东党组织和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另眼看待，认为“严重不纯”。一份党报在纪念党的诞生30周年，1951年7月7日的社论中，认为华南党组织，在相当长久以来（从抗日战争算起），曾经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造成了党内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并把广东党组织与俄国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马尔托夫的建党思想作了类比。社论还说：在政权中，在地方武装中，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情形更加严重得多。在另外一个报告中干脆说：“广

东县区级组织及土改队严重不纯，混进了大批坏分子”，“县区主要骨干不可靠”，“敌我问题还未得到应有解决”，提出“采取三反的做法”，要“狠狠的整”。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广东先后进行大规模土改整队，多达6次，整肃、处分大批干部。

方方同志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份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估计，整队要有正确的方针。

方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保护被怀疑受冲击的干部。

土改运动开展后，汕头地委副书记、专员曾广被批判为“敌我不分”、“包庇地主阶级”，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方方挺身而出保护曾广。有些人就指责方方“在曾广问题上特别顽固”，说他“纯从地方主义立场保护曾广”。后来曾广还是被开除党籍，撤销所任专员的职务。

事实证明，方方保护的并不是“坏分子”，而是党的好干部、统战朋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广等同志都得到了平反。

干部问题是与非

方方热情欢迎和使用外来干部

广东解放初期，百业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数千名干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方方尽心尽力，协助叶剑英做好干部的调配和安排工作。

但是，数千名干部都要安排得完全合适是很难的。方方曾说过：安置这样大量的干部“我们仅仅能避免犯大的错误，小的错误，我们很难避免。但犯了是不是不能改呢？不，是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修正。”然而方方在干部工作上却遭到了批判，说他“不欢迎大军，排斥外来干部。”

实际情况如何呢？

为了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东，1949年初，方方就部署各地做好迎军支前工作。首先，指挥各游击纵队展开春季攻势，解放广大农村，把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大块的解放区，以便于大军进入广东时顺利作战。其次，建立各级支前机构，准备大军需要的粮草，保证供给。他曾致电泰国中共支部局的同志，指示购买大米500万斤至1000万斤，在汕头解放后即运抵回国。许多大军的同志说：广东支前工作做得好，是渡江以来所仅见。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等将军为此专门致函粤中、粤桂边地区党政军民，表示感谢他们对大军

的全力支持。

方方也是欢迎南下干部来广东工作的。早在1948年10月，方方就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央输送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工作。他在布置迎军支前工作时，曾发电报给各地党委，要求干部们做好思想准备，欢迎更多的外来干部来领导工作。他在赣州会议上的讲话，从广东党的历史上许多外来干部，如聂荣臻、李富春等在广东工作时都没有遭到反对，说明广东没有“特别排外的倾向”，帮助外来干部消除顾虑。方方不但表明了欢迎南下大军和南下干部的态度，而且还协助叶剑英安排南下干部在重要岗位上。赣州会议期间，方方协助叶剑英组建华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方方拟订组成方案和干部名单，经叶剑英审阅后报经中央批准。在安排分局和省级干部中，南下干部占大多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那年月，运动不停，斗争不断。

1953年初，新三反运动开展。方方刚被批判“土改右倾”、“地方主义”错误不到8个月，这时又成了靶子。华南分局指责方方在废除小盐田、小学教师整编、普修公路、收购土糖、兴修水利工程等五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错误。

上述问题，都是中央有关部门布置的业务工作，广东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均经华南分局同意。但分局在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却说是方方个人决定，不经过分局，指责方方“不尊重分局领导”，“与分局分庭抗礼”，并称方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错误，是“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的发展”。

《分局报告》还借反映与会同志的意见，向中央、中南局建议，将方方调离广东。这一报告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上。1953年5月26日，毛泽东阅后，把中共中央办公厅原拟对《分局报告》的批复，改为《关于方方同志的错误的批示》，决定撤销方方所任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并通报全国各地。

方方又一次作了检讨。

面对连续遭受的打击，方方同志表现出坚强的共产党人的党性品格。他以坦荡的胸怀接受这冷峻的事实，他打电报给中央，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请求批准下基层蹲点。经同意后，他到韶关马坝一蹲就是半年，曾因工作劳累而昏倒。

1955年，方方奉调中央侨委工作，任副主任、党

组书记。他尽心竭力,协助何香凝、廖承志同志搞好侨务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文革”动乱中,又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于1971年9月含冤去世。临终前,他挣扎着说:“我不愿死,我不能死!我还可以为党工作二十年!”表现了对党对革命事业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怀。

平反昭雪真相白 公道终在党英明

历史是无私的。经过数十年风风雨雨和实践的检验,证明方方在土改和干部政策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广大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强烈要求为方方同志平反昭雪的愿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终于实现了。

1994年4月,党中央根据广东省委关于方方历史问题《复查报告》,作出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志在华南分局、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广东的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应予肯定。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决定撤销原对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为方方同志恢复政治名誉。

这一公正的结论,为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彻底平反。长期压在人们心中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人们在喜庆之余,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一起长达四十余年、牵涉面广的冤案?

从历史的足迹中,我们看到,事情的缘起,实际上是党内不同思想认识的分歧。

我们暂且不说叶剑英、方方的意见是正确的,仅就分歧的本身来说,在党内是允许的,正常的。更何况是

领导一场伟大的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不同意见是难免的。毛泽东曾引古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按照这一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搞好工作,不掺杂个人的因素,在党内交换意见,甚至展开正常的争论,“真理越辩越明”,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下,统一认识,工作就能前进了。

然而,在“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年代,加上某些复杂的因素,对正常的不同认识,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手段,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甚至编造材料,突然袭击,残酷斗争,使自己的同志防不胜防,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这就是历史的悲剧所在。

抹去了历史的尘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真理的光芒依然是那样灿烂夺目!叶剑英、方方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他们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正确而深刻地分析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的特点,提出一系列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不仅在五十年代对实行土地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今天,对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大意义。事实上,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其中也包含了对叶剑英、方方当年正确的思想认识在内。许多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要是当年按照叶剑英、方方同志的意见做,广东的建设肯定会更好!”可惜,我们为取得这种正确的认识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了!历史走了一个长长的过程,又回到原来认识的起点上。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更高的质的飞跃!

(作者单位:张江明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任广东社会科学大学校长、教授。

刘子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林 跃)

近来陆续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邮购,每月一期,单价3.20元,全年38.40元,免收邮费。另本刊1993年合订本已全部售完,请勿再汇款来。1994年合订本尚有存书,每套44元,免费挂号邮寄,欲购从速。

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天津街7号,邮编:100802 电话:6076801 联系人:杜 习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

●尹骥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开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既然是憾事，那当是无法挽回的。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曾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根本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二十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谈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从一个国民党左派党员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会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早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一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

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练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三十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不久,即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整个特科的领导工作。

现在的人们大概知道中央特科是个怎样的机构及其性质与任务。但在当年,它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因而也是极为神秘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分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

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按说可以不必再过问文化工作问题的。但他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例外地通过一家书店,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关切地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瞿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分,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潘汉年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了,这位绅士自己告诉夏衍,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



夏衍（左）与潘汉年（右）摄于五十年代初

各方面的情报。这种特殊情报关系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也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 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便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的重要性，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方面与生活道路。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党委和组织部长，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的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已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这次谈话不久后的一天，即1937年7月10日，潘汉年便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做出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当面指示夏衍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

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且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十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可以说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宣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干将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就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各找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直到12月中旬,上海已经沦陷了一个月之后,潘汉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让人给他送去一张船票。等到夏衍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才在船上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又是事先不加说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批的撤离。这一对革命战友真正是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虽然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但确实反映了这两位革命战士的可贵情怀。

抵达香港后,夏衍前往广州主持《救亡日报》,潘

汉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被召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扩大的)全会,后又被留在延安中社部工作。这两位战友一别竟达九年之久。虽然在1941年间,他们两个都同时在香港活动一段时间,但因夏衍是公开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汉年则是中央社会部(后改情报部)派往敌后主持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行踪飘忽,不时奔走于港沪之间,非常隐蔽,因而再没有机会和夏衍往来叙旧。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岁月如流,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战线上从事艰难曲折的斗争。潘汉年又以中情部代表的身分受周恩来的调遣来到上海。他肩负双重任务: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前者隐蔽,后者公开或半公开。在这两条有分有合的战线上,潘汉年轻车熟路,驾驭自如。这时,他和夏衍又恢复了密切联系。

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机构及其成员也只能分别撤离,转移或转入地下完全隐蔽。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潘汉年和夏衍都属于转移到香港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潘汉年又负起了组织指挥撤离和转移的重任。这一次潘汉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时撤离。不过这次乘的是飞机,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从上海直飞香港。

在香港,潘汉年的身分很特殊:他是中央情报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中共华南分局成立后,组织上则由上海局兼管,潘汉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员的身分参加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方面: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主持情报工作。夏衍是华南分局的成员,并主持分局所属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文化宣传为其主要职责。从组织关系上,潘汉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间接领导。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范围而需要通力协作。潘汉年的特殊身分,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式的人物。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咨询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信息,他们最想见到的

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承担起仿佛是不管部部长似的职责。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300多人一一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属国民党特工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要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提供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分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某种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

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士，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摆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他知道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在这件事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还特地和潘汉年一起邀请那位实业家吃了一顿饭，以表示谢意。

解放初期， 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都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

便这样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谁都知道,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二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舆论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助,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程度。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始终 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

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二。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钦命不可违和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按高层指示精神,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分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



1941年夏衍（左三）与何香凝（右四）等在香港

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

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又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才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

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艺战线，在党的隐蔽战线和党的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岁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之际正式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时，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而长眠于地下。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并发扬光大的。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一个月之后）

南洋 侨胞女 雁北 “花木兰”

● 荣维木



抗日女英雄李林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八路军的骑兵营，出没在山西雁门关以北地区，与日寇进行英勇的战斗。领导这支队伍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导员，她就是华侨女英雄李林。李林这个名字，敌人听了会心惊胆颤，老百姓听了却像寒冬里感受到一缕阳光的照耀，心里暖融融的。关于李林的传奇故事，在雁北地区广泛地传扬着。

李林，本名秀若，又名小峰，1916年出生于福建闽侯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她自幼随父亲飘泊到南洋爪哇（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爪哇是荷兰的殖民地，李林从小就目睹了侵略者是怎样压迫殖民地人民的，这在她还很稚嫩的心灵里，留下了一抹阴影。一次，华侨小学的一位老教师指着一幅中国地图，深情地向同学们讲述着祖国的壮美，李林正听得入神，突然一个荷兰殖民主义者破门闯入，大声斥责年近的教师：“不许你讲中国，你们的国家已经一败涂地，你们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只有我们才是世界的主人！”他一边说着，一边扯下中国地图，踩着它扬长而去。老教师强忍着泪水，哽咽地对同学们说道：“你们要快快长大啊！长大了，回国去，一定要为振兴祖国而努力！”李林默默地走向前去拾起了地图，她深深地向教师鞠了一躬。从那时起，李林就暗自下定决心：“长大后我一定要为中国的强盛而奋斗，不要让祖国受

到别人的欺负。”

14岁的时候，李林由母亲陪着回到祖国继续求学。她先后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和杭州中学读书，后来又转到上海爱国女中就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侵略魔爪正伸向中国内地。祖国，并不是李林在南洋时日夜憧憬的美好景象，而是山河破碎，灾难深重。一次上作文课，李林听着从附近传来的日军演习的枪声，顿时怒火中烧，提笔疾书，写了一篇《读〈木兰辞〉有感》的文章，抒发出“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雄心壮志，向往着象花木兰那样，奔赴杀敌的疆场。

1936年，李林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年底，党组织派她以“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的名义，到山西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从此，她开始了军旅生涯。

在训练班里，李林学习十分刻苦，尤其重视军事训练。有一次练习射击，教官发现她双肘着地时端枪的手不停地颤抖，便命令她挽起袖子，只见双肘黑厚的硬茧上又渗出了鲜血。教官问道：“你这样拼命，真的准备上前线？”李林笑着反问道：“不上前线，怎么杀日本鬼子呢？”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李林结束了军训，被派往雁北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从那时起，在雁北的村村寨寨，就总能看到一个梳着短发，身材虽然矮小，却总是神采飞扬的八路军女战士。

当时的雁北地区，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变得满目疮痍，国民党军队已匆匆撤走，老百姓盼着打鬼子的部队早日开来。这天，李林带着队伍来到平鲁县，只见在当街聚集着许多群众，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跪在路中间，一边哭一边说：“你们可来了啊！鬼子又杀又抢又烧，你们不来，我们就没法活了！”老人的话深深地震撼着李林的心，她跑上前扶起老婆婆，然后跳到一只长凳上大声讲演：“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日本鬼子打到了雁北，欺负到咱们家乡来啦！大家怎么办？愿意当亡国奴吗？不！我们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要反抗啊！只有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有活路。”说着，她把手中的长枪高高举起，带领群众高呼“打鬼子！保家乡！”的口号。没过多久，就有许多人加入到李林的这支抗日队伍。

李林来到雁北，立即与老百姓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一次，部队行军来到长城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为了不打扰群众，大家挤在一个四面透风的破庙里。时值隆冬，凛冽的寒风不时地把雪花卷进庙里。战士们正把大豆烧熟充饥，忽然从风声中传来了小孩的哭啼，李林连忙跑出去察看。她寻声来到一座小土窑里，只见破木柜里有一个用烂棉絮裹着的小孩，她抱起了孩子，发现孩子是因为饥饿才哭起来的。她从怀里掏出了仅有的一把大豆，细细地嚼碎，再嘴对嘴地喂给孩子，孩子马上停止了哭声。这时，一位中年妇女跌跌撞撞地进来，看着眼前的景象，激动地流出了热泪，一边哭一边说：“好人哪，叫我怎么感谢你？”这样，李林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真诚欢迎，有些大娘还认她作干女儿。

沈家窝庄有个王大娘，早年守寡，大儿子鲁尚明是骑兵营的连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安慰烈士的母亲，李林专程去看望王大娘。王大娘坚毅地说：“当儿子的为抗日牺牲光荣，我这当娘的，也要对得起儿子，我只有一个心愿，叫二小子尚志跟上你，也去打鬼子。”李林被王大娘的话深深地感动，她情不自禁地抱住王大娘喊道：“妈妈，我的好妈妈！”从此，王大娘多了一个革命的女儿，李林多了一个疼爱自己的干娘。后来，就是这个干娘，为了掩护李林，被敌人用皮鞭抽，用烧红的炉圈烫，始终不肯向敌人说出李林的下落。

如果说李林的朴实诚恳赢得了雁北人民的信赖，那么她的骁勇善战更是得到人们的赞佩。她手使双枪，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她个头不高，却制服了许多

人不敢靠近的蒙古烈马“菊花青”。打起仗来，她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在她的指挥下，骑兵营为保卫晋绥抗日根据地，多次立功。

1940年元月，雁北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专署成立了，李林被选为专署的秘书主任，还被连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的委员，受到贺龙的接见。贺龙亲切地对她说：“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了你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接着，贺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李林骑“菊花青”奔驰的表演，询问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她继续勇敢战斗。

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在晋西北根据地，敌人集结了1.2万余人向边区腹地的洪涛山区发动了凶猛的第9次扫荡。而这里的八路军兵力只有几百人，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掩护机关转移，李林坚决要求担任后卫任务。实际上，后卫任务就是要用少数人的生命去换取多数人的安全。李林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她很高兴，但她知道，这副担子的份量可不轻啊！

李林目送着机关大队的同志们上路后，去向房东杜老汉告别。她把一个从北平读书时就一直伴随着她的瓷缸子送给了杜老汉。瓷缸外面套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布套，它虽然已被洗得发白了，但缝在上面的红五角星却依然鲜红。

4月25日傍晚，李林率领战士顺着山谷出发了。刚走到沟汊路口，就与敌人交上了火，很快和先头突围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李林果断地命令队伍调转方向，向西平台村转移。敌人尾随在部队后面，恨不能一下就把吃掉这支八路军的队伍。

第二天早上，部队在西平台村被敌人包围了。为了减少损失，李林向身边的地委武装部长姜胜说：“老姜，我带两个排往村东头大沟里冲，吸引敌人，你带着其他同志向南突围。”姜胜深知李林这样做十分危险，正想劝她，但李林还未等他开口，就跨上战马冲了出去。

这时，两边山上布满了敌人。李林一心要把敌人吸引过来，于是她高高地举着驳壳枪，大叫一声：“冲啊！”率领战士猛烈地向敌人射出一排排子弹。山上的敌人被打得发懵，只见几十匹战马在滚滚尘土里飞驰而来，为首的一匹大青马上，骑手几乎直立在马背上，双枪左右开弓，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几个暴露身体的鬼子，顿时成了枪下的活靶。日寇指挥官还以为被包围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正在突围，慌忙调集南北山上的日军向东面增援。敌人的火力全部被引到了村东大沟，而这时，姜胜指挥着机关的大队人员，迅速地翻过南山，成功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当日军发现上当，已来不及

追赶了。于是敌人把满肚子的怨恨，全部集中在东沟里的这伙八路军身上，恶狠狠地把他们干掉。

敌人的机关枪和小钢炮从两边山上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火力网，迎头向沟里压了下来，一些战马倒下了，一些战士牺牲了。经过连续紧张激烈的战斗，李林两眼熬得通红，如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看着身边的战友相继战死，她再也无法忍耐了。她命令战士隐藏在石头和树墩后面继续向敌人射击，自己跨上“菊花青”，猛然向敌人阵地冲了过去。敌人的机枪吐着火蛇，子弹雨点般地在她身旁扫过。快到敌人阵地前的时候，只见李林突然从马背上倒了下来，敌人十分得意。可是“菊花青”没有停止飞奔，转眼间冲到敌阵前，在马肚下藏身的李林一下又翻到了马背上，扬起手中的双枪连连射击，顿时把敌人的两挺机枪打哑了。敌人正在惊愕，伏在沟里的几十匹战马同时冲了出来，向沟东面疾驰而去。

敌人呼叫着又向东面扑来，李林率领着战士们边打边退，在一个陡峭的土崖下暂时隐蔽起来。这时，敌人如潮水般地向这里涌来。李林把战士们围拢在一起，脸色严峻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死，就要象真正的战士那样去死，决不能玷污抗日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战士们望着教导员那被硝烟熏黑了的坚毅面孔，一齐举起了紧握着的拳头，同时发出铿锵的誓言：“八路军宁死不屈！”

李林用目光环视着身边的每一位战士，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此时都显出凛然浩气，心里感到无限欣慰。当她的目光扫到通讯员二和子的时候，心中不禁一阵发紧。小战士坚毅的脸上还留有一丝难以掩盖的稚气，他只有14岁啊！

李林抚摸着二和子的肩头柔和地说：“你还小，敌人不会注意你，快沿着这条沟走吧，只要碰到老乡，他们会掩护你。”二和子使劲摇着头说：“不，我死也不离开你！”他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滚落下来。

“别说傻话！要听命令。”李林一边说，一边取下身上的文件包，把它塞进一条岩缝里，用土埋好。她转身严肃地对二和子说：“记住，等战斗结束后，把它取出来交给地委，你一定要活着完成任务！”说完后，李林从衣袋里掏出一枝钢笔递给二和子，紧紧地握住他的

手。二和子明白，这是教导员在生死离别的时候留给他的最后纪念，那枝还带着教导员体温的钢笔，仿佛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二和子擦干了泪水，说了一句“我保证完成任务”，顺着一条小路走了。

敌人已经扑了过来，李林命令战士们分散突围。她率先挥枪冲向敌群，战士们跟着跃起。一阵激烈的搏斗，终于打开了一条血路。但这时从沟前土崖上又射来了密集的子弹，又有一些战士牺牲了。为了争取多保存一些战士的生命，李林命令大家朝北山上冲，自己却带着身边的两个战士跃马冲上东山梁，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

李林甩动着双枪在敌群中东拼西杀，把敌人引到了小郭家村后沟。这时，突然有一股敌人从前面沟沿冒了出来，又把李林和两个战士逼上小郭家村后的阴凉山。三个人的战马在激烈的战斗中倒下，两个战士也身负重伤。李林搀扶着战友走向山顶，走进一座古庙。

阴凉山顶峰是一处绝境，敌人见李林等人已没有退路，便叫喊着蜂拥而上。李林等人借着古庙的残垣断壁作掩护，顽强地向敌人射击，先冲来的5个敌人应声倒了下去。但是，李林这边只有三个人，敌人依仗着人多，继续向古庙扑来。两个战友牺牲了，李林的右腿和前胸也被敌弹击中，但她没有停止射击。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近。李林的腿上又中了三弹，栽倒在地上。一群日寇狂叫着向她扑来。李林咬紧了牙关，拼着生命的最后力量，猛地坐了起来，举枪向敌人射出了一排子弹，又打倒了一个鬼子。一支枪的子弹打光了，另一支枪里也只剩下一颗子弹。李林迅速地拆毁了没有子弹的驳壳枪，把零件扔进了草丛。她抬起头来，轻蔑地朝敌人扫了一眼，忍着巨痛，扶着墙艰难地站了起来。她缓缓地举起枪，对着自己的喉咙……就这样，她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40年4月26日，李林英勇殉国。这时，她只有24岁。

李林的忠骨埋在洪涛山边东石湖村的高山脚下；她那手持双枪，跨着“菊花青”驰骋抗日疆场的英姿，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雁北“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在长城内外的许多村寨世代流传着。

（责任编辑 王 恂）

我与蒋纬国先生的同窗交

● 吕儒琦

每天阅读书报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一天,当我从某刊物上看到《蒋纬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文章时,心情特别激动。他抒发政论,痛斥妄图分裂祖国者是“两岸之公敌”,不顾一夥逆反势力的猖狂攻击,敢于盛赞邓小平“在红旗下”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主两岸及早举行谈判,共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大计,令人敬佩。

我与蒋纬国是三十年代苏州东吴大学附中的同学,分别已58年了,然而,学友加同胞骨肉之情义是难以忘怀的,读着有关他的消息,倍感亲切,也引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我的故乡武汉,是历经“大革命”洗礼和“大革命”失败沧桑岁月的一座名城;我的母校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是有着相当革命影响的一所学校。1932年“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更大大地震撼着我们青年学生的心,一股强烈的革命之火,在我们的心头燃烧起来。思想敏锐而激进的同学何功伟约我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常在课余阅读进步书刊和启蒙性的马列主义小册子,座谈、议论时事,并翻印了抗日救亡的小册子,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我的一些“左倾”言行,很快被我的父亲察觉,认为我在“离经叛道”危险之至。在他对我百般劝阻而无效后,采取了将我转学到苏州东吴大学附中的“调虎离山”之计。

“东吴”是美国“坚理”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兴办的一所学校,素以教学、管理严格著称。它又是一所“贵族学校”,国民党达官、要人的子女在此就学的颇多,如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之子顾德昌、“中央银行”行长唐寿民之子唐祖诒……等均在此就学。“东吴”在政治上很“封闭”,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东吴”仍然“风平浪静”。我转学到“东吴”后,不仅同武汉的进步学生保持了通信联系,又结识了从北平转学到“东吴”的进步同学李志和及其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堂兄李志中,并参加了由李志中等上海共青团员发起成立的“中国青年社”,又名“新人社”,并在“东吴”建立了一个“新人社”的小组。1935年,我们还成立了“东吴学生救国会”,并组织了一次全校师生在苏州市区反日宣传的示威游行,在苏州市民和学生中引起轰动。

谁都知道蒋纬国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他不以特殊身份自居,生活上与普通学生一样。虽然“东吴”是贵族学校,但学生饭堂还是大众化的,他一直在学生大饭堂吃饭,不像个别纨绔子弟经常下小馆;别人星期六到上海参加舞会,他不去;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我经

常见他不是图书馆埋头看书，就是在健身房作健身运动，他喜欢单杠、双杠和垫上运动，像矫健的燕子上下翻飞；可能由于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出色的军人。装甲兵一直是重要兵种之一，他向往早日充当一名中国的坦克兵，不等大学毕业就于1936年到德国去学军事——装甲兵专业以遂爱国、报国之志。回国后，蒋纬国当一名坦克兵少尉排长，直到后来，才当上了装甲兵司令。

据悉，蒋纬国先生的原配夫人是石静宜（西北大王石凤翔之女）。当蒋留学归国不久，还只是个少尉排长时，一次在火车上偶遇石静宜，见她正在阅读英语报刊，风姿、仪表不凡，引起蒋纬国的极大关注，乃以借阅书刊与之攀谈，石对之不屑一顾，蒋却从此暗自钟情。经过辗转周折，二人终于1944年12月25日在西安结成伉俪。石静宜性情豪迈，有学识，善交际，在蒋任装甲兵司令时，她更是令人瞩目的司令夫人；她喜欢骑马、射击，常着军服、革靴，出入装甲兵军官聚会之中。蒋纬国亦以此夫人而十分得意，夫妇间的生活美满，可谓“门当户对，恩爱如漆”。谁料1953年妻子早逝，使蒋悲痛万分。事后，他创办了“静心小学”和“静宜女子英专”，以表达对夫人的殷切怀念。

关于蒋纬国的身世早有不少传说，曾引起他自己极大的困惑和苦恼。去台后，他偶然从蒋介石书房里翻到美国作家约翰·根舍所著的《亚洲内幕》一书，书中揭示了“蒋纬国乃戴季陶之子”一事。为此，他曾亲自探询过戴季陶，但戴也始终未能给他露底。由于他并不指望依靠蒋氏门庭去谋求某种殊荣、地位，一心凭藉个人才华和操行去自我奋进，以求有报效社会、国家之正途足矣，所以对此身世之谜，也就越来越淡漠而坦然处之了。

众所周知，蒋纬国在台湾政坛上，也是历经坎坷、而远非始终一帆风顺的。

以上都不过是一些“插曲”不容赘述。

蒋纬国先生面对当今台、陆两岸以及国际风云的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形势，头脑清醒，政治豁达，有胆有识，实属难能可贵，举凡爱国同胞、炎黄子孙，无不交口称颂，我亦深为所感，乃即兴写了打油诗一首，向他聊表敬慕之意及共盼祖国统一之心声。

敬致蒋纬国先生

海峡之隔若比邻，咫尺天涯各一方。
岁月沧桑五七春，难忘东吴曾同窗。
爱国主义旌旗举，中华儿女志气昂。

雷霆万钧金猴棒，痛斃公敌吠汪汪。
敢颂小平主张好，不屑妖魔逞猖狂。
祖国终将成一统，端待欢叙笑鬓霜。

盼望祖国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目睹祖国统一大业之告成。我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又写了一首打油诗：

盼祖国之早统一

隔峡遥望景清晰，鸥燕凄凄对岸泣。
本是炎黄同根裔，缘何骨肉两分离。
千秋功过焉足计，恩仇混抛更亲戚。
主义犹可存同异，一国两制俱相宜。
港澳回归已有期，台陆几时成统一？
国共合作今胜昔，振兴中华话新题。

我把这两首诗和一封信托人带到台湾送交蒋纬国先生，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儒琦学长勋鉴：

十一月九日来函及赠诗，均经拜读。别后五十余年，人事沧桑，天各一方，但对老同学之情义，始终未曾忘怀！

在旧金山发表之谈话，谬承过奖，实不敢当，海峡两岸亦有不同之回响。谨将本人美西讲话摘要再行抄录一份，及《论中国之统一（提纲式）》小册，并请参考，还祈指正幸！

崑此顺颂

闾府安康

蒋纬国敬启

十二月十三日

我仔细阅读了蒋纬国先生托人带来的《赴美西讲话摘要》及《论中国之统一》，据我看来，他早已年近古稀，但却壮心不已，盼望在有生之年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一些贡献。在这两材料和多次讲话中，他主要反复表达了以下论点：

一、坚持祖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他说：“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必须认定只需一个中国”，“凡欲窃据我国之一片领土与主权而求独立者，即为叛国且为两岸共同之公敌”。他还着重指出“台独”的后果：“如果想脱离中国而求之，则地区与母体皆受其害，结果是自作自受，遗祸子孙后代！”（《论中国之统一》第30页）。这与大陆

各党派及广大群众坚决反对“台独”或一中一台，是完全吻合的。

二、赞赏邓小平同志创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他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创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几年以来，大陆同胞生活，已较过去改善，并有了重新抬头的机会。这是我们大家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赴美西讲话摘要》第1页）他还说，祖国统一后，“中华民族就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共同努力建设民主、繁荣、均富现代化的新中国。”两岸共同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

三、他特别创导“中道”，这是他哲理的核心，属孙中山先生理念之余绪。按宋代理学家分析，“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其中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从实际出发探索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意识。对待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我们历来采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态度。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今我们党特别强调要“两手硬”、“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并重而且同步”，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在他的讲话中，凡涉及两岸关系问题时，他强调“求同存异”的原则。我们也主张“求同存异”，首先是由于客观上有“异”的存在，这是几十年的历史形成的。然而，“同”也是客观的存在，而且从炎黄子孙的血液中，从振兴中华的共同命运来看，“同”更是主要的、永恒的；“异”则是次要的、暂时的。存“异”是为了求同，而求同却不是为了“存异”，二者决不可等量齐观。他说：“从同守共需之大同，与互尊各自之小异”这一点与我们大陆现行主张毫无矛盾。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正是在政治上最明确的“求同存异”的体现。

他还在讲话中指出，“世界列强，并不希望中国早日走向统一之路，正利用海峡两岸分裂的状态，投两岸所好，又在两岸利用其各自内部的分裂，针对人性之弱缺，以二分法的手段，投其各自所好，不断地挑拨分化海峡两岸，以及两岸之内部，直接间接地破坏中国早日走上团结之路”（《论中国之统一》第3页）

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步骤，他提出建议：“一面仍继续当前进行的一切业务性的接触，但应互信、互谅、互尊、互重、互利、善意与诚意地进行”，“依现在两岸情势来看，就是升高层次，以民主主义精神为基础，鼓

励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以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

我认为，他的这些话很有见地，中国两岸的统一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决不能再受任何外力的摆布。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前不久他在接待香港记者专访的谈话中，当记者问到他：“是否要退出政坛”时，他的回答只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确义正词严，铿锵犀利，这八个大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语破题，道出了他对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业是始终如一地壮心不已，矢志不移的！

我第二次给蒋纬国先生写信，谈了我对以上问题的看法，后从报纸上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很是挂念，便又接着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是直接寄往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为他表示慰问的。没有想到这次他的回信，竟直接寄到了我的家中。信中说：

“元月十三、二十及三月五日之大函与附件均经拜读，弟以有病在身，未能及时奉覆，深以为歉！

病情承蒙关注，由衷感谢。……”

来信并附病情报告，谈了他患病及治疗的详细经过：去年12月26日清晨4时许，自脚趾始渐渐往上以至下半身感到失去知觉，不能自主行动，立即与台北荣民总医院联络急诊。经检查发现两侧动脉脉搏微弱，随即判定主动脉剥离，除神智清楚外，下半身有瘫痪现象；又经电脑断层扫描，确定系剥离性主动脉夹层瘤剥离的情况严重，自升主动脉、降主动脉、颈动脉至肾动脉，都出现剥离情形，且肾脏已发生缺血性梗塞。由于恐怕动脉剥离进而破裂造成大出血休克致死，医生建议紧急手术。手术从11时30分开始，午后4点结束，整个过程颇为顺畅，于5时10分被转入手术后恢复室观察。不久，又发现胸腔引流管出血量达每小时950CC，乃于27日零晨再剖胸探查止血，经3小时完成。第二次手术后一切生命现象均趋正常。1月1日拔除呼吸器及鼻胃管，开始自己进食并坐着看电视，以及写字交谈，两腿亦可自主活动。病情报告中还说，这次他心脏先后停跳三次，而今能化险为夷，死而复生，实属于医生们的卓越医术及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总之，历经坎坷、年逾古稀的蒋纬国先生满怀鸿鹄之志仍丝毫不减当年，甚至更趋成熟、干练与坚强，确实可敬可佩。最近又以其非凡的毅力、体力终能战胜病魔并奇迹般地很快完全康复，确实可喜可贺。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37：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

● 鲁 淳

1937年4月5日，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上。古老的祭黄帝陵仪式，又一次在这里举行。

民国以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派大员祭黄帝陵，已经有多次了。这年不同往常。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也派代表前来祭陵。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它引起了世人瞩目；过后则成为历史佳话，广为流传。

史书记载最早到桥山祭黄帝陵的，是汉武帝刘彻。《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6年）冬，“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以后，历代不少帝王都派重臣前来祭陵。百姓祭祀者，更是络绎不绝。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政府。3月，即派人到中部县祭黄帝陵。可惜，孙中山写的祭文手迹遗失，只留下不朽文句：“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的盛事发生在1937年，不是偶然的。曾有过第一次合作并取得了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国共两党，经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而后分道扬镳，但由于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人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御侮的呼声日高，特别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关系朝着重新合作的方向迅速发展。

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这次祭陵后仅仅三个月零两天，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1937年的祭黄帝陵活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两篇祭文都是这样写的。据查当时的《中央日报》，实际上，顾祝同于4月5日上午先到咸阳祭扫周陵，下午又去兴平祭扫茂陵，并没有到中部县祭黄帝陵，而是派刘震东作为代表参加的。共产党中央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派出的祭陵代表是林祖涵（伯渠）。祭文是毛泽东撰写的。

张继、孙蔚如一行，原定4月3日由西安去中部县，因大雨未能成行。4月4日晨，张继、孙蔚如等一行，分乘汽车6辆，离开西安。4月5日晨，中部县阳光灿烂，桥山上古柏青翠，国共两党代表来到黄帝陵，并恭读了各自的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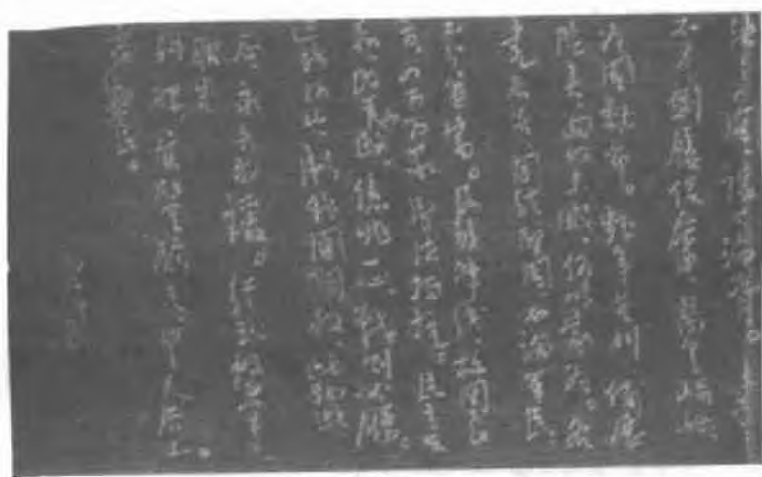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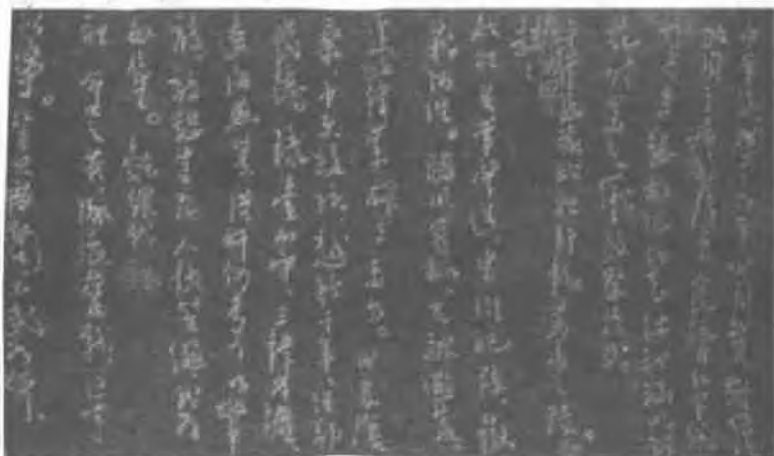
今天再读一读这三篇祭文，作一番比较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且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对黄帝的评价，是颇有意义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受株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尚飨！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祭文：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谨以香醴庶馐代表敬祭于桥陵，其辞曰：惟帝制周万物，泽被瀛寰。拯群生于涂炭，固国本于金汤。涿鹿征诸侯之兵，肇野成一统之业。干戈以定祸乱，制作以开太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祭黄帝陵文碑石

平。盛德鸿规，于今攸赖，今值清明之良辰，爰修祭祀之旧典，因寝葱郁，如瞻弓剑之威仪；庭燎通明，恍接云门之雅奏。所冀在天灵爽，鉴此精诚；默启邦人，同心一德；化灾沴为祥和，跻一世于仁寿；庶凭鸿臆，以集丕功。备礼洁诚，伏维歆格！

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

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跎；越数千年，强邻蔑视。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越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

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各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谗，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三篇祭文，在形式上，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祭文写法；从内容上，有许多基本的共同点：

第一，一致确认轩辕黄帝的始祖地位。国民党中央代表云：“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代表云：“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一个说“开国始祖”，就国家而言；一个说“中华民族始祖”，从民族着眼。角度略有差异，实质完全一样。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黄帝作为上古时期的一个部族首领，一般认为当时正处于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属于原始公社的末期。正如国民党中央的祭文所说，那时的社会，“粵稽遐古，世属洪流；天造草昧，民乏典章。”黄帝不但受到本部族人们的信赖与爱戴，而且经过与炎帝部族的阪泉之战，特别是与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战，成为中原各部族的首领，促进了各部族之间的融合，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祭文说：“涿鹿征诸侯之兵，讐野成一统之业。”共产党祭文说：“涿鹿奋战，区宇以宁”。都肯定了黄帝取得涿鹿之战的胜利，实现统一，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和象征。也是从这个意义上，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我们国家的始祖。国民党中央祭文以“开国建极，临洽黎元”，概括黄帝的首要

功德。毛泽东撰写的祭文，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八个字，作为祭文正文的开端，气势更加不凡。

第二，一致赞颂轩辕黄帝的丰功伟业。国民党中央的祭文以“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来概括黄帝的主要贡献，与一般的说法是一致的。相传黄帝的发明创造很多，无法一一考证，其中不少大体符合那个时代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后人把众多发明创造，归功于黄帝，实际上是把作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先民的代表和象征，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列举的历法、文字、宫室、衣服等几项，对于先民的生活至关重要，也是中华文化悠久、瑰丽的突出表现。共产党中央祭文对黄帝的功德未具体罗列，却

作了高度评价：“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人们所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以具有一系列发明创造的黄帝时代为开端的。许多学者称黄帝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伟大发明家。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更加贴切的。

第三，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帝陵的主旨。国民党祭文开宗明义，说明祭陵意义在于“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希望人们能够“追承绩猷，群情罔懈”，达到“保我族类”的目的。国民政府祭文希望通过祭陵，得以“默启邦人，同心一德”，“化灾沴为祥和，跻一世于仁寿”，表明了团结合作的愿望。毛泽东撰写的祭文，则把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指导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追怀黄帝功德之后，笔锋急转，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霸占东北后，又勾结汉奸，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辽海燕冀，汉奸何多！”并且坚决反对妥协退让，“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炎黄子孙杰出代表的毛泽东，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共祖的深厚感情：“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他以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心，联系自身，写道“东等不才，剑屦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祭文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并且对国民党提出了在内政上实行初步改革，以便联合抗日：“民主共和，改革内

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祭文结尾，对民族始祖黄帝发出庄严誓愿：“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这不仅是苏区军民的决心，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呼声，集中体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的代表同祭黄帝陵，各自宣读的祭文有如此共识，反映了炎黄子孙不论民族、宗教、党派、信仰如何不同，都对民族始祖深怀崇敬之情，都对中华民族的昌盛发达寄予殷切希望。岳飞的“还我河山”、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或隐或现于字里行间，表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何等深远的影响和多么巨大的凝聚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4月5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派代表前往祭黄帝陵，以后每年祭祀，直到1963年中断。1980年清明节，祭黄帝陵活动重新恢复。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海峡两岸同胞交往的扩大，近年来，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前来祭黄帝陵的，一年比一年多。桥山之上，沮水之滨，炎黄子孙祭祀之余，总是细心地去辨读有的字迹已经模糊的历代碑刻。其中，署名“蒋中正敬题”的三个大字“黄帝陵”碑和毛泽东手迹《祭黄帝陵文》碑，格外引人注目。

历史的轨迹是曲折的，却已经证明，1937年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唤起全国同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谨与读者重温这段历史佳话，以作纪念。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冬
黃帝陵
蔣中正敬題

蒋中正题黄帝陵碑

三次竞选法国总统的女华裔



成之凡

● 孙引南

今人费解：生活在西方最繁华美丽的现代化都市——巴黎，她却感到那里的一切都不如中国；她在巴黎有高贵的职业，有漂亮的别墅，有响亮的名气，却朝思暮想要回北京来定居。

她，就是法籍华裔名流、中国著名报人成舍我的长女成之凡女士。

来京办事的成女士满怀深情地向记者畅述了她那颗通体透亮的中国心。

成之凡不凡！

1981年2月，法国发生了一件轰动法兰西政坛的新闻：著名华人女艺术家成之凡正式宣布，与密特朗、德斯坦、希拉克、马歇等40多位著名法国政界人士竞选总统。她的这一壮举受到了法国影响最大的通讯社——法新社的支持。

她的竞选口号是：“选我就是选和平！”她将中国古代圣人提倡的“中庸之道”用于法国现代政治，她主张在法国实行“一元两位”的总统制，即左右两派，一派一个总统，或两派正副两个总统联合执政。

1988年，成之凡又一次角逐法国总统宝座，她向密特朗、希拉克、巴尔分别发出公开信，阐述了自己以道家学说为基础的政治思想。这一次，她将“一元两位”的政治主张发展为“三位一体”，即由大选中三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担任总统，以解决法国左右两派“共治”时期所出现的不协调。这一次，她又获得了法国新闻界的支持，又一次大振了法国华人的士气。

这两次竞选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法国对总统候选人所作的一项具体规定条件，它要求，作为总统候选人，必须征得法国500个议员或地方民选代表的联署签名的认可。显然，这一规定为众多的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角逐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1995年刚刚结束的这次法国总统大选，成之凡已于前年夏天宣布第三次竞选法国总统。这一次，她的政治主张是成立“全球缺席者大同盟”，这些“缺席者”，既没有投票支持、也没有投票反对法国总统密特朗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这股力量结合起来强大无比。她又认为，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大部分人仍然是“缺席者”，现在是到了把这股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了。她并提出“博爱”的主张，认为：只有用中国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实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才能解除当今世人的痛苦和危难。对这次竞选，她还是满腔热忱，她说，现在法国民众既不信本国政坛的左派，也不信右派，他们倒希望从中国古一点的哲学中得到启

发，更对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感到兴趣。这样，法国民众对她就很有兴趣，“有那么多的人支持我，又有那么多的报纸为我作宣传，所以我对这次竞选还是有信心的，况且前面已有了两次预演。”虽然她仍未当选，但作为一位法籍华人女子，三次竞选法国总统，这在全球的华人历史上，还闻所未闻。成之凡何以有如此的地位和胆量？

二

她有着一个令人羡慕的过去。

成之凡1928年出生在北平一个著名报人的家庭，父亲成舍我是当时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创办人，曾担任北平《世界日报》、南京《民生报》社社长。母亲杨璠曾是北平女师大的校花，聪明漂亮，又精明能干。作为成家的大小姐，成之凡在北平和南京度过了她幸福的童年。她具有艺术天分，母亲从小培养她弹钢琴、作乐曲、跳芭蕾舞。她钢琴基础深厚，从莫扎特、肖邦、到韩德尔，她弹遍了古典名曲，又从名曲中吸取灵感，开始了自己作曲。

她40年代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执教于上海音乐学院。1949年4月随家南迁定居香港，在香港圣学院教音乐，曾多次举办“成之凡作品演奏会”，香港电台也经常播放她的音乐作品。1951年，她获得一位法国著名钢琴家的赏识和帮助，到世界著名的艺术之都——巴黎发展她的艺术才能。她与法国工程师贝尔覃由相爱而结婚，之后随丈夫加入了法国国籍。她现在是巴黎欧洲音乐学院教授。

她很快成了法国有名的艺术家。

一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她在音乐、美术和服装设计等艺术领域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到各地去演奏，是法国电台公认的演奏家和作曲家，她自编自演的大型音乐节目《道之乐》，倾倒了巴黎观众；作为中国画家，巴黎“东方博物馆”和市政府都收藏有她的画作；巴黎市政府还给她一个银牌奖，巴黎“国家现代博物馆”邀请她当了会员，该馆被邀请的会员中，只有两个中国画家，一个是赵无极先生，一个就是成之凡女士。

她的服装设计也独具特色。她用中国的传统服式加以新变化，加上新装饰，使那些漂亮的服装在传统中显出新意，有时成之凡穿上这种自己新设计的服装在街上一出现，很快就在巴黎流行起来了，有的法国服装店还偷拍她身穿这种新服装的照片。

作为著名的画家、音乐家和服装设计师，成之凡受到法国艺术界的敬重和称赞；而人们更惊异和佩服的是，她有一颗与众不同的中国心。

三

成之凡对笔者说：“我因为嫁了个法国丈夫，就稀里糊涂地加入了法国籍，但我却一直把自己当中国人，我一天24小时都在爱中国！”

她谈了这么一个感受：“去法国之前，我是个非常以我为中心的人，因为人家都知道我是名家之女，是成舍我与杨璠的大女儿，《世界日报》的继承人，我很霸道，动不动耍大小姐脾气，把佣人大骂一顿，甚至砸东西。到法国后，谁也不知道成舍我、杨璠和《世界日报》，谁也不买你这个‘成家大小姐’的帐，而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假如我哪件事做得不好，人家就会说：‘这是一个中国女人做的！’所以到了外国，我便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处处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以不损害中国人的形象。”她说当年，曾见到几个中国女孩插足人家法国人的家庭，她就劝她们：“我们中国女孩在国外不要做这种事，宁可不要嫁人也不要丢中国人的脸。对外国人的东西不偷不抢，连垃圾也不拿！要知道，你犯法，杀头、坐牢，不是你个人的事。”

她有过一个类似“关云长刮骨疗毒”的壮举：

一次她在自己家里，被一条很大的狮毛狗多处咬伤，医生给她缝合之前，让护士为她上麻药，她坚决拒绝——因为她笃信中医，这位尊贵得象皇后一样的华人女艺术家，硬是咬着牙，任大夫在她白嫩的肌肤上“穿针引线”，令大夫与护士惊叹不已。那位大夫不禁拍着她的肩膀赞叹：“你真有勇气！”她马上回答：“我们中国女人都很有勇气！”

人家说她爱中国爱得太过分。这话一点不夸张。她的提包里总装着一双筷子，不管到哪里吃饭，即使是外国人宴请，她也照例使用自备的筷子，不管人家会不会生气。她认为，中国的筷子比西方的刀叉文雅、方便，功能也大。她说，中国的烹调为何比西方早了几千年，因为西方用手抓饭吃的时候，中国已经用筷子了。

她爱穿中国的民族服装，认为中国民族服装比西方的合理、科学，几件衣料可以套着裁，不浪费一寸一分；而西式衣服的裁剪浪费比较大。

她爱中国的文字，认为汉字是神圣的、神秘的，字与字之间意思是连贯的；而外国文字之间意思是切断的，思考也是切断的，所以有位西方汉学家也认定汉字可以成为世界通用的统一的文字。

她爱中国爱疯了，以至令世人神往的艺术之都巴黎，在她眼里“一点也没意思，那里天是灰灰的，墙是

灰灰的，屋顶也是灰灰的，都不如中国好。”她甚至对法国朋友坦言：“连你们的棺材都不如中国的好，中国的棺材方方正正，而你们是两头尖的，没有道家哲学中‘空’的观念；显得很憋闷。”

很有意思，由于她在法国一直用“成之凡”这个中文名字，很少用“贝太”之称，每当有她的电视片，她总要求电视台：“把我的中文名字打出来！”在她的画展上，人家反而称她的丈夫为“成之凡先生”，有人对她说：“你的画上用中文名字不容易成名。”她回答：“我不能为了成名而放弃我的中国名字！”她认为西方没有女权，女人婚前用父亲的名字，婚后用丈夫的名字，而没有自己的名字；中国的女人都用自己的名字。

成之凡爱中国，最突出的是她坚持不懈地传播中国文化。

她从小学油画、芭蕾、钢琴，由崇拜西方文化转变为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在巴黎，她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东方文化传播者。她组织了传播中国道家哲学的“成道协会”，将《道德经》谱写成乐曲，自编自演《道之乐》，用中国的锣、钹、笛、琴、牛皮鼓、响板等民族乐器进行演奏，如流水、空谷、鸟鸣、风啸般的乐声，使听众如身临大自然的美妙境界，获得一种独特的美的享受。现在，法国“现代神圣艺术沙龙”每年都邀请成之凡登台表演她的《道之乐》。通过她的演奏，不少法国人喜欢上了中国文化，有的从几百里外乘火车赶到演出地点观看她的《道之乐》表演，并向她请教道教思想。

为了便于传播中国文化，她还特地盖了一幢古色古香的中国式的建筑“挽云楼”。该楼由她那位建筑工程师的丈夫为她设计。但当时在申请地皮时遇到了困难，她为之奔波了七八个月，一直告到当时的总理希拉克那里，希拉克派秘书接待了她。这位开明的总理马上给有关方面打电话：“这不是个建筑物，而是个艺术品！是她的创作！”这幢宁静肃穆的挽云楼终于在蓝波叶市法国总统的行宫附近落成。成之凡从此有了一个教授音乐、汉字和太极拳等中国文化的理想场所。

然而，这一项还不能满足她对故国的强烈感情的要求，她说：“我踏上法兰西的土地，昏昏然已40多年了，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抵消我深深的思乡之情。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了自己的文化环境，没有了乡情的温暖。”她殷切希望尽早回北京定居。

这位华裔名流的做法和愿望，值得那些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人深思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本刊上期发表了吴玉如先生的墨迹：《炎黄子孙盼统一遥寄张大千》，这里介绍吴玉如先生的生平



气骨非凡 的 大书法家

吴玉如

● 王淦华

吴玉如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十二年了，而十二年前的诸多往事，仍然历历如在目前，使人难以忘怀。

一介清贫 坎坷平生

先生名家球，字玉如，出生于1898年，安徽泾县茂林人，故早年曾号茂林居士。晚岁自号迂叟，1982年8月8日病逝于天津。他因先天不足，从小体弱多病。初肄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后入北京大学预科，又转入朝阳大学（后改称私立朝阳学院），未能毕业，因祖父去世，为了赡养祖母，只得退学。1936年春，应母校老校长张伯苓之邀，返回母校，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秘书兼文学院教席。这是他一生中较为顺遂的一个时期，但好景不长，抗日战火打到天津，他只得避地租界，又开始了教人书法与卖字为生的贫苦生活。抗战胜利后，执教于私立工商学院及以后的国立津沽大学，任中文

系主任。建国以后长时期生活无着，直到晚年才又任职于天津图书馆，勉强维持俭朴生活。

与周恩来的师生情谊

先生在南开学校时，与周恩来总理是同班同学，而且还睡过上下铺，彼此情谊至深，在班上，乃至全校，二位都是知名人物。周总理以有宏大抱负，热衷于革命事业而著称，先生则以品学兼优，尤其以书道非凡而令人刮目相看。

1976年周总理去世，先生当即写出了两副挽联：

两万余里长征，有道终为天下法；
二十六年首辅，无私留待姓名香。

声名岂虚传而来，欧美亚非，无思不服；
功业是积劳以著，温敏勤毅，有口皆碑。

这都是发自先生肺腑的真实情感，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周总理深切友谊的自然流露。其中不着空泛的词藻，却道出了广大群众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周总理的一心为人民，勤勉乃致积劳成疾，是感人至深的。吴玉如先生言简意赅的两副挽联，至今读来犹催人泪下。两副挽联，犹觉意犹未尽，他又写了四首挽诗，诗中既追述了十六岁时学校同窗之谊，又指出了万众哀悼之真切，还回忆及抗战时代重庆的交往与建国后受总理之照顾。总理在学校时代名翔宇，诗即以《哭翔宇》为题。

十五同窗事眼前，百年到此哭谁边。
终身相业清无我，尽瘁生灵百可传。

为相生平几个如？试看到死麓私园。
公忠举国人心印，巷哭谁曾出强呼！

巴江一别卅年中，从此云泥避不通。
老去他离君听得，关情一答笑孤桐。

一自受施未可忘，恩私我不说周郎。
毕生甘饒身无碗，惟此生平是故常。

诗中诸多情节，容下文再行细述，先此就第三首所述，作些交代。孤桐是章士钊（行严）先生的号。吴玉如先生在专门抄录送给我的一份稿本上为第三首作了些注释，云：

孤桐问某某穷蹙，君知否？答是同学，近闻他离（离婚——引者注）。孤桐笑谓：我未知也，如此不烦为作曹丘（犹云作介绍人——引者注）矣。归谓周未忘君，必致书，我为达之。因得生活费六十金於津市人民图书馆。

这说的是章士钊如何敦促他写信给总理，总理又如何作出安排等。此一安排，先生真是至死铭记不忘的。由此可看出他与总理同窗情谊之不一般，尽管如云与泥似地相避不通长达三十年，但总理对他还是一直关心着，并了解情况至细，连离婚等私生活也都清楚；尽管所走道路有异，但总理对吴玉如先生的为人始终是十分敬重的，对他的学问尤其是书道是珍重的、佩服的。

吴玉如先生常对弟子们说：“人在世间作人是第一义，读书尚在第二义，作人读书各有分晓。”他不但这样说，而且是80余年一贯这样做的。他的读书可谓精而且博，但都是服从于首先要做好人这一大前提的。他一生最恨的就是文人无行。他之一生敬重周总理，首先敬重的是无私为人民，积劳成功业；总理之敬重他，又

正在他的为人刚直不阿，清正自守。

风也归来 雨也归来

吴玉如先生在南开学校时，得到校长张伯苓先生的器重。日军侵华被迫避地租界后，又与校长失去了联系，直到第二年才得到校长与何廉教授等人的消息，原来他们已到了重庆，先生在为他们高兴的同时，已暗暗下了决心，也要到重庆去，以便直接参加抗日救国。他写了首《南乡一剪梅》词，并立刻寄往重庆。词是这样写的：

零落分长希，渺渺春愁杜魄哀。一寸芳心红未减，
生是春羞，死是春羞！

风雨逼瑶阶，紫燕呢喃傍镜台。为感多情怜旧幕，
风也归来，雨也归来！

先生此时所想无它，只想为抗日献出一份力量，把自身安危早已置之度外，一片冰心顿时跃然纸上。不久他便孑然一身，悄悄离家，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重庆。

当时张伯苓先生正主持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任参政会副议长，便聘请吴玉如先生任国民参政会秘书。这参政会中第三势力占有一定席位，能起到不少作用。吴玉如先生在参政会受到老校长的器重，仅其一；同时也觉得正可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民参政之目的，也可达到亲身参加抗日的目的，所以才接受了这一秘书工作。应该说，他是态度鲜明，目的明确。参政会秘书共四人，王世杰为秘书长，另有一位是雷震。王授意雷，让他去“规劝”吴玉如加入国民党，这也真可谓一番“好意”，因为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下，如若肯加入国民党，那可真是马上便可“走运”，来个一步登“天”。这对那些一心只想官运亨通的人来说，不正是个天大的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而吴玉如先生对此却与众不同，他坚决不填入党申请表。

先生在重庆期间，周总理也正在重庆红岩村工作，他们间也每有过从。当雷震进一步拉他入党而仍遭拒绝时，便带有一定威胁地说：“你不参加国民党，你就是共产党。”先生听了，也并不辩解或驳斥，只是一笑置之。

过了不久，蒋委员长说要召见参政会诸秘书，王、雷等人更以此为由，再次来拉吴玉如先生入党。为此他不得不提出辞呈，说是家母病重，必须马上离渝返津，王、雷等辈也拿他没办法，逼他入党的目的终于没达到。

临离重庆前，吴玉如先生专程去红岩村，向周恩来辞行，偏巧周恩来外出而未遇，只得留了个条子。周恩来回来见条后，还专门亲笔回了一信，信中多慰问勉励

之语,对他非走不可的气节深表敬仰。直到动身前一两天,因委员长召见的日子已定,有人还劝他说:“为什么不等见过了委员长再走呢?”他的回答说:“我见母亲比见委员长要紧。”

他在回天津的路上,作了三首七律,题目就叫《辞蜀书愤》。一到家风尘未浣,首先口授了这三首诗,让他的长子小如笔录了下来。诗虽短而包蕴的内容至为丰富。重庆之行一年左右,他却看清了世道之昏昏。壮志未成,留下的只是愤愤之情,却达到了“耻缚功名作死囚”的一身轻。他决心退出政界,“不向庙堂陈大计,能安绳户亦千秋。”这一行他自己作何评价?而落得的又是什么后果呢?“竭来权作搜奇辈,浪迹平生已失群。”只能是“我自拘虚无限界,吞声白屋作遗民”了。他最恨的是文人无行,重庆之行中偏偏让他看了个够,“私心只恨无人会,叔世难为直道谋。汉史徒彰云折槛,上方未斩佞臣头。”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多么令人怅失啊!一场奔波,毫无所获,到头来只残留数行清句,一介清贫,两袖清风。去重庆前写下的“风也归来,雨也归来”当是指不畏风险要到重庆去,结果怎样呢?倒成了清贫归津门的诗篇。

惜习篆隶 出艺盖情

吴玉如先生早在10岁以前便酷嗜书法,并已闻名遐迩。现存他最早的书法作品是13岁时写给祖母的一把扇子,楷书,笔笔工整,布局匀称,曾在展览会上面世,见者无不为之惊叹。由此已足见他苏、赵等大家之书道下过不小的功夫。仅此一点,别说是13岁,一般人恐怕30岁、40岁也还难以达到。

他尽管在书艺上推崇赵孟頫、王铎,并得力于这两家,但在为人方面决不因循。除上文已说过的,他更是一直提倡“要学写字应先学做人”,“写字首先必须读书”,更提倡“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在为人方面他所崇尚的是颜鲁公(真卿)与傅山(青主)等人。自幼直到抗战前,他的书道主要得力于二王的《黄庭经》、《乐毅论》、《十三行》等,进而得力于《元略志》、《龙藏寺碑》、《张黑女墓志》。在行、草方面,自然涉猎更广,《兰亭》、《圣教》、《书谱》、《争坐位》、《祭侄稿》、《法华》、《麓山》等等,几乎无不下过大功夫。从上列不足万一的略述中,已不可谓不广,然而篆隶方面确实还少涉足。就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蛰居租界时,直到1938年夏末秋初只身赴重庆之前,他闭门谢客,每天习字,而所习则以篆隶为主。上自《散氏盘》、《毛公鼎》等大家,中及汉隶,尤酷喜《张迁碑》质朴凝重的一路,下至清代诸大家所写的篆隶等,如邓石如、赵之

谦、翁同龢诸家,他在此时都潜心临习过。小如先生在《吴玉如书法集·前言》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1937年入冬后,作字益勤,元书纸每百张数日即用完。但写完则把字纸填塞火炉中,坚不示人。有好几次我想把他的这些“日课”保留下来,却遭到拒绝。1939年自渝返津,又写了一段时间。先父这一阶段的潜心篆隶,实是他中年书法艺术的一大转折点。

虽然他那时临写的墨迹一无存留,但下功夫之前与下功夫之后,在他所写的真、草、行诸体中所反映出来的面貌实是大不一样的。吴玉如先生能在逆境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顾贫困,一心扑在祖国文字与书道的研习上,正是凡人所做不到的崇高境界,更是令人敬仰。

毕生甘饿身无浼

从1949年直到1972年,这漫长的二十三个年头里,吴玉如先生竟连个工作单位都没有,更甭提准给发工资了。一开始是靠子女赡养。1951年长子调到北京工作;1957年次子同宾又被错划为右派,加上子女们也各各都有自己的家累,自己的难处,要靠子女们按月提供生活费也实在不可能。就在如此艰难竭蹶的困境中,他也还是挺过来了,真所谓“毕生甘饿身无浼”啊!

他的老友章士钊先生曾于1968年准备介绍他进文史馆,周总理也同意了,只因“文革”中总理想做的事也往往不能落实,一拖又是4年。到1972年,章士钊先生再次敦促他写信给总理,说只要你写好了交给我,我一定能当面交到周总理手里。老友如此一片真心地要帮忙,也说明吴玉如先生的生活也实在到了无法再凑合的地步了。这时他还只是碍于老友的面子,才遵嘱写了信,总理及时批了下来,在天津人民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按月发给工资60元。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么!”

吴玉如先生家住天津马场道照耀里,地势较低,尤其他住的那间,虽向阳而终年十分潮湿。天津发过几次大水,他那间都进了水。他一生节衣缩食,而把偶有的衣食之余都用在买书上,所以他的藏书还颇可观,但不少都泡过水,成了砖头似的硬块,而其中还真有若干颇为珍贵的版本呢。十年浩劫中他家当然难逃抄家之厄,心爱的书,包括经常要临习的珍贵碑帖,悉数抄走,这好比缴了械,要了他的命根子,但他也还能泰然处之。每当我对此流露出遗憾与愤懑之情时,他对我却总是只说一句话:“哎!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么!”他就是这样地能看穿,能看淡,以“毕生甘饿身无浼”来严格要求

自己。

为了暂避潮湿的住房，也因京中有他的亲妹妹和不少好友、学生，所以七十年代中他常常愿意到北京来小住，就借一位远亲在右安门里的一间朝东楼房为安身之处。斗室中除时时要翻检要用的几卷书几个本子以及笔墨纸砚外，一桌一椅一榻。他仅有的月薪60元，扣去天津房费以及汇来的汇费外，已不足50元。还要付这斗室的房钱、伙食费等，还能剩几个子儿？那时他腿脚尚健，总不免要出门走走，这三元五角的月票钱还不能省。而出门时除了带上月票外，往往是囊中羞涩，甚至是分文无有的吧！过去他还偶有下小馆的雅好，诸如同和居、致美斋、康乐等等，只要吴玉老一去，服务员还总是热情接待，但此时他又怎敢去光顾小馆呢？

那些年“四人帮”横行，为了首都的“安全”，每逢“五一”“十一”前夕，总是要严查临时户口，并强令节前返回原地。吴玉如先生这少得可怜的几个钱，还不得不冤枉花在购买火车票上。

炎黄子孙盼统一

到了七十年代末，他的腿脚已渐感不便，再一年两度地被赶回天津“过节”也实在受不了，所以大家只好劝他还是回天津住吧。但回天津后生活上仍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子女们白天要上班，工作又都很忙。有一次他上厕所，竟休克在厕所里长达三个多小时而没人发现，即使体魄比他强壮得多的人，遇上这等事也会受不了的，而他竟然也扛过来了。他习惯吃面食，食量很小，但每月仅供三斤富强粉也总是不够用的。老人身体日见虚弱，而为祖国早日实现统一的心愿却愈老愈切。1982年4月的一天，吴玉老见到郑敏、崔颂明等同志去看他，心情十分高兴。他们谈到两岸统一问题，更是兴奋难抑，吴老立即提笔写下了“炎黄子孙盼统一遥寄张大千。吴家球时年八十有五”等字。这种急切的心情，完全在这幅字上反映出来了，写得是如此之传神，真堪是最后岁月里最出色的作品了。事情也真巧，事后得知，那天正是张大千先生八十四华诞之辰，蒋经国也正好为他在总统府祝寿，并亲自授予中正勋章。这可真是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相通的天作感应啊！这一天作之巧合，《人民日报》、《台声》杂志等都作了专门报导，杨继仁的《张大千传》、李永翘的《张大千年谱》等，也都有专章专节的记载。祖国的和平统一，可真是应顺天意的大事啊！

又通过崔颂明、郑敏等同志的积极努力，1982年

5月25日，在广播电视部编印的《内部参阅情况》第222号上，登载了以《对书法家吴玉如落实政策的一些问题》为题的文章，成为一期专号内参。此内参是直接上送中央领导、中办、国务院的。由此，吴玉老的生活问题得到了中央以及更多方面的关心与重视。房子问题等也都相继被提到日程上来。

遗憾的是，还没等房屋等问题真正落实，吴玉老却于同年8月8日遽归道山了。

天津文史馆本准备为吴玉老举办一次书法作品展，因为此时吴玉老已是天津文史馆馆员，并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市文联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但他终于没能等到展览开幕那一天，作品展也只好改称遗作展了。

晶莹之心 永照人寰

吴玉如先生一生清白为人，严谨治学，并培养了大批学生、门弟子，为国家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他自身，除为人类留下了数量质量都相当惊人的书法作品外，其它则留得太少太少了。他的诗词作品如不散失，数量当大大超出千首，而现存还不足五百首。他的书论都十分精辟，可惜也多散失，可收集到的数量也甚少。至于其它作品，则更少了。但他那颗高尚晶莹之心，则定会永照人寰。1986年5月27日至6月2日，中国书法家协会、文物局红楼书画研究会、天津茂林书法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等，联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又一次举办了《吴玉如先生书法遗作展》，全国书协主席启功先生为展览题了名，展出期间得到了书法界极高的赞扬与称颂，给人们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深刻印象。四川著名微雕专家、书画篆刻家刘声道，将吴玉老为他老家永川县石龙山题写的三个大字“石龙山”，放得大大的，刻在了山的主峰顶端，以吴玉老的墨宝为首，将率领他的子弟们继续刻下去，准备刻成一组世界少有的摩崖石刻群。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书法爱好者与收藏家，都争相珍藏吴玉老的作品。更必须一提的是，上述吴玉老遥寄张大千的那幅名著，得到了众多名人名家的一片赞誉，赵朴老在这幅字上题了“挥臂高呼，至性至情之笔”几个字，萧劳、董寿平、尹瘦石、胡爽庵、王遐举，以及吴玉老的大弟子欧阳中石等，也都饱含真情地挥毫敬题，天津国家级文物鉴定家刘光启更是对这幅字赞口不绝，认为是幅超过了苏东坡的巨作。黄河碑林还特地征得了这幅字，将它刻上碑石。

(1994年5月18日三次修改定稿)

帅府家事

——记罗元帅夫人林月琴和子女们

● 李俊亭

百姓们常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实际上，地位显赫的将门帅府亦然。君不见，有的将军能指挥千军万马，却理不清家长里短。谁家倘若有位善理家事的女主人，实乃全家之大幸。在中国的将帅夫人中，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即是善理家事、善念“家经”的一位。这里不讲她早年如何参加红军，长征路上、抗日前线、东北战场如何历经千难万险的传奇，只介绍她作为一个母亲——二男四女的生母，一个罗帅前妻女儿的继母，如何处理家事和教育子女的故事。

1937年春，林月琴在延安同罗荣桓相识、相爱、结婚。在战争年代，林月琴先后生过四个孩子。因部队作战频繁，缺乏稳定的生活环境，孩子生下不久即寄养在老乡家里。由于生活条件太差，大儿子罗北屯、二女儿罗林只活了一两岁，便离开了人间。二儿子罗东进、大女儿罗南下，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小毛驴驮载的箩筐里，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迎来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949年10月，林月琴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因怀这个女儿时正值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时候，罗荣桓便给她取名北捷，小名巧巧则是林月琴起的。因为此时东进、南下都已上学了，新中国也诞生了，她来得正是时候。隔了两年，林月琴又生育了最小的女儿——娜娜，学名罗宁。

罗荣桓元帅青年时代离开家乡投身革命时，为了不连累妻孥，曾写了一纸离婚书，劝前妻颜月娥改嫁，此后十几年与家里中断了联系。但颜月娥仍然生活在罗家，不肯再婚，依靠一手好针线活，含辛茹苦，将女儿罗玉英抚育成人。1949年初，由母亲做主，23岁的罗玉英嫁给了小学教师陈卓。

湖南解放后，罗荣桓得悉这些情况，便写信给罗玉英，让她到北京来读书。学一点文化，将来好为人民服

务。同时，林月琴托部队捎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有给颜月娥和罗玉英的几套四季服装，有她亲手编织的毛衣，还特意给颜月娥准备了一件新皮袄；给罗玉英即将分娩的孩子捎去了全套婴儿服装以及尿布等各种用品。

1950年1月，罗玉英带着刚满月的儿子猛猛，乘火车赴京。她刚下火车就见到了林妈妈，是这样的亲切，这样的慈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哽咽着喊了声“妈妈”，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旁边的东进亲切地叫了声“大姐”，急忙帮着提行李出站。

一路上，林月琴帮着玉英抱孩子，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罗荣桓见到离别20多年的女儿，非常高兴。玉英本有一肚子话要对爸爸倾诉，此时却只喊了一声“爸爸”，便泣不成声了。罗荣桓用手抚摸着女儿的头，深情地说：“这么多年，你在家也受苦了吧？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家在北京团聚了，这里的妈妈很好的，应该高兴才是啊！”听了爸爸的话，罗玉英又望了望正在忙着准备晚饭的妈妈，她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

在此前后，罗玉英的丈夫陈卓，以及罗荣桓的侄子、侄女侄孙等，也都来到北京。罗帅家顿时成了一个有十几个孩子的大家庭。做为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林月琴不仅疼爱自己亲生子女，对其他孩子也同样关怀体贴，悉心照料他（她）们的衣食住行，为他（她）们的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罗荣桓、林月琴将文化基础较好的陈卓和两个侄子介绍进了华北军政大学，一些年龄小的侄儿、侄女、侄孙则送到军队办的子弟学校读书。而比较难办的是罗玉英，她文化水平低，年龄又比较大，还有小孩拖累，罗荣桓、林月琴给予她更多的关怀体贴。

林月琴首先动员她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尔后找人帮她补习文化，准备考速成中学。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罗玉英考入速成中学预备班。从此，她格外刻苦地学习

文化，进步很快。

孩子们平时都在校寄宿，寒暑假都回来了。罗荣桓、林月琴便让孩子们组成一个家庭学习小组，由年龄最大的罗玉英当组长，组织弟弟、妹妹们按时作息，认真复习功课，并参加一些家务劳动，孩子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东进、南下寄宿的小学，离家很远，每周星期六下午回家，罗荣桓、林月琴从不派小车去接，而是让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有一次，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知道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

林月琴作为母亲，对孩子们的生活关照得多一些，尽可能满足孩子们的一些合理要求，但也注意到了孩子的思想上有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一次，她给东进买了顶棉帽，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要求妈妈给买一顶皮的。林月琴没有答应他，给他耐心讲了些要艰苦朴素、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的道理。

这件事，罗荣桓后来知道了，把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和林月琴专门商讨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决定在思想作风上更加严格地要求，培养孩子们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怕苦累的精神。

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便步行20多里，天很黑了才赶回家。全家人正在担心、着急，见东进带着妹妹满头大汗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这样做很好！你们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

林月琴为东进、南下扫着满身的尘土，既心疼，又高兴。她想，荣桓要求她对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操心，而要在政治思想上多关心一点的意见是很正确的。现在，孩子们确实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父母的旧衣服一改都愿意穿；破了打上补丁也不嫌难看了。

由于罗荣桓、林月琴的严格教育，几个孩子在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优越感，而乐意和普通干部及工农的子弟接近。东进、南下和其他孩子，都有不少工农家庭出身的好伙伴，有时还领他们到家里玩，罗荣桓、林月琴都热情欢迎。罗荣桓夫妇还鼓励孩子常到同学家里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的，特别要和那些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同学接



林月琴同志

近，多帮助他们。

1955年初夏，一向充满欢乐、和谐气氛的罗帅家里，突然笼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刚满15岁的女儿南下，腿部长了恶性骨瘤，住进了医院。

南下长得很漂亮，两个大眼睛水灵灵的，特别象母亲。她很聪明，生性活泼，功课总是班里拔尖的，罗帅非常喜欢她。悉知女儿患了不治之症，林月琴十分悲伤，但又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南下的恶性骨瘤发展很快，要做截肢手术，再也瞒不住了。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什么人也不愿见。罗荣桓、林月琴鼓励她同疾病做斗争，顽强地活下去。但时过不久，癌细胞又扩散到肺部，病势危重的南下再次住进了医院，林月琴整天守护在女儿身边。尽管医生用尽了各种办法医治，病魔还是夺去了南下年轻的生命。

这是林月琴第三次失去孩子了，她陷入极大悲痛之中。同时，她又为如何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的父亲而焦虑不安。荣桓不久前病了一场，现在刚刚恢复，怎么能让他再承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呢！她决定自己留在医院料理孩子的后事，并且想稍微把悲痛抑制一下再回家。于是，她和参与抢救南下的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商量，希望他今天能去陪伴一下罗荣桓，并说：

“南下是荣桓最喜欢的孩子，如果他不问，你看是不是先不要告诉他？”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先去罗主任那里看一看。”黄树则安慰了林月琴几句，答应按她的吩咐办。

黄树则来到罗家，象往常一样先问候罗帅的饮食起居，尔后两个人在院子里边散步边闲谈。快到中午了，罗帅说：“今天你在我这里吃午饭。你是从医院里来吧？”

“是。”黄树则只能如实回答。

“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这孩子不行了？”罗帅终于打破了僵局。

黄树则点了点头，不得不把南下已于今天黎明时分病故的事告诉了他。

罗荣桓听了很镇定，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着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养活一个娃娃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娃娃丢了。南下是战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她妈为带东进、南下也吃了很多苦啊！”

随后，罗帅又问起林月琴在医院的情况，感叹地说：

“林月琴这几天可是熬坏了，饭吃不下，觉睡不安。母亲终归是母亲，为了孩子，她自己做得再多也还觉得不够。”

黄树则没再说什么，他后来回忆道：“对南下的死，罗帅无疑是很悲痛的，但是我知道，他不希望同志们对他表示慰问。在这时就愈益使人感到他那坚强的精神力量。”

吃午饭的时候，罗帅对黄树则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战场上的一件事：

“在那困难的环境里，小孩子牺牲是常有的事。有一次，部队正在紧张转移的时候，一个干部接到了他的孩子死亡的消息。这个干部平常是很坚强的，是在炮火里经过长期考验的，可是一接到这个消息，他抱头大哭起来。当时战情紧急，可是他为了孩子的死抱头大哭！我怎么办？我去安慰他吗？我不！我严肃地批评了他。第二天，他冷静下来，说我批评得对。这时候我才安慰了他。”

下午，林月琴从医院回来了。开始她还努力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似的。

“都料理好了吗？”罗帅说话的声音很平静。

林月琴无言地点了点头，随即问他的身体情况。见丈夫情绪平稳，也就安下心来。

其他几个子女中，东进、巧巧、腊腊身体和学习都很好，而玉英生病最多，学习中也遇到不少困难，林月

琴则给予她更多的母爱。

速成中学的功课特别紧张，罗玉英白天学、晚上背，仍感到比较吃力，每逢考试手就哆嗦。林月琴常去学校看望她，教她一个方法：考试前口中含块糖。这个方法果然灵验，罗玉英心里不再发慌，考试成绩有了进步。

由于学习压力过大，加上身体底子不佳，罗玉英先后得了神经衰弱、肺炎、肝炎等疾病，每次都是林月琴送她去医院检查、治疗。开始，罗玉英还挺“封建”，不肯让男医生检查。林月琴便耐心给她讲妇女解放了、时代进步了的道理。是啊，一个在封闭的小山村生活了20多年的青年女子，要适应大都市的一切，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刚进北京时，罗玉英不懂得吃香蕉要剥皮，不懂得怎样乘坐公共汽车……这个适应过程，全靠妈妈手把手的“传、帮、带”。在速成中学的几年，当她感到冷的时候，妈妈及时送来了“列宁式”新棉衣；当她生病住院的时候，妈妈常陪在她的身边。还送她去青岛海军医院疗养，疗养期间，当她思念儿子时，妈妈又寄来了猛猛最近的照片……

“妈妈怎么这么好哇，什么事都为我想得这么周到！”罗玉英不只一次地对笔者说：“我真是太幸福了，有这样一位和亲生母亲一样亲的好妈妈！”

由于学习压力太大，罗玉英要求提前分配工作。考虑到女儿的身体状况，罗荣桓、林月琴表示支持。1954年，罗玉英被分配到北京南郊的一个农场，搞人事工作。罗荣桓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女儿在城里机关找一个舒适的岗位，而是希望她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从农村出来，听说安排她到农场，也很高兴。但怎么样做人事工作，她却心中没数。

“你妈妈过去搞过组织工作，人事工作她可是行家啊！”罗荣桓对即将参加工作的女儿提了一些希望和要求，把“传经”、“辅导”的责任赋予了妻子。

临行前那些天，林月琴边为玉英准备行装，边对她讲应该怎样做好工作：

“做人事工作的，首先自己要大公无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再就是要善于团结同志，走群众路线，同工人们打成一片，讲话、做事要注意影响……”

在南郊农场，单纯、朴实的罗玉英时时把爸爸、妈妈的教诲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她常和农场工人一起劳动，一块聊天，相处得很融洽。领导交给的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她还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身体也有明显好转。第二年，罗玉英光荣地入了党，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



罗荣桓元帅全家人合影

罗玉英对笔者讲：“爸爸、妈妈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很大，为我树立了榜样，成为我奋斗的目标。参加工作后，我实际上是以妈妈做为榜样，象她那样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投入工作。我打心眼里佩服妈妈，你看她，粗活细活，文的武的，家里家外，样样都行，真够能干的，真是了不起！”

如今，年过六旬的罗玉英已经退休。离开农场后，她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科院工作。丈夫陈卓从军政大学毕业后，曾在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宫等单位任职。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罗玉英、陈卓常去看望年迈的妈妈，孩子们同姥姥也特别亲。笔者前往采访时，陈卓因有事外出，事后他特意打来电话，从“女婿”的角度谈了对妈妈的亲切感受。他说：“这样一个大家庭，血缘关系有亲有疏，几十年来，却能够这样的团结和睦，这样的亲密无间，从来没闹过什么矛盾，在元帅家庭中传为佳话。妈妈不仅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治家方面她堪称老一辈中的典范。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真是很幸福！”

罗荣桓、林月琴的其他几个子女也都很争气，他们

都没有辜负爸爸、妈妈的一番苦心，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奉献着智慧和力量。

罗东进从北京廿六中学毕业后，于1959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罗帅夫妇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东进也特别努力，成为又红又专的优秀学生。毕业后罗东进分配在七机部，从事国防科技的研究工作。后又调到军委炮兵科研处、第二炮兵科技部，现任二炮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军衔。一些曾在罗帅领导下工作过、又对罗东进比较熟悉的同志如是说：罗东进在性格、思想作风诸方面，继承了罗帅的许多好东西，从他身上可看到当年罗帅的影子。仅从他对婚姻的处理即可窥一斑。罗东进上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不少人热心给他介绍对象，十有八九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女儿。但罗东进并不看重“门当户对”，父母从小对他进行的“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的教育在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在找对象问题上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他最注重的是女方自身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同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同学潘仲文建立了恋爱关系。此后，再有任何豪门“千金”，他都毫不动心。把潘仲文的情况告诉妈妈后，妈妈对儿子的选择

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

如今，肩扛金星的罗东进和被授予大校军衔的潘仲文，称得上是一对美满的事业型夫妻。他们都肩负重任，牢记着、并实践着当年入大学时爸爸、妈妈的期望：“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当什么官。”

与共和国同龄的罗北捷（巧巧），现在是解放军三〇四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人常说，女儿是妈妈的“心头肉”，即使将门帅府，也多不例外。儿女大了，一般都要各立门户。罗氏子女中，北捷受兄妹的托付，继续和年过八旬的妈妈生活在一起。她说：“我是个医生，多照顾妈妈责无旁贷。”

谈起自己的医生职业，北捷颇为自豪：“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爸爸指导我选择的职业，是妈妈在几个节骨眼上点拨了我。”

十一二岁的时候，罗帅就常问她：“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北捷从小作文好、外语好，不假思索地说：“当个文学家，或者当个外交家也行。”

五六十年代，文学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做“文学梦”的青少年大有人在；外交家能周游列国，自然也颇有吸引力。

罗帅摇了摇头，说：“千万不要奢望当什么文学家，也不要当什么外交家。”

“那我干什么好呢？”北捷有些迷茫了。

“最好当医生，学点有用的实际本领。”罗帅给女儿讲了一番医生职业的特点：这是一种自由职业，任何时代都需要它；人的一生谁不生病？所以谁也离不开医生……

1972年，北捷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三〇四医院，真成了一名医生，实现了爸爸生前的遗愿。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她在大学里并没有打下扎实的基础。毕业后，医院分配的是些有关中草药方面的工作。

一天，林月琴对北捷说：“我看你现在的水平，只能算是赤脚医生，离真正的大夫差距太远了，应该争取进修一下。”

1977年，人们还在热心于政治运动，对致力于提高专业水平的“进修”并不重视。罗北捷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了“青年医生进修班”。协和医院，是中国医学精英集萃之地，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正规化的训练，使罗北捷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在这里的一年多，她才懂得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夫，深切感到医学是值得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结业时，协和医院几次

想留她，但她对部队很留恋，便仍回到三〇四医院。

1974年，罗北捷结婚了，丈夫赖克游是沈阳部队的一名军官。新婚蜜月刚开始16天，便接到医院的通知：立即停止休假，参加总后组织的赴青海医疗队。北捷怎么也想不通：丈夫在外地，婚假没有完，干嘛非让我去？

林月琴关心子女的专业进步，更重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见北捷闹情绪，便给她讲起当年妻子送郎当红军的故事，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那时候，结婚三天就上前线，你们结婚16天了，就那么难舍难离？别那么儿女情长的，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下，对你的一生会有好处。”

听妈妈的话，北捷随医疗队出发了，在青藏高原的格尔木、当雄等地整整工作了一年。青藏高原被国家定为“特别艰苦地区”，人称“生命禁区”，这里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大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这里群山起伏，雪峰相连，属千年永冻地带，滴水成冰，地硬如铁，全年平均气温零下6度。青藏兵站部的万余名官兵住的是帐篷、地窝子、干打垒，靠牛粪生火取暖，一年四季食用脱水干菜、咸菜和罐头。罗北捷和医疗队员们一起奔波于基层连队，为干部战士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受到官兵们的欢迎和信赖。在那里，肝病、心脏异常等高山性系列病发病率极高，几乎人人都是“病号”。从小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罗北捷对笔者说：“你如果不亲自到那里，简直就想象不到世界上还会有如此艰苦的地方，想象不到那里的基层官兵是怎样地能吃苦，能耐劳，能战斗。青藏高原的一年，给我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在那里，多次接到妈妈的来信和电话，她的鼓励和鞭策，使我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1978年，罗北捷生了个男孩，正在丈夫所在部队休产假。她接到赴加拿大进修的通知，便立即回北京复习功课，投入紧张的考前准备，还进行了外语强化训练。第二年，北捷的儿子还不到两岁，扔给妈妈带又担心老人的身体。林月琴对女儿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地去吧，我这身子骨挺到你回来没问题。”

临上飞机，林月琴往女儿的口袋里塞了一大把糖。没想到，这些糖竟成了“应急口粮”。飞机因意外情况在日本停留了一天，吃住无人问津，机上的18名留学生都没有一分外币，北捷把糖分给大家，度过了“难关”。

（下转73页）

女音乐指挥家郑小瑛



我国著名女音乐指挥家郑小瑛，从粉碎“四人帮”以来，曾指挥过160多场《茶花女》、100场《卡门》以及其他多部歌剧和交响乐的演出，其中包括一些世界著名乐团的演出，她那神奇的指挥棒，迷倒过国内外无数听众。她在每场演出前对交响乐的讲解，她组织“爱乐女”深入大专院校不计报酬的演出，她有求必应地去外地辅导新成立的交响乐队，现在又在为筹建我国第一支女子交响乐团，迎接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而奔走……这一系列的活动，对推动我国的严肃音乐走出低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们用掌声欢迎她，用鲜花呈献她，用文字和影视手段赞美她，年轻的音乐爱好者甚至为能求得她的一个签名而感到骄傲。

她对这一切，却看得很淡，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该做的。她说：“要不然，活着干嘛！”她以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就是听众的反馈，还有，就是老伴儿对她事业的支持。她总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如今，小瑛的名气越来越大，传媒对她的关注越来越多。当记者们也想把视线、镜头、话筒对着她的老伴儿——刘恩禹时，他总笑笑，

●程迺欣

而退避三舍。

他并不是在妻子的辉煌面前自惭形秽，但也不想以她的光彩把自己涂亮。他说：“她因做出了贡献而获得荣誉，是应该的。我尊重她的才能，我为她的成就高兴！”

他俩都有过失败的婚姻，但这是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了！痛苦磨练出来的，是对新的幸福的向往。如今，他们的向往已经成为现实。

他们得到的幸福是精神上的，是心的默契，爱的交融。他们所有的，至今也不是什么物质。

一位小瑛的崇拜者从外地来信说，他渴望到她身边来学习，同时在她的“花园洋房”里给她当花匠。此君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偶像只住着一套不足六十平米的三间房；去单位上班，不是骑车，就是乘“地铁”、坐“无轨”；如果是去演出，还得拎上一个装着演出服、指挥棒和各种乐谱的大包！……可每当有人为这位著名的大指挥忿忿不平时，小瑛总是报以坦然的微笑——虽然也不无叹息。

她说：“比比许多生活更艰苦的人，许多没有机会施展才能的人，我一切都能释怀。我只希望有工作做，工作就是生命的价值。”是啊，她一心扑在音乐事业上，哪有时间 and 精力为那点物质待遇去奔波，去争斗？

想起结婚时，住的那间破旧小屋，居然可以隔着半截墙与邻居老太太聊天，他们至今仍然开怀大笑。现在，条件不是好多了吗？人，知足常乐。

小瑛在自己的小家里，接待过四方十国的朋友和来访者。1994年末，寄来这里的贺年片就有百余张之多，在房屋四壁和一个特制的柜子里，琳琅满目的纪念品也近百种。这些来自世界各国、全国各地的友谊和鼓励，是她的真正财富。看到小瑛在精神上、感情上如此地富有，看到她时时为此而激动，而欣喜，老刘也由衷地高兴，甚至为她骄傲。至于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而送来的“礼物”，他们则同样深恶痛绝，一概拒之门外！

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但都能迅速化解为戏谑的玩笑，从不在晴空里留下阴云。

老刘喜欢新技术，喜欢凭着电视广告买新东西，小瑛嫌他花钱太大方。老刘则说小瑛太节俭了，什么都舍不得扔，包括五六十年代从公家借来的那些不协调、不配套的旧家具，她都舍不得更换。他屡屡建议改造家庭环境，都被否决了。看到墙壁上脏了一片，小瑛就用大白粉去抹，结果更加难看，可就是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搞什么装修。

1994年，小瑛出访欧洲和美国，已经退休在家的刘恩禹觉得“机会”来了，就抓紧时间自己设计，自己

跑材料，自己慢慢挪移笨重的钢琴和书柜，然后请来几个工人，在单元房里“大兴土木”：用新型涂料粉刷了墙壁，还安了挂镜线和木墙围，铺了地板，把七拼八凑的家具改成了统一式样的组合柜。厨房通向过厅的门窗，还贴上了很难物色到的蓝底白鹅图案的胶纸，使人误认为是教堂里那种彩色玻璃呢。尽管装修水平距当前许多年轻人家庭的豪华程度还相去甚远，可小瑛归来时，却被眼前这典雅、舒适而不浮华的崭新环境惊呆了。口头上嗔怪他扔了旧东西，花多了钱，心里却为丈夫在酷暑里的操劳而动情，为他的审美情趣之高雅而欣慰。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易于获得灵感，而且再有外国朋友来访，也不会因“寒酸”而尴尬了。

老刘则非常满意，非常快活。这是他为纪念结婚二十周年献给妻子的一份厚礼！

二十年前，当他们经朋友介绍而相识时，彼此一见如故。很快就情投意合，组织了新的家庭。那时，她在“样板团”里是“黑尖子”，并无真正用武之地；他在工厂当工程师，虽曾因研究特种纸新技术有所发明而多次受奖，也因“出身不好”而不甚得志。但他们，同样豁达开朗，正直单纯，仍然都在生活中追求真善美，所以相投相契，在自己的天地里得其所哉。

老刘是真正的男子汉。他自尊自信，淡泊名利。小瑛是留苏学生，著名指挥，学历比他高，声望比他大，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从来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他是为了小瑛而从上海调来北京，改了专业的。先到国家测绘总局搞研究工作，后调入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负责缩微光盘系统设备的引进和开发。小瑛常抱歉地说：“他为我牺牲了自己的专业。”老刘却很坦然：“我的专业，就是不断发展的新技术。所以无所谓牺牲，只需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和研究。”

他们虽然一个搞艺术，一个搞技术，但结婚二十年来，兴趣爱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越来越水乳交融。

小瑛看乐谱、听乐曲、备课、演出，白天忙不完，经常工作到深夜；老刘则习惯于早起早睡。他们原来只有一间房，老刘只得在各种音乐声中入睡，到后来竟养成了必须听着音乐才能入睡的习惯；音乐一停，反而会醒来。小瑛说：“他原来对音乐是无所谓的，可如今比我还离不开音乐了。”

而她，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也渐渐对现代科技产生了兴趣，最近居然开始在电脑上蹒跚学步了。

他俩都忙，很少有时间出去游玩。但一有机会，也从不放过。

有一次小瑛去武汉演出，任务结束，打电话约在上海刚刚出差完毕的老刘去黄山一游。他到了约定碰头

的地点铜陵码头,才知道他们上了地图的当,想走近路却反而绕远了。不得不又乘火车返回芜湖,再去黄山。这点儿挫折,浪费了时间,反增加了游兴。到了风景奇特绝妙处,小瑛总忍不住孩子般地大喊大叫,老刘也深受感染。

有一年冬天,在西安接连演出了九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后,小瑛打回电话,约老刘利用周末,赶去听最后一场,然后同游华山。不料那天刚到华山脚下,就飘起了雪花。同游的人有些畏难了,可是小瑛游兴正浓,哪肯罢休!大家不放心,只好陪她上山。黄昏后,山上漆黑一片,人们只能借助雪光,紧抓着路边的铁链,提心吊胆地拾级而上。好不容易爬到了北高峰,一个个浑身湿透,叫苦不迭。没想到,第二天竟是个大晴天!遍山的白雪,满树的冰挂,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谁都不怨我啦!”小瑛很得意。

她小时候在四川住过山区,熟悉山,热爱山,懂得山的奇妙,欣赏山的雄伟多姿,经常能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因此,我国南北的名山之上,多留有她的足迹。

老刘也爱山了。一次,开了个什么会议后,他安排大家去虎峪爬山。因为下起雨来,有人迟疑了。他却坚持“下刀子也要去”,带队冒雨前行。第二天,真巧,也变成了大晴天!面对秀丽的山景,他又鼓动大家从没路的地方攀着树枝踏出路来……

有一次在芝加哥访问游览,一天晚上,同行的人都为找不到回住所的路而着急,他却胸有成竹地领着大家,冲着一幢可以作为标志的高楼方向走去。七拐八拐,居然准确无误地到达了所住旅馆的门口。大家都惊讶万分,他却诙谐地说:“你们忘了我是学测绘的啦!”

实际上,他这时想到的,是万里之外的小瑛——正是她,多少次带着他漫游郊野,硬是从无路之处走出路来。她那浪漫的气质,开拓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也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音乐,自然,一切美好的事物,是他们共同所爱。这爱,又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感情。在这样的感情生活中,人世间的种种污秽、不平……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有时遇到不称心的事,我顶多生两天气,就完了。以后有谁再提起,我还要想半天才记得起来呢。”小瑛

是那么豁达,像水晶般透亮。老刘也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互相体贴,互相帮助,越来越亲密无间。

每当她忙于工作,无暇顾及生活琐事,甚至忘了吃饭时,总是他,按着钟点,把煮好的一碗挂面或速冻饺子端到她面前,让她从容吃罢,好去办事或演出。每当她工作或演出完毕,带着满脸喜悦或满心烦恼,一身倦意地回到家中时,总是他,以理解的、关切的微笑,呈献出家庭的全部温暖,与她分享欢乐或分担烦恼,为她化解疲劳。

“如果推门进来,看到的是一脸冰霜,那会是什么样啊!”小瑛感慨地说。

有时,小瑛也打趣说:“原来,是我做饭的。有一次,我骑车摔伤了腿,躺在床上,他不得不学着做饭。以后我忙起来,就常常是他做我吃,他只能连呼‘上当’了!”

老刘笑了,结结巴巴地解嘲说:“其实,做饭也不难。我是个技术型的人,把烧菜做饭看成搞实验一样,只要掌握好火候,敢于多放调料,善动脑筋,举一反三……”的确,他的改良“担担面”就受到来客的一致好评,成了他们家的“名牌”。

小瑛为自己没有更多时间在家里,也不免感到歉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在“文革”后赶排《阿依古丽》时,一日三班,忙得顾不了家。一天夜晚归来时,见老刘眩晕症发,倒在床上,吐了一地……“那时,我真抱歉极了,难过极了,可我又不能撇下工作不顾啊!”以后,她学会了打针,学会了护理,提前预防,老刘的健康果有好转。家务事,她也竭力抽空去做,特别是那些老刘不爱做的,如刷马桶、掏下水道之类。

如果有人以为,在成功的女性身边的男人,一定很不自在;那么,在看到老刘那坦然的微笑后,你就不再会这么想了。也许,你还会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

“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为他(她)的幸福而高兴,为使他(她)能够更幸福而去做需要做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

小瑛,你是幸福的!

(责任编辑:舒元璋)

从日本战俘到 为中国服务的专家

● 白 描

1946年夏。中国东北延吉火车站。

遣反日本战俘的列车沉重地喘息着，缓缓开出车站。不一刻，空荡冷落的站台上奔来一个喘吁吁身背简单行囊的日本青年。他急切地打听遣返列车的消息。当获悉列车已于10分钟前刚刚开出，这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顿时陷入绝望之中。

数年前，战争的皮鞭无情地将他从那个东洋岛国驱赶到中国土地上。噩梦般的经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告结束，眼下他已获准随被遣返人员一同回国。然而，他晚了10分钟。十分钟前开始转动的车轮碾碎了他的梦想，他僵立在被夏日的骄阳炙烤的中国北方的土地上，呆呆站立许久，他才缓慢迟疑地转动身体，朝他来的方向迈开了脚步——那是曾经收容过他的八路军的一个卫生队。

他叫川越敏孝。

42年后的198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

20多位外国老专家被邀请到这里。大厅里华灯璀璨，鲜花簇拥。热烈的气氛中，记者们摄影机的闪光灯不时在这些老专家的面前闪亮。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刻。中国党和政府为感谢这些老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决定授予他们荣誉证书。老专家队伍当中，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孤独地僵立在延吉车站骄阳下的瘦削身影。他的头发已经斑白，额头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身板笔直，神色健朗。当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将象征崇高荣誉的烫金证书颁发给他时，在闪光灯的辉映和热烈的掌声中，年近古稀的老人那历经沧桑的脸上绽现出由衷的笑容。

—

1943年，川越以优异成绩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



川越敏孝

毕业，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录用到大藏省主计局（处理预算、决算的部门）工作。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处于紧要阶段，在兵役面前，这位满怀抱负要在经济学领域干出一番事业的帝国大学毕业生，仅仅在主计局工作了半年，便被一纸征兵通知改变了命运，成了日本军队中的一名小兵。

他先被送到朝鲜，以他的条件，他可以成为军队中的一名干部，然而他拒绝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于是他又被转送到哈尔滨俄语教育队，学当翻译。学习即将结业，战争结束。虽然他幸免成为战争的直接罪人，但他一直将这段经历看成是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我时常思考我以及我的同代人的经历。”川越先生沉思地缓缓说道，“中国的土地上，流淌过中国青年的血，也流淌过日本青年的血，但前者是为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牺牲的，他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后者则是战争的炮灰，是军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野心

而献出的祭品，他们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两者的意义迥然不同。对此，作为曾是侵略军中的一员，我时时都在进行深刻的反省。”川越的弟弟原在日本国内一家医院工作，后来也被征召到菲律宾战场的卫生队里。一次美军飞机轰炸受了重伤，他替自己注射了一支致命的药物而自杀。还有川越熟悉的许多朋友和同学，都永远将尸骨遗弃在异国的土地上。

在八路军的卫生队里，川越因不懂医术，便只能干些劈柴烧水之类的杂活。他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利用这个机会，仔细观察、思考着日、俄、中三支军队之间的不同。他说：“日本军队的兵营总用土墙高高地围起来；苏联军队的收容所没有墙，但是用铁丝网围起来；而在我们这些被八路军接收的人的营房周围，却毫不设防。日本军队里等级制度森严，军官对士兵非打即骂，常常是拳脚相加；苏联军队中没有等级制度，但有少数不良分子经常抢夺日本战俘的金钱，欺辱日本妇女；八路军士兵则是一身打满补丁的旧衣和亲切的笑脸，使你如见亲人。日军、苏军里没有人权，八路军里有充分的人权。部队里的同志总是对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日本人民是我们的兄弟，咱们同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些明确的道理，早已为他们的日常行动所证实，我们是不难接受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已从八路军的战俘变成八路军的同志时，我以及在这里的其他日本人，便开始自觉要求自己必须真正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了。”

二

新中国诞生，川越同中国人民一样，感到极大的振奋与鼓舞。

当时他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经历了连年不断战火摧残的中国大地，五星红旗飘扬起来，中国共产党满怀信心地领导人民建设新的家园。川越看到了一种辉煌的前景和巨大的希望。战后的日本也正重整旗鼓恢复经济，川越的许多同学在日本很活跃，但他并不羡慕他们。他充满信心地要协助中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要在中日人民之间架起一道友好的桥梁。

1952年，他被调到北京从事新的工作。正好在这时，中国第二次遣返日本侨民的船只即将赴日。

如果愿意，他是可以回国的，而此时母亲也来了信，催他回国与亲人团聚。弟弟死后，家中只剩下父母亲，父亲因患脑溢血多年来一直卧床不起，母亲因思念他夜里常常从睡梦中哭醒。“一想到无依无靠的父母，心里阵阵绞痛。”川越说，“但是后来我打定了主意，父母确实是战争的牺牲品，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

略，在中国及亚洲其它国家，不知有几亿人民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作为一个没有能制止这场战争的日本人，我应该做些什么？此刻，我应该留在中国，为日中友好铺路搭桥。不久，我接到父母病逝的讣告，我便愈发坚定了这一信念。”

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紧紧吸引着他的心。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感到巨大鼓舞，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就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繁忙而又充实。

没有想到，这以后的十几年里，意外地出现了他在中国的生涯中最不堪回首的几件事。首先，是五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争论和分裂，他经历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出现了“左”的倾向，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文革’一开始，我还是支持的。”川越坦诚地说，“可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发现，这不是革命，而是混乱，我感到自己也无法紧跟了。”

又一桩巨大的痛苦降临到他的头上。川越有一儿一女。儿子小亮，聪明、懂事，川越非常爱他，对他寄予很高的希望。1969年，小亮正在北大附中读书，学校里的混乱令川越很为儿子担忧，如果陷入红卫兵的派系斗争中，那便会在政治上走入迷途。于是，他把儿子送到一个汽车修理厂去劳动锻炼。谁知劳动中，一件意外的工伤事故，竟无情地夺去了小亮17岁的生命。年已半百的川越被这巨大的不幸击懵了。

工厂为小亮隆重召开追悼会。川越一家人强忍悲痛，刚强地出现在工人师傅们的面前。儿子身着工人师傅为他穿上的崭新工作服，遗体上覆盖着红旗，静静地躺在那里。川越含泪告别了儿子，拒绝了有关方面给予的抚恤金。儿子火化后，他将骨灰一分两半，一半存放在北京的公墓里，一半留在自己身边。

1970年夏，川越携带妻女，捧着儿子小亮的骨灰，自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其时，太平洋波涛汹涌，一股强烈的夏季风暴正在疯狂肆虐。

三

时隔26年，重新踏上故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的日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神奇的速度，恢复生机，并取得惊人的成果。对这种现象到底怎样看，还是个问题。川越看到当年许多同学、同事，如今正活跃在国内各领域。一些同学朋友纷纷给他介绍可以获取高薪的职位，他都一一婉拒，而是先在理论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担任编辑，以后又到三省堂担

任了日汉辞典的编辑工作，尽可能为中日友好多做工作。下班以后，他常常走上东京街头，宣传和销售中国发行的《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报刊杂志，热情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川越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

1975年，一份发自北京的邀请电送到川越手中。请他重返中国干什么？不知道。女儿正在读大学，不可能随他走。夫人要照顾女儿，也不可能随他走。然而一股遏止不住的激情在他心中鼓涨，他毅然只身二次重返中国。

到北京后，他才知道，等待着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翻译工作。他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

随后几年里，有三件令川越非常高兴的事情相继而至：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举被粉碎；1977年，《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完成，几乎与中文版出版发行的同时，日语、英语、俄语、法语、西语等外文版的《毛选》第五卷也出版发行；包括他在内的参与《毛选》第五卷翻译工作的外国专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国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隆重接见。春风吹拂，意气风发，川越好不开心！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他担当了以后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政府许多重要会议的文献翻译工作，还承担《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等中译日工作。川越将这看成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感到荣幸的同时，他也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邓小平文选》让他获益匪浅。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实变化，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他意识到，较之理论和书本，多看一些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更为重要。他获得机会深入到中国农村和城市，除了台湾、西藏、青海少数几个省区，中国其它广大地方，他的脚步几乎都踏遍了。明朗的现实帮他确立了一种明朗的信念。他意识到，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的巨大希望，首先根植于已经前进变化了的总体性社会土壤以及总体性社会情绪之中。全面来看，如今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有三点明显的不一样：第一，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不光中国人这样看，外国人也这样看；第二，全社会眼界极大开阔。过去遇事先问姓“社”姓“资”？现在对资本主义中的成功的经验，也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所用；第三，过去人们思想不解放，墨守陈规，现在人们开动了自已的思维机器，使社会呈现出巨大生机，

迸发出无穷的创造活力。川越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意义非同小可的变化。这以后，他写了一系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变化的文章，在日本许多报刊上发表，对日本人民了解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

多年来，川越以独特的眼光，一直视中国为一个担负着历史性课题的世界性“实验中心”。这个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是基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认识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想的科学考察之后而提出的。

川越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以全党命运为代价，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项大的实验。第一项实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一次成功的伟大实验，中国共产党付出巨大牺牲，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解放，树立起一个成功的范例。第二项实验是“文化大革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人民前进？“文革”的实验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共产党为此而受伤不轻，但它却告诉人们再不能重蹈这一覆辙。第三次实验，就是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成社会主义，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解决的、具有更广泛世界历史意义的课题。”川越颇含激情地阐述着他的见解，“进行这次实验，没有成功的先例，很不容易，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它不可能是直线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些曲折，甚至是风险。但唯其没有成功先例，才更显其重要；唯其曲折艰难，才更显其伟大。”

面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这项重要而伟大的“实验”，川越一方面倾注巨大热情，关注着它的每一步进展，为它取得的成绩击掌叫好；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位专家所具备的冷静和严谨的态度，审视研究着它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二者协调地统一于一身，于是他便有了一副深情而敏锐的眼光。

川越以颇具思辨意味的口气，率直地表达了他对改革开放前景的看法。“中国的这场实验是伟大的，但现在还不能说它是完全成功的。”他以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三步走的设想为根据，“现在第一步刚结束，才迈出第二步；第二步、第三步没走完，还不能断言彻底成功。”对于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他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担忧。“经济方面有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怎么担心，但精神方面的某些现象，却不能不让人忧虑。现在，和市场丰富的商品相比较，人们在精神上并不富裕，社会风气方面的某些

倒退,如“向钱看”(拜金主义),治安不好,还有单纯为捞钱而出现的商品质量上的众多问题,这些固然是前进中出现的问题,过分夸大强调不好,但坐视不理也不行,因为它们直接腐蚀着社会肌体,从而也影响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展。”

冷静地指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失去信心。1991年“七一”,川越出席了党的70周年纪念活动,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讲话,当他谈到关于反腐败的内容时,与会者报以最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了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有5千万党员、12亿人民,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力量面前是不难解决的。

川越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肯定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发表的重要谈话,对于坚

定全党、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道路的信心,非常重要。川越非常敬佩邓小平同志“敢于实验”的主张。他说:“邓小平同志号召:‘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尽管中国未来的道路可能有曲折,但有了明确的目标,又有坚定的信心,前景应该说是乐观的。”

最后,话题又转到延吉车站的10分钟,川越说:“对那10分钟,尽管我曾经有过懊丧,但回顾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我并不认为我没回日本是吃亏了。作为一个担负着历史性课题的世界性实验中心,中国如今在国际上的地位愈来愈突出重要。我为自己能亲身经历这一实验而高兴,我为自己能处在亲眼观察这个世界性实验中心的最佳位置而庆幸。”

(责任编辑:舒元璋)

(上接66页)

加拿大的两年学习中,罗北捷掌握了关于心脏内科检查、治疗方面的几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业务能力又上了一层楼。加拿大方面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他们对这些留学生的家庭背景等方面的情况都一清二楚。校方许以奖学金攻读学位、办正式身份证等优厚条件,希望罗北捷继续留下学习。北捷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妈妈,征求妈妈的意见,林月琴态度非常坚定:“一定要按组织规定的时间回国,不能有任何动摇。”她还说:“你是一个女孩子,还有家庭责任,不能只想你自己,再让别人为你做更多的牺牲。”这里指的是北捷的丈夫。

罗北捷如期回国了,仍在三〇四医院工作。因院里设备缺乏,北捷在国外学习的技术没有用武之地。不久,三〇四医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增添了超声心动图、心导管检查等先进医疗设备,并任命罗北捷为新成立的心内科主任。那时,她是该院十几个科室中最年轻的科主任,压力可谓不小。

“说得再多,不如干出样子来!”林月琴鼓励女儿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北捷带领全科同志,先后推出心导管检查、电生理检查等九项先进技术,把在国外学习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如今,心内科已成为全院最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科室之一,医疗水平在部队医院系统中属于上乘。

罗宁从小向往着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968年春,前来接兵的部队干部特别想带走这个好强争胜、泼辣能干的姑娘,罗宁所在的景山学校和区武装部也都批准了。但上头却来了“指示”:罗宁的母亲有问题,不能入伍。当时还不怎么懂事的罗宁痛苦极了,甚至埋怨起妈妈来。身处逆境的林月琴没有责怪女儿,她第一次给孩子们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郑重地告诉

孩子们:妈妈这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目前受到些委屈,但我永远坚信党,事情最终总会真相大白的。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罗宁到粤北山区当了兵,开始在一个野战医院炊事班当炊事员,后来当护理员、农村医疗队队员。她干得非常起劲,年年“五好”,不到18岁便入了党,还被评为广州军区学毛著积极分子。

罗宁虽身在医院,但对医学却兴趣不浓,她极富组织才能,不久被调到院政治处任青年干事。正当她一心在“仕途”奋斗时,部队准备推荐她上大学。在“知识无用论”影响颇广的年代,罗宁曾认为,只要苦干实干就能做好工作,上不上大学无所谓。为此,母女俩在信中几番争论。最后,女儿被妈妈说服了。她跨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

1985年,已过而立之年的罗宁,赴美国进修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专业。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优良的学习成绩。为她提供奖学金的香港实业家何东爵士,收到了华盛顿国际学院的一封信,信称:感谢你为我院送来了这样好的一个中国学生。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罗宁勇敢地“下海”了。从小造就的泼辣性格,多年磨炼出的领导才干,“与国际接轨”的知识结构,以及从妈妈的言传身教中继承的诸多优秀品质,使她在“游泳”中得心应手,成绩不凡。如今,罗宁担任北京凯星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被部下称为“罗总”,被同行们誉为“女强人”。这家公司经营有方,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度提高。员工们说:我们的罗总贡献最大。

回顾自己以及哥哥、姐妹们的成长道路,罗宁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兄弟姐妹都为有这样一位好妈妈感到幸福。”

日本有些人为什么总想为侵略战争翻案

● 曾北文 肖又新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即将迎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日本东京正在上映一部电影：《独立亚洲之光》。影片的基调是：三四十年代亚洲国家处于欧美的控制之下，“没有大东亚战争，就没有亚洲独立”。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描绘成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

在日本，这种论调不是自今日始，从那场战争结束以来，为侵略战争辩解、翻案活动一直没停止过，并且不断升级、日趋严重。

（一）

“审定”后的教科书， “侵略”改为“进出”

1946 年 9 月至 1947 年 1 月，日本文部省依照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陆续编写了中、小学日本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以批判态度对待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满足美国的“特别军需”，经济得到复兴，一些战争罪犯逐渐进入政治、经济领导层，掌握了大权。他们对战后教科书的写法甚为不满，对“侵略”一词提出异议。1951 年 7 月，文部省“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虽仍保留“侵略”一词，但高等学校《日本历史》课本，则把“侵略”改为“进出”。1955 年 2 月，文部省制定的中学《学习指导要领》，“侵略”一词完全被“进出”所代替，对其战争

“侵略”行为尽量“稀薄化”（即弱化、淡化）。

攻击南京大屠杀是“捏造” 出来的，扬言要“弄清南京 事件的真相”

1937 年 12 月 12 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京。之后，连续 6 个星期，大肆抢劫、焚烧、强奸妇女，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遇难者 30 余万人。史称“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国际法庭早有判决。日本政府也接受了这个判决。

进入 80 年代以后，日本逐渐成为军事大国，随之泛起了一股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浊流。

1984 年 6 月，柘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听了中国方面的宣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种以胜者审判败者的资料，不足为信。扬言：要‘弄清南京事件的真相’。”

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田中正明公布了《“南京屠杀”——松井石根战地日志》，（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首犯，定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以此作为屠杀虚构论的根据。为了对否定大屠杀有利，田中对松井“日志”任意删除、增添 700 余处。

1990 年 10 月，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妄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我不认为发生过



日本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

所谓的大屠杀，把没有说成有，这不是谎言吗？”

为了否定南京大屠杀，还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共犯结构论”，即由于南京人民进行抵抗，日军才进行屠杀，大屠杀是中、日双方造成的；南京大屠杀是“美国的战时宣传，作为日本人残忍的根据，藉为投下原子弹的理由。”

攻击东京审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扬言要“剥去东京审判的虚伪面目”

1945年7月，由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首脑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决定，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派一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简称“东庭”），在东京审判日本首要战争罪犯。

“东庭”1946年5月3日开庭，经过两年零7个月审判，1948年11月4日至12日宣判，判定25名首要战犯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判处绞刑。

对“东庭”的审判和判决，日本右翼势力是不甘心的，他们攻击这是战胜国对战败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强行“断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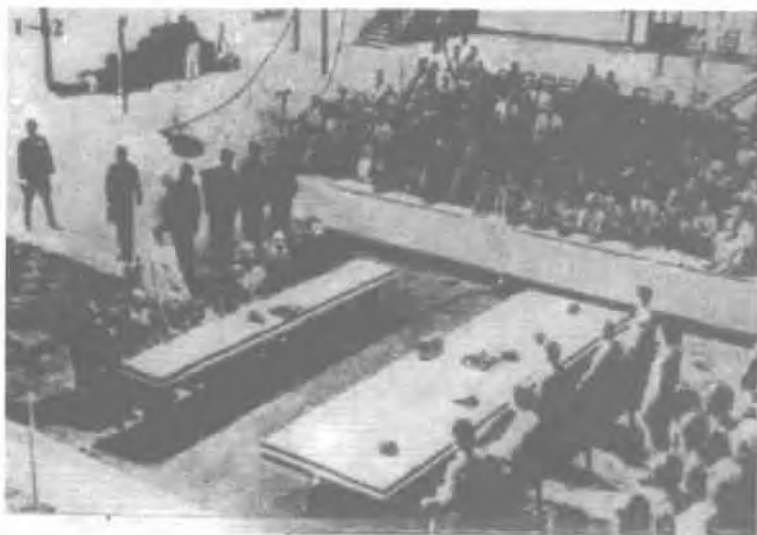
早在1960年，曾在“东庭”审判时为甲级战犯辩护的律师和东条英机等人的家属，在爱知县幡豆郡的三根山上建立了“殉国七志士之墓”；一些暴力团体在此为东条英机等举行祭祀；当地还搞了一个“殉国七志士赞容会”的组织。

前面讲到的田中正明，1982年发表《日本无罪论》的文章，攻击“东庭”判决是不公道的，只不过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胡说东条英机等人“根本无罪”。

日本《世界日报》刊登青山学院教授佐藤和男的题为《彻底批判东京审判》的文章。文中写道：“社会上出了不少清楚地说明东京审判违法性的文献，对东京审判的实际情况和本质拥有正确认识的人明显增多，这是可喜的现象。”作者还煽动说：“东京审判已经过了40多年，即使今天觉醒也并不晚。我期望日本有更多的国民关心这个问题，重新深入研究大东亚战争在世界史中的意义，确立不是被别国强制的真正的国民历史观。”

内阁总理和内阁大臣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以天皇的名义，把阵亡的军人称为“军神”，进行祭祀、参拜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靖国神社极力为宣扬军国主义、鼓吹“武士道”精神，欺骗人民为大日本帝国扩张政策效劳。



1945年9月7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受降书上签字，宣告了130万侵华日军的投降

靖国神社现在供奉“军神”240多万名。1978年，竟将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作为“殉难者”，“请”进了靖国神社。

1945年日本投降后，祭祀、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有所收敛。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活动再度复活，且愈演愈烈。

1975年，内阁首相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战后参拜的第一个首相。三木强调是“私人性质”的，他没有在签到簿上写上“内阁总理大臣”的官衔。

1978年，首相福田纠夫也以“私人名义”参拜，但他在签到簿上写上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官衔。

1982年，首相铃木幸一参拜时，没有说明“公”、“私”身分。

1985年，内阁首相中曾根康弘公然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分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军神”灵前献了花圈，并作了祈祷。这是战后第一次以首相身分的参拜。在中曾根带头下，这年有18名内阁成员和172名国会议员去参拜，是战后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右翼势力和旧军人格外嚣张。他们声称日本不存在甲级战犯，应阻止把大东亚战争作为侵略战争的“暴举”；有些旧军人，穿着昔日军装，背着“三八”枪，挂着军刀，讲述在侵华战争中的经历；还有人展开写着“武运长久”的旗子，上面写着“关东军第五独立守备队”；还有人抽出战刀，吹

响军号，在那里耀武扬威。在神社外，数十辆右翼团体的宣传车狂叫：“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

近10年来，每年都有内阁成员或以公职、或以私人身分去靖国神社参拜。

内阁大臣接二连三地淡化、美化侵略战争，为其辩解、翻案

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内阁成员接连不断地为侵略战争辩解、翻案。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丢掉乌纱帽。

1986年7月25日，中曾根康弘内阁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高校日本史教科书问题说：“难道持有异

议的家伙们在世界史中就没有干过类似的事情吗？”当受到韩国反驳时，藤尾蛮横地说：“没什么可道歉的。”他还说：“南京屠杀事件真相尚不明就说日本侵略的坏话，成何体统？”“东京审判是不对的”。日本政府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将藤尾免职，但他坚持这些言论的“合理性”。

1988年4月22日，竹下登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说：“为邓小平讲话所左右太可悲了。”中国政府严厉批驳，他仍坚持错误立场，并迭发谬论：“只有日本被打上侵略国家的烙印实在太遗憾了”；“我不认为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侵略战争包含着入侵掠夺土地，抢夺财产的意思，我认为，当时的日本没有这种意图。”他还说：“我并不认为，总是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奥野诚亮被迫辞职。

1994年5月3日，羽田孜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把那场战争（指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还说：“有一种错误的大东亚战争史观，有必要不站在单方面立场的讨论。”

1994年8月12日，村山富市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谈到太平洋战争时说：这场战争“不是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战后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发展，是“战争的结果”。“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

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还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民族强盛起来。”

美化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责任者——裕仁天皇,为其推卸罪责、歌功颂德

战前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有宣战、媾和的权力”。日本法律规定,除天皇外,任何人无权动用一兵一卒。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天皇成为象征的国家元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以至决定把侵略战争继续下去,天皇裕仁都起了重要作用。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本更迭了13名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更换了数十人,裕仁作为陆海军最高统帅,始终独揽最高统治权。因此,联合国将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列为战争的最高责任人。

日本投降后,一些势力包括裕仁自己,极力宣扬天皇是立宪君主,是“掌印机器”,对那场战争不仅没有责任,而且有功。

日本投降不久,裕仁说:对开战我仅是“裁可”了政府和军部意见一致的上奏;而结束战争是我自己的决断。1975年9月,裕仁出访美国前说:结束战争是我决定的。这是因为在内阁会议上看法不一致征求我的意见,我谈了看法,并按我的意见作出了决定。而战争开始因为有内阁的决定,我不能推翻内阁的决定。1981年4月,裕仁在其80寿辰前夕说:“或许是由于过分拘泥于以君主立宪政治为基础的思想,才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80年代,中曾根康弘任内阁首相时,大谈裕仁是立宪君主,是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掌印机器”,没有战争责任。中曾根说:天皇虽是和平主义者,但他过于拘泥立宪君主的立场,故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然而,他亲自下决心结束战争,却是破例的事情。1986年,为纪念裕仁在位60周年,日本开展大规模宣传活动,极力美化天皇,大肆渲染天皇是和平主义者,没有战争责任。1989年1月7日,裕仁去世时发表的《内阁总理大臣谨述》说:“大行天皇一心祈望世界和平与国民幸福,并时刻为此身体力行。对于那场并非出自本愿而发动的战争,他由于不忍看到国民再受战争之苦,遂不顾个人,毅然作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裕仁逝世后,对他的美化宣传达到了高潮。日本所有电视台连续两天停止一切商业广告节目,播放追悼、颂扬裕仁的内容。

否定侵略战争的最新动向: 极力反对国会通过“为战争道歉”的决议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即将到来,日本一些势力为侵略战争辩解、翻案的活动也日趋活跃。这种活动的集中反映是,反对国会通过“为战争道歉”的决议。

在一些团体和广大国民的要求下,日本国会准备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对过去的战争道歉。此事遭到一些势力的反对,掀起了一股为侵略战争辩解、翻案的新浪潮。这一势力的核心是“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该联盟有147人,占自民党国会议员的一半。该联盟会长是因发表美化、否定侵略战争言论被迫辞职的奥野诚亮。

这个联盟发表文告说:“战争问题已在外交上解决,如果重新在国会表决这项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给后世留下历史祸根的议案是不可容忍的。”奥野诚亮说:“日本没有必要为战争道歉。”自民党内阁部长武部勤说:“道歉决议毫无道理。”还有人威胁说:为那次战争道歉,将是基于歪曲的历史观,而出卖国家的不可饶恕的行为。以这个联盟为核心的右翼势力,今年2月21日举行“建国纪念日中央庆典”,大会认为:“政府对大东亚战争不断奉行道歉外交,并计划在国会通过反省、道歉和不战决议,作出大错特错的决定。”大会声称:“坚决阻止国会企图通过这样的决议。”在右翼势力反对下这件事如何发展,世人拭目以待。

(二)

为什么会出现美化、否定侵略战争的活动,其目的是什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不彻底,埋下了祸根

“东庭”虽由11国法官组成,但首席检察官为美国人,且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美国的麦克阿瑟被授予“对法庭判决有核准、减轻或改变但不予加重之全权。”“东庭”审判始终在美国控制之下。在“东庭”审判的两年半中,冷战开始,美苏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制裁改为扶植,以使其成为对抗苏联、中国的盟友。为此,“东庭”审判很不彻底,最高战争责任者裕仁没有被列为战

犯；70名甲级战犯仅28人受到审判，其余均由麦克阿瑟决定释放；曾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后任东条英机内阁工商部部长的岸信介，被释放后，1957年至1962年任首相；战犯佐藤荣作战时任铁道总局局长官，释放后任首相长达7年之久；甲级战犯笹川良一，是黑社会的头子，释放后竟成为“大慈善家”。美为了获取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从人体实验中得到的资料，竟将部队中将石井四郎及其以下人员豁免，不予起诉。已判刑的一些甲级战犯，判刑不久，即被释放。已释放的甲级战犯和未被起诉的数以千计的乙级、丙级战犯，很多人进入政界、经济界的领导层。

“皇国史观”复活，认为三四十年代那场战争是“正当防卫”

日本投降之前，长期存在“皇国史观”，并居统治地位。它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观。在其主导下，有一种“正当防卫论”。它认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政府收复主权、人民抵制日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活动，损害了日本在华利益，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由此才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这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战后“皇国史观”、“正当防卫论”受到批判，一度消失。50年代后期，开始复活。此后，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增强，这种荒谬的历史观再度蔓延、扩展，因而才出现了前面讲的种种谬论。

想做军事、政治大国， 争夺国际支配权

70年代，日本奠定了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一些人鼓吹亚洲应以日本为表率，并在其领导下，形成亚洲经济体。这使人联想到战前的“大东亚共荣圈”。两者都以“共荣”之名，行“扩张”之实。不同的只是军事扩张与经济扩张而已。极力美化、否定侵略战争的石原慎太郎一语道出了天机：“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无需军事行动，因为如果日本的亚洲邻国抵制‘日本’，很简单的，东京停止对他们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那就使他们体验到他们的抵制的后果。”

80年代以来，日本一些势力，积极活动，一心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其《新的世界秩序和日本》一书中，公然提出：苏、中、英、法四国退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日本、德国、美国代之，由这个三极体制建立世界新秩序。日本为什么争当常任理事国？朝鲜《今日朝鲜》1995年1月号载文指出：“一言蔽之，他们是想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对国际问题的解决予以政治军事影响，争夺世界支配权。”这既是日本一些势力美化、否定侵略战争的原因，也是他们进行这种活动的目的。

(三)

日本一些势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是不得人心的，受到了日本国内广大正直人士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

日本国内的谴责和反对

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分参拜靖国神社时，各界人士100多人在神社附近举行抗议，并受到5个在野党和13个民间团体的指责。很多国民在神社附近高喊：“反对犯法的正式参拜！”“中曾根滚蛋！”日本《每日新闻》发表述评指出：很多日本国民“担心‘正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城郊活埋被抓到的中国民众

式参拜’会成为复活军事国家的前兆。”1994年，内阁成员参拜时，日本和平遗族全国联络会代表在集会上说：内阁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粗暴地践踏了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和亚洲人民的感情，同时也是对侵略战争的美化。该会所属15个团体的代表在神社周围游行，高呼“反对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反对美化侵略战争！”

美化裕仁，为他推卸罪责，也受到国民的指责和反对。有人投书报刊，提出异议；有人采取某种行动，对此表示不满；日本共产党对举行裕仁在位60周年庆祝活动，向政府提出批评和质询，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被推荐为长崎市长候选人的本岛，明确提出：“我认为天皇是负有战争责任的”。

那场战争的1000余名战犯，经新中国改造释放回国后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站在反省的立场上，通过演讲会、办展览、出版书刊、制作电视片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向中国人民认罪、谢罪。他们对篡改教科书、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等，多次集会抗议、游行示威。

最近，日本出现了正确评价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用的动向。有人提出：应首先记住是日本的侵略挑起了这场战争。女历史学家泽地诚说：“3月10日（东京遭受大轰炸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只有这一天有人死于轰炸。早在东京遭受轰炸前，日本生产的炸弹就被投向了中国的城市。”她指出：“如果我们日本人不正视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么就等于对所有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人犯下了罪行。”

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谴责和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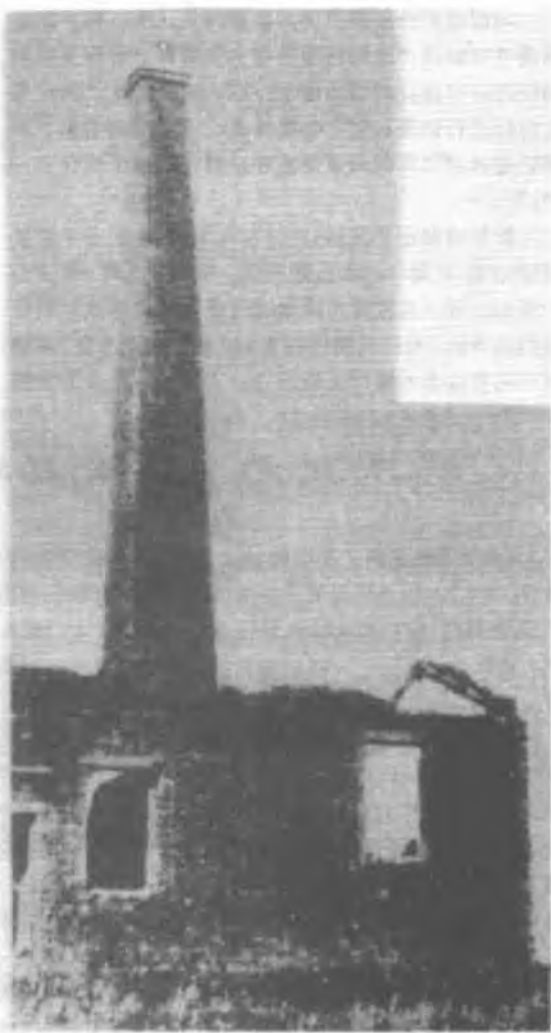
日本内阁成员每次发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我国外交部都给予严厉批驳。对永野茂门的批驳说：“在中日战争结束近50年后的今天，竟然有日本内阁成员篡改历史，否认事实，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辩解，中国感到震惊和愤慨。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遭受了深重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早有定论。”

永野茂门的谬论，在台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发言人简汉生说：“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历史的明确记载，历历在目。南京大屠杀一连三个月，杀死30多万中国同胞，这是受难同胞记忆犹深，难以忘怀的创痛。……永野茂门除了应向世人道歉外，必须为此不当发言负起政治及道义责任。”

香港旅日学者杨虎樵针对田中正明攻击南京市建

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香港《百姓》杂志发表题为《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驳斥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的专文，对田中提出的问题一一批驳。

1994年6月，日本天皇明仁访问美国。在其所到之处，旅美华人集会抗议，游行示威，要求赔偿、道歉。由华人在美出版的《日本侵华研究》杂志，出版了《全美华人向日皇抗议索赔示威专辑》，指出天皇裕仁是“日本的真正军事领袖”，“应是第一号战犯”，批驳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复活军国主义的谬论，还收录了《全美华人向日皇抗议索赔公开信》。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在《纪念抗战50周年——为日皇明仁访美而作》一文中说：“日本人到今天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



日本“731部队”焚烧被害者尸体的炼人炉

想改写历史,还说谎话告诉世人,他们没有侵犯中国,只是去解放中国人,不要再作西方白人殖民地的臣民。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亚洲其它国家的谴责和反对

针对日本一些人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朝鲜《劳动新闻》载文指出:在日本当局,至今还有人在美化侵略战争,认为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没有错”。这说明:“军国主义思想还存在于日本某些当权者的头脑中。”对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朝鲜舆论界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今年3月27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指出:日本必须正式承认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造成的损害并表示道歉,在彻底清算历史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出发点。

韩国政府外务部负责人发表评论认为:樱井新讲话是时代错误,“这种行为是给为发展韩日合作关系的两国政府和国民的努力泼了冷水,深为遗憾。”舆论界也纷纷进行谴责。文化电视台说:“他(指樱井新)的讲话是和羽田内阁时永野法相歪曲侵略战争的狂言一样。”

新加坡舆论界指出: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今年迎接战争结束50周年,除了进一步公开战争史料,承认历史事实之外,也应更积极地通过历史教育等途经教育他们的国民,而不是使他们无知、毫无反省之意。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严正指出:“只要年轻一代没有掌握

和认识过去,认识过去的事实和教训,日本将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1994年6月,日本天皇明仁访美时,在东亚裔人集会、游行,要求日本向亚洲国家赔偿、道歉。为了永远记住日本的侵略罪行,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建立了死难者纪念碑。

针对日本一些人否定和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世界公正人士严肃指出:“东庭”审判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公道性不容置疑,它不仅是对发动侵略战争罪犯的审判,而且也是国际正义对邪恶势力的审判。

永远不能忘记

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篡改。历史是一面镜子,要以史为鉴。我们希望日本正确对待那段历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才有良好的政治基础,两国人民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李鹏总理今年3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严正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带来的空前浩劫永远不能忘记。绝不能让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这是我国政府的庄严声明,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坚定誓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和结论。

(责任编辑:赵友慈)

欢迎为《炎黄春秋》杂志踊跃投稿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主办,是历史纪实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本刊坚持以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讴歌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讴歌改革开放大潮,宣扬海外华人爱国奉献精神为主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讲实话,讲真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任意褒贬,不容无中生有地虚构。

本刊创刊近四年来,以其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来信来稿不断增多,许多佳作被国内外数十家报刊转载。为了更好地办好刊物,提高质量,拓宽刊物内容,欢迎学者、作家及热爱本刊的作者和读者,根据刊物的宗旨、内容和风格,踊跃投稿。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要深入采访,反复核实,掌握可靠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根据有关资料加以整理,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二、文字力求简明、通畅。来稿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欢迎二三千字的短稿。最好配有清晰的图片(彩色、黑白均可),并写清说明。

三、文字要规范,不要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年月、数字、引文、古文、生僻字、外文等,一定要写清楚。

四、请自留底稿。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退。如必须退回,请予注明。

五、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如发现其它报刊已经采用,恕本刊不再付稿酬。

在北京东城灯市口北面有一条东厂胡同，这条如今看似平常的胡同，当年却曾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575年前，一个代表着极端专制皇权的怪胎就出现在这里。

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

● 商 传

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岁末，正值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前夕，京城的营建工程已近尾声，随着那些堂而皇之的宫殿官署相继落成，皇城的东安门迤北建起了一座诡秘莫测的衙署，这便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机构东厂宦官衙门。

说来也怪，那个滥杀功臣、专制独裁的明太祖朱元璋，并没有重用宦官。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他的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遵循了不用内臣的祖制，宦官们都去投附了起兵夺位的明成祖。明初这一政治变迁，使宦官命运得到转机。可以想见，当一群执役宫中的皇帝家奴，突然步入政治舞台，并以一种复杂心态和特殊身份充当起皇权专制鹰犬时，那种忠诚、热情和能量，实在是足以使天下瞠目了。

一座活地狱

永乐迁都后建立的东厂，与明朝相始终，存在了224年。在明朝人心中，这座阴森的衙署正如一座活地狱。

东厂有一座朝南的大门，大门终年紧闭（西南另有一门出入），更增加了一种诡秘恐怖气氛。大门内为正厅，厅左另有一小厅，里面供奉有岳飞画像。大厅后有一砖影壁。壁上雕有狻猊等兽和狄仁杰断虎的故事。厅西有一祠堂，里面供奉着历代掌东厂宦官的职名牌位。祠前有石坊，坊额上刻有“万古流芳”四字。稍南是座刑狱，专门用来收系重犯。明神宗万历初年，司礼监太监冯保提督东厂，另建一处东厂衙门，称作内署，而以原建东厂为外署。内署中立有一块横匾，写着“朝廷心腹”四字。四个字道出了东厂特务们的得意之色。

按照明朝制度规定，东厂中设有提督太监一人，由有权势的太监担任。下设掌贴、领班、司房四十余人，十二伙管事，按子丑寅卯排列，各领挡头办事，共计百余名，其下有番役千余人。

东厂的关防（公章）上刻着“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比之其他官署多了“钦差”的头衔。既

然有皇帝钦差的身份，一切所为均代表着皇帝，自是不会有任何人胆敢相违忤了。此外又刻制密封牙章一枚，上刻“东厂密封”四字，专门用来密封上奏的情报。

既然豢养了如此众多的大小特务，必然要用他们去刺探情报，被刺探情报的对象，则包括了除皇帝之外的所有人。搜罗情报称作“打事件”。打来的事件内容涉及甚广，大到命案，小到雷击、火灾，乃至柴米油盐价格。可以说，天下官吏军民一切行止言论尽在其侦伺之中。

倘若都是这样打来的事件，虽有弊误，终究是对下情的了解，即使官民受制于特务，也是皇权专制政体所致，怨不得别人。但事实却远非如此，那些东厂的番役们往往并不是自己去打事件，而是花钱从地痞流氓那里去买事悠扬。地痞流氓为了钱财，何事而不可为？挟忿诬告，诱人为奸，无中生有，结果冤案屡出，官民深受其害。

设立东厂特务机构，其目的原本为缉查谋反、大逆及所谓“奸党”，也即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正因为如此，在明代不管是独夫暴君也好，不论是仁德明主也罢，自从东厂设置以后，再也没有谁想过将其废除。只不过有些皇帝认为这事不大光彩而稍加遮掩和限制，倘若遇到暴虐庸蔽之君，特务的活动便会在放纵中更加无所顾忌，这时的东厂于是便成为专权太监铲除异己的工具，显示淫威的屠场。

自从北京东厂建立到它伴随着明朝一起灭亡的224年中，已无法知道有多少无辜者成了这人间地狱中的冤魂，然而历史却清楚地告诉后人，真正的大奸大恶往往正是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厂臣。

两个同胞怪胎

北京东厂设置五十多年以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宫禁中发生一起秘案，时人传为“妖狐夜出”或者“尼妖入宫”。其实事情是由一个名叫李子龙的术士引起的。

李子龙以通符咒与宫中太监鲍石、韦塞交往，出入宫禁。事发后明宪宗甚为恼火，案件直接牵扯到宫中太监，明宪宗对东厂也感到有那么一点不大放心了。御马监太监汪直，为人便黠，被宪宗看中，于是命他去调查宫内宫外隐事。史书中说：汪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傅继麟《明书·汪直传》）很有点专业特务的味道，并由此备受宪宗信任。于是次年正月，便正式于灵济宫前另设一厂，号曰西厂，选锦衣官校中善刺者百余人置厂中，统由汪直提督。

这样一来便有了东、西两厂。不过东厂因有失恩宠，西厂则气焰大盛，“分命诸校，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苍语，悉探以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汪直用事》）不久，西厂所领缇骑便倍于东厂，于是“自京师及天下，徬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明史·刑法志》）。

制造冤狱，最易者莫过于诬指“妖言”，即所谓思想言论之罪，无须有刑事案件之凭据，即使有所凭据，亦甚易于制造。史称：“时西厂旗校以捕妖言图官赏，多为腰书诱愚民而后捕之，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夏燮《明通鉴》卷三三）

有西厂校尉诬指宁晋（今属河北）人王凤与警者康文秀“妖书”，株连罢闲家居的通判曹鼎、知县薛方，发卒围其家，拷掠诬伏论死。后因曹、薛二家人赴京申冤，下法司覆验，始辨其诬。又有怀来（今属河北）“妖人”赵大一狱，牵连收系甚众，后经按问，亦为冤狱。这两桩案子大约因牵连到上层人士，有人帮忙讲话，总算化险为夷，却也是百死而一生。倘若有一点把柄落到西厂特务手中，便绝无脱祸之幸。左通政方贤掌管太医院事，汪直手下爪牙韦瑛因索药未得，怀恨在心，命人到方贤家中搜检，得片脑沈香及卸墨、龙凤瓷器等，遂以违法谪戍辽东。短短几个月间，便有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御史黄本等人先后获罪。

西厂的恣意行事使士大夫们深感不安，内阁大学士商辂于是带头上疏请革西厂，开列了汪直十二条罪状，指出其“得专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之所为，并进而称“自直用事，人心疑畏，士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业，世民不安于业。”这很招致了宪宗的不满，他甚至提出要追究主奏者。但是商辂等人毫不妥协的慷慨态度，最终迫使宪宗让步，于是在西厂设置五个月，便传旨革罢了。这当然不是明宪宗的本意，暂归御马监的汪直也并未失去对东厂的控制。一个月以后，当这个弼马瘟式的特务头子重振旗鼓杀将回来的时候，

便几乎无人可挡了。率九卿支持商辂的项忠被罢官，大学士商辂也只好自行请退，从此“士大夫益俛首事直，无敢与抗者。”（夏燮《明通鉴》卷三三）由太监尚铭提督的东厂，也俯首于汪直，这时的天下已是西厂的天下。

到是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敢于出来谏，他一忽儿扮作醉酒者谩骂，人言“驾至”，仍谩骂如故，言“汪太监至”始避走，口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一忽儿又扮作汪直模样，手持两把大钺。人问之，则称两钺者“王越、陈钺也。”王、陈二人是依附于汪直的两个大臣。阿丑的作戏也堪称是胆大妄为之举了。不过这时的汪直，恩宠已衰，不久，又发生与东厂太监尚铭的冲突。一次宫中失窃，西厂未及查明而东厂已破其案，宪宗于是多有赏赉。汪直怒尚铭自居其功，尚铭恐其陷害，先发制人，进言汪直不法诸事，结果汪直被调南京，西厂亦被废罢。士大夫们终究办不成这般大事，还是由太监们办成了。不过“西厂废，尚铭遂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史·汪直传》）人们照旧在特务政治下生活着。

当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将革西厂之时，大学士万安曾上疏：“东厂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厂事出权宜，当革。”（夏燮《明通鉴》卷三四）既称当革，又以权宜为设西厂开脱，加之称善东厂，万安可谓老奸巨滑了。果然，二十余年后，这所谓的权宜之计又为新的权奸们所重拾。

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太监刘瑾以曾侍奉武宗于东宫得宠，被命掌司礼监。一个昏庸荒政的武宗皇帝，一个野心勃勃的专权太监，中国的特务政治又被他们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史称：“正德元年杀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皆刘瑾党也。”（《明史·刑法志》）这是西厂的再次设立。这一次设立西厂与前次有所不同。汪直的设立西厂原为追查“妖人”入宫一案，而刘瑾之设西厂，则专为强化特务政治，控制官吏军民。弘治中的原东厂太监王岳，素称善直，对外廷诸正臣多有所维护，他被杀的罪名，便是外结阉臣。

这一次设立的西厂与东厂成为两个并行的特务机构，均在刘瑾控制之下，两厂争相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乃至“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有司闻风，密行贿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天下皆重足立。”（《明史·刑法志》）特务横行，官民畏惧，整个社会都陷入到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之中。

然而还不仅如此，刘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

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称之为内行厂。东西两厂又都在内行厂伺察之中，政治控制达到了极点，内行厂则成为推行特务政治的核心。

大凡要推行极端政治者，必然要倚仗于特务控制。刘瑾不仅要掌握司礼监，而且要掌握内行厂，正是出于这一道理。尽管有些史家认为刘瑾在政治上带有一定的改革成份，但是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出于一种变态心理对士大夫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摧残，则开创了有明一代最恶劣的先例。

对于士大夫们的摧折是从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的去职开始的。此后又有户部尚书韩文的革罢，给事中吕羽中、御史薄彦微等20多人被杖责。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贖。如此种种，在当时可谓家常便饭。杖责之外，又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高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均因小过被枷，死而复甦，又予滴戍，其余被枷杖死者不计其数。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处死。问题不在于对小过微罪的过重处置，其本质在于排除异己。特务的猖獗，酷刑的威胁，将士大夫们那一点清傲之气摧折殆尽了，一些无耻的官吏甘心委身于阉人门下而为阉党。只有像御史蒋钦那样几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三次上疏列数刘瑾之罪，三次被杖，誓不肯与贼并生，给人留下些许正义的光亮。

这实在是漆黑如墨的世道。如果不是安化王朱寔鐸造反，并檄数瑾罪，如果不是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奉旨讨伐；如果不是杨一清利用这次机会劝说张永将刘瑾搞掉的话，真不知明代的政治会是个什么样子。人们也许只能在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管制下去生活了。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以谋逆伏诛，阉党被罪，西厂、内行厂革罢。然而当人们弹冠相庆之时，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们又在以缉事恣意罗织，“厂卫之称由此著也。”（《明史·刑法志》）

沆瀣一气的厂与卫

明代的特务机构中，厂与卫是密不可分的，故人常称之为厂卫。厂即东厂，虽然亦指西厂、内行厂，但它们设置时间较短，不及东厂之常设。卫即锦衣卫。锦衣卫本是个军事组织，属于明朝宿卫亲军，直领于皇帝，初设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锦衣卫下设有镇抚司，其职能原掌本卫刑狱，明太祖欲以酷法诏天下，锦衣卫镇抚司狱便不仅用以本卫，而成为明太祖法外用刑的工具，又称之为诏狱。五年以后，迫于社会舆论压

力，于是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下令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内外狱尽归法司，罢锦衣卫狱。尽管明太祖在位的31年中政治生活一直处于严猛专制之下，但锦衣卫狱这一军事化的特务机构终究废罢了。锦衣卫狱的复设是在成祖永乐年间，明成祖不仅恢复了锦衣卫狱，而且将原来的镇抚司分为南北二司，以此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这一军事特务机构走向了制度化，待到东厂设立后，厂卫便成为他推行特务政治的左膀右臂。

当时掌锦衣卫的是纪纲，从纪纲以后，很出了几个著名的锦衣卫特务头子，如英宗时的逯杲、门达，武宗时的钱宁，直到天启的田尔耕、许显纯，都是杀人眨眼的刽子手。

厂卫并行之初，锦衣卫的权势更盛于东厂，厂权的发展，初起于汪直之设西厂，再起于刘瑾复设西厂并置内行厂。刘瑾败后，西厂、内行厂俱革，而东厂由太监张锐掌领，与锦衣卫指挥使钱宁争相倾轧，这成为厂卫制度发展的关键。特务制度与所有制度一样，也就这样慢慢成熟起来。对于官吏百姓来说，它们的成熟，实在是人们的灾难。

厂卫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特务机构，但其关键乃是密不可分的，东厂除去太监外，掌刑千户、理刑百户、档头、番子，均由锦衣卫选充。因此史书中说：“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桎梏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明史·刑法志》）

所谓移镇抚再鞫，便是送入诏狱。

镇抚司狱，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嗅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能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得于堂下遥相望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镇抚司刑具》）

送镇抚司拷问必用刑一套，凡为具十八种，无不试之。“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按、曰夹棍。五毒备具，呼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明史·刑法志》）然而这还不是最酷之刑，“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傅维麟《明书·刑法志》）其实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否能算最酷者。比如有一种枷刑，起初枷重百斤，后渐增至百五十斤，到神宗万历年间又增至三百斤，且只准站立，秒为立枷，规定枷期二月，但几乎没有能到期者。据说受此刑而求生也

有办法，如“夜间雇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或者“每日啖一生猫，亦可榆生，未知果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立枷》）明朝统治者的心思都不得不用到这方面去了，实在是可悲可叹。据说在狱中治伤病的偏方还有一种叫作“轮回酒”，其实就是人尿，“有人病者，时饮一瓩，以酒涤口，久之有效。”（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

对于这种特务的残酷刑讯，人们似乎已渐为理所当然，于是本不符合法律的东西，居然成了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直到明朝末年，有位名叫刘宗周的儒臣才提出这乃是“人主私刑。”

明朝人只能用皮肉去承受厂卫的酷虐，或者用皮肉去同厂卫的酷虐抗争。世宗嘉靖年间，因弹劾严嵩而入诏狱的杨继盛（叔山）便是一个抗争者。他入狱后，有人送蛇胆给他，他留下了“叔山自有胆，何蛇蛇为”的壮语。史书中说他，“及入狱，创甚，夜半而苏，碎瓷盘，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明史·杨继盛传》）这血肉的抗争在士大夫们看来是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了，但却丝毫不会改变专制者的酷虐。在厂卫的剑子手们看来，酷刑便是一切，须知酷刑与藐视法律，才是推行特务统治的基础。

“八千女鬼乱朝纲”

明熹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的时候，明朝便走到了“至末造而极”的尽头。于是老百姓们将那个魏字拆开，写作“八千女鬼”，并且传出了“八千女鬼乱朝纲”的民谣。中国人编造政治民谣的本领堪称登峰造极，那概括得准确微妙，有时往往又如同谶语——他们在政治上确已过于的成熟了。

魏忠贤也很成熟，尽管他目不识丁，但他却深谙政治斗争之术。他无须再去费气力设置什么西厂、内行厂，而只是牢牢抓住东厂，并把锦衣卫作为东厂的爪牙，便控制了朝廷，控制了全国。特务机构作为对付政敌的武器，发挥出了它全部的能量。

首先是开列出计划周密的工作安排和黑名单，那个颇有些影响的《东林点将录》，将其政敌东林党人按照《水浒传》中晁盖和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依绰号列史，然后开始了打击与迫害。

这大概是中国士大夫们最为悲惨的时刻了。几年之间，刚烈烈士被刑戮殆尽。有人对此作有概述：

初，魏忠贤乱政，首攫祸杖死者，万燝也。后因汪文言狱逮死者六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

周朝瑞、顾大章。后因李实诬奏案逮死者七人：则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并先逮周宗建、缪昌期也。以吏部尚书遭戍遇赦，为逆党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赵南星，以争挺击首功为逆党论劾逮死狱中者王之寀各有传，共十六人，他如刘铎之以诗语讥讪弃市，夏之令以阻挠毛帅逮死，苏继欧、西乾学、吴裕中、张汶、吴怀贤，或缢死、怖死、仰药死、杖死，皆以逆珰死者也。（吴应箕《喜朝忠节死臣列传》）

杨涟等人是被以“贿贪”入诏狱的，因为曾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祸尤惨。死的时候“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谷应奉《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左光斗等亦受酷刑：“比时愧愧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桎则受桎，弛镣则受夹，弛桎与夹，则仍戴桎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注绋。”周顺昌死后“四体五官幸不全坏，须面似有物压之者，鼻之为平，已不可认，惟须与手足为血肉不能变处，则顾选（周的仆人）犹能识之。”（《北行日谱》）周宗建，“珰命钉以铁钉，不死。复令着锦衣而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婉转两日而死。”（计六奇《明季北略》）

这血淋淋的惨状，居然被目击者们所传录，使我们有幸看到特务们的手段，这已经不仅仅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而且是要从精神意志上消灭政敌，并从中去体会酷虐专制的满足。如此种种，给当时的社会蒙上了一层恐怖色彩。那是个群丑横行的时代，“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輶烂。……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甚至剥皮、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有四个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噤不敢出声。骂声未止，有番役将四人捕至魏忠贤那里，当即将骂者磔死，而赏另三人金，三人者愧丧不也动。如果这不是一次偶然之遇的话，魏忠贤的特务可谓是无孔不入了。

人皆噤不敢言，却并非不敢想，不敢动。利用特务网实现的统治，一旦遇到政治上的翻覆，那土崩之势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当崇祯皇帝登极后铲除魏忠贤及其阉党时，一定有不少士大夫们感到了政治的曙光，然而结果却绝非如此。至末造而极，特务政治伴随着明朝，或者说明朝伴随着特务政治走到了尽头。东厂最为炫耀的时刻，竟然也就是它的末日，这是多么辩证而又发人深思的事实。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慧眼识拔梁启超的

礼部尚书李端棻

● 万登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戊戌变法时的核心分子。他后来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这么一个名声赫赫的人物，可说世人皆知。然而，对于慧眼识才，大力提拔他的礼部尚书李端棻，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李端棻，贵州省贵阳市人，字苾园，生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年齿尚幼，其父病逝，赖寡母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寒窗苦读，得舅父何中宪多方教导。年稍长，叔父李朝仪喜其聪明过人，待人接物大方端庄，更悉心传授为人之道。

李端棻读书，专心致志，学业优异，颇能融会贯通，弱冠之年即补为博士弟子员，而立之年考取进士，供职于翰林院。李端棻从政后，任考官和学政之职几近三十年，是他宦途中最重要的时期，占去了他人生的黄金时间。他在任期间，拟订多种法案，奖励家贫之士，受到莘莘学子们爱戴。他公平正直，多次拒绝贿赂。而他慧眼识才，对确有真才实学的名士，总能将他们选拔上来。

慧眼识真才选拔梁启超

李端棻典试广东的时候，恰值新会县儒生梁启超参加该科举人考试。端棻见其少年倜傥，俊秀儒雅，风度翩翩，在心里留下了好印象。及至阅到他的文章，更觉其文熔经铸史，气势沛然，言辞犀利，思想见地有人所未见处，遂将他点为第八名举人。端棻觉得梁的观点，与自己的心思颇有默契，所以在考试结束后，多次约见启超。

那时的梁启超，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十余岁的青年，还不习惯于与大人物打交道，因此在恩师兼考官李端棻面前有些胆怯。李端棻看他温文尔雅，谦恭有

礼，更加喜欢，鼓励启超不要拘束常礼，应与自己如朋友相持，畅所欲言。启超见端棻如此礼贤下士，和蔼可亲，也就不再拘束，大胆地将自己的西学思想和盘托出。二人对改良政治、兴办洋务，有许多共识，侃侃而谈，娓娓而论，相聚甚欢。

几经晤谈，端棻更加赏识梁启超，认定他才华超群，必成大器，慨而作媒，将自己堂妹李蕙仙相许配，二人结为姻亲。

后来，李端棻升任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工部侍郎等，始终大力提倡办洋务、兴西学，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知识。

对发展现代教育功不可没

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率领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合“公车上书”，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希望朝廷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维新。李端棻对他们的主张，很表赞同，阴为呼应。

有感于甲午之战的屈辱，李端棻认为亟需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才能富国强兵，以雪国耻。因此于光绪二十二年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主张设立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选派留学生。在这个奏折中，他阐述道：“时或多艰，需才孔亟”，“人才之多寡，关系国家之强弱”；认为照奏折中所说施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奋起直追西方发达国家，“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致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雪？”

光绪皇帝阅后，认为这个折子很有见地，指出了中国落后的症结，遂下令施行。于是，办起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及各省学堂、县学堂等大批大、中、小学堂，加开了外语、算学、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外国史等课程，

开近代科学教育风气之先，兴学堂、废科举蔚然成风。今天论及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李端棻实在功不可没。

保荐革新人物 积极支持变法

朝中大臣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也为保全自身的福祿富贵，顽固守旧，极力阻挠革新。光绪皇帝为变法维新，感到办事乏人，多次降旨求贤。大臣们只想自保，哪里愿意引荐别人？唯李端棻胸襟开阔，竭力向皇帝保荐了创建“自立军”的唐才常，创办时务学堂、民国时期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等十六位俊彦之士。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多次上书，极言变法维新，但他们毫无政治地位，人微言轻，丝毫不起作用。李端棻在皇帝召见时，密为保荐康、梁及谭嗣同等人。光绪召见他们后，认为李端棻保举不差，所言属实。但因为“公车上书”的事，慈禧太后恨透了康、梁，光绪不敢公开授他们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梁联系变法事宜。因为引荐康、梁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少为人知。

光绪帝锐意变法革新，但大员中几乎无人赞成，唯李端棻鼎力相助，因此龙颜大悦，破格将他从侍郎直接提升为礼部尚书，掌管全国文教事务，襄赞维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大臣之中，大多持观望态度，毫不热心，独李端棻不顾可能会招来严重后果，毅然上奏《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子。对北，梁启超感叹道：“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唯李端棻一人而已。”

九月，由于袁世凯出卖机密，投靠慈禧，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慈禧于二十一日公开出面训政。十月四日，慈禧太后向内閣下达懿旨：“李端棻擅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令据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戒。”

发配新疆 忧愤难抑

李端棻年事已高，今被发配新疆，更兼心中因变法失败而惨痛，所以染病在身，一到甘州（今甘肃张掖）就病倒了，只好滞留于那里。

李端棻这时的心境，忧愤难抑，写下了不少具有思想性和艺术价值的佳作。他病倒在甘州，同行的弟弟们



李端棻所书五言联

都焦急万分，他真正忧心的是国家大事，对自己的生老病死倒不怎么忧虑，反而乐观豁达，《寓甘州示诸弟》可为之证：

传说边城极阻艰，轻裘忽至玉门关。
远行经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闲。
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
寄言群季休惆怅，得酒依然便解颜。

端棻离京之后不久，京城里的亲人们忽然听说慈禧派人追去，半路赐帛，已将他缢死。亲人们痛哭之后，设灵台遥祭，以表哀思。寓居东洋的梁启超也听说了李端棻被赐死的消息，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也没灵祭祀，洒泪恸哭。李端棻得知，心中感动，作《和文信国乱诗》，暗为自己侥幸活命而惭愧：

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某市哭忠贞。
幸予被逮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

李端棻抚今追昔，哀变法之短寿，恶宦海之污浊，叹朝纲之不振，痛国家前途黯淡，由屈原之不幸联想到自身遭遇，乘着酒兴，引吭而歌，长歌当哭，一首《醉余吟》，正是一个老人万分悲伤的内心独白：

醉后仰天笑，我歌呼呜呜！
我劝世人休抑郁，我歌非歌聊代哭。
世人皆醉无独醒，迁我三间之大夫。

不然炯炯撑双目，安得同流而合污。

出任山长之职 传播先进思想

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才遇大赦，回到家乡。翌年，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聘，担任经世学堂山长（相当于校长）。他深感肩上负担甚重，恐自己已趋暮年难以担任山长之职，怕贻误了故乡子弟，于是，兢兢业业，并决心在教学中大力推行新政。《应经世学堂聘》一诗云：

贴括词章谈此生，敢庸重寄领群英。
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岂是名。
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
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

除了主持学堂事务外，李端棻不顾年迈体弱，亲自给学生们讲解《卢梭论》、《培根论》及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课后又在自己家里召集一些学生，向他们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观点，竭力传播西方民权、自由思想。这种民主意识在他的诗里也有表现，他还从当时的黑暗现实联系几千年的独裁政治统治对国民精神的桎梏，以及造成的国家落后的悲惨状况，发出了由衷希望实现民主社会的呼吁：

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
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
民为民安方有事，臣有佐治始宣流。
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
另一首表明了他鲜明的政治思想：
君不堪尊民不卑，千年压制少人知。
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互相推。
峽经力士终能剖，山有愚公定可移。
缅甸宣尼垂至教，当仁原不让于师。

由此，李端棻愤而想到朝中帝党、后党之争，帝党失利，带来戊戌变法全盘皆输，不由得对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党祸”愤慨万分：

凡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
狭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
戮辱道囚无漏网，恶唐宋明有前车。
汉阳路口京都市，云散风凄日又斜。

从这些诗看来，李端棻已从当时政治的黑暗中看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希望：走民主的道路。他极端蔑视皇权，民权意识相当浓郁。

年逾古稀 抖擞余威

不到一年时间，李端棻辞了山长之职，离开了经世学堂。不久迁家至长春巷新居。是处环境幽美，景色宜人，虽屋内陈设尚欠尽善尽美，但他恬然自安，已感到很满足了。而且，他并不象一般人们那样乔迁时必须择个好日子，而是就事而定，随意迁居。在《寄居后院写赠陈懋枢大兄二首》诗里表现了他这种淡泊的心境、乔迁新居的喜悦以及不迷信的思想：

其一

前院严齐后院深，深深暑气不能侵。
名花纵少各矜艳，新竹初栽前有荫。
卷箔轩窗朝送爽，隔墙钟磬夜闻声。
一丘一壑诚多事，城市山林只在心。

其二

速将家具彻夜移，未得身闲力已疲。
教婢安排床来几，呼童检点画书棋。
居无尽美方称善，特岂求全但适宜。
兆吉兆凶都不信，安眠作止恒于斯。

光绪三十一年，在全国各地纷纷刮起的收回主权运动中，李端棻主持成立了“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担任总经理，他主张“利器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致力于实业救国。那个时候他的商品经济意识得到了强化。其表弟何氏昆仲准备经商，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认为读书无法致富，必须通变达权，经商务实，要想振兴国家经济，必须首先解除个人的贫穷。《赠何季纲表弟》一诗云：

书田难得兆丰年，通变聊将子母权。
霸主事功唯足食，圣门华殖亦称贤。
治生岂曰非儒者，择术何妨法使然。
欲救国贫先自救，萌芽商学要精研。

不久，以李端棻为首，联合了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绅士创办了贵阳中学堂。李端棻虽年逾古稀，但仍奋起余威，抖擞精神，在实业和教育两条道上奔驰不已。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李端棻病逝于家中，享年75岁。遗体葬于城郊大关口。梁启超亲笔书写了墓志铭，感情充沛，感人肺腑。端棻死后，其表弟何麟书将其晚年诗作辑为《苾园诗存》传世，存诗一百余首。

（责任编辑：赵友慈）

脾 胃 与 抗衰老



● 刘结平

肾主先天，脾胃主后天，肾气的强弱与衰老的密切关系早为人们所接受，而脾胃的功能与衰老的关系至今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从人的衰老机制来看，中医学认为，衰老的主要原因是气血失衡。气血两者，乃人体生命之根本原动力，气血运行正常，则人体康泰，气血失和则人病起，气血虚亏则人早衰，故《养生四要》云：“善养生者，必先养气，能养气者，可以长生”。可见气血失和，气血虚衰与人衰老关系密切，养气保精血为抗衰老之大法。这里的血基本上指血液，这里的气是指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气能生血，血有赖于气的推动、濡煦才能正常运行，可见其中气是根本。那么气是如何生成的呢？简单地说，人体的气，来源于禀受父母的先天之精气，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即水谷之精气、简称“谷气”）和存在于自然界的清气，通过肺、脾胃和肾等脏器的综合作用而生成。在气的生成过程中，脾胃的运化功能尤其重要，因为人在出生以后，必须依赖饮食的营养以维持生命，而机体从饮食中摄取营养物质，又必须依赖脾胃的受纳和运化功能，才能对食物进行消化吸收，把其中营养物质化为水谷精气，为机体所吸收。再者，肾中先天之精气，必须依赖于后天脾胃化生的水谷精气的充养，才能发挥其生理功能，故《内经》云：“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由此可见脾胃功能的好坏，决定着气血的生成和功能的发挥，从而决定各脏器的功能活动和机体机能的盛衰，从而影响着人体衰老的进程。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今社会由于生活习惯及工作环境的影响，有 90% 以上的人有过或正患着胃肠疾病，如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癌、腹痛、腹泻、便秘及消化不良等等，这严重影响着脾胃的功能及气血的化生，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因而保护脾胃，维护其正常功能，做好脾胃保健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须做到未病先防，即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生活要有规律，调情志、陶冶情操。其次得病后及时治疗，当然现在临床使用的胃药种类虽多，大多疗效不尽人意，为此中国咸阳保健品厂、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对人体衰老机制加以探讨，采用纯天然中草药研制出的 505 神功元气袋具有补益脾胃，调整气血之功效。大量临床实践表明其对消化系统疾病有明显的保健治疗作用，长期使用，可达抗衰老、延年益寿之功效。

中国咸阳保健品厂独家生产（严防仿制假冒）
中国医学科学院西安分院医药保健研究所监制
厂址：陕西咸阳市乐育北路 19 号
电话：(0910) 213392 218328 216586
京卫药宣字 93 (07—323)

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研制
陕西咸阳五〇五医药保健总公司经销
联系人：周华 邮政编码：712000
传真：(0910) 218606 电挂：8286
邮购价：每条 58.50 元

乙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陵典礼

桥山之颠，沮水之滨，乙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陵典礼，于1995年4月5日，在陕西省黄陵县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刘杰等出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恭读祭文。来自海内外数万名炎黄子孙参加了公祭活动。



△刘杰顾问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敬献花篮



△
来自陕西省各地的群众，演出了
丰富多彩的广场文艺节目



△整修黄帝陵第一期工程
基本完成后的庙前区



炎黄春秋



霍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



成之凡女士在法国

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
广东省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
1937：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
竞选法国总统的女华裔成之凡
从日本战俘到中国专家

慧眼识拔梁启超的
礼部尚书李端棻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 价：3.20元